

指导方志年鉴工作 引导理论学术研究
弘扬湖湘地方文化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汨罗屈原碑林

湖南地方志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办
湖南省地方志学会

双月刊 2013年

第3期
总第61期

湖南地方志

HU NAN DI FANG ZHI



3

2013年(总第61期)

特 载

责任编辑 任国瑞

- 03 在《湖南省志(1979~2002)》第六次
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王晓天
- 08 在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 王晓天
- 16 关于表彰2012年度全省方志系统先进集体、
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 省地方志编委会
- 17 关于颁发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优秀
成果奖项的通知 / 省地方志编委会

志鉴研究

责任编辑 任之

- 18 道光《洞庭湖志》: 18世纪政界知识界
对自然湖泊的探索和思考 / 李跃龙
- 23 年鉴条目及其撰写 / 邓建平
- 27 浅议年鉴创新的现实需要及创新途径 / 杨盛让
- 31 论统计数字在续志中的作用和运用 / 卢凯旋
- 34 中美年鉴的比较研究
——从美国的《世界年鉴》^①编辑出版反思
中国年鉴的现状 / 黄俊军
- 40 瞿宣颖方志理论初探 / 刘运华
- 48 依托政府互联网信息平台强化地方
综合年鉴传播和资政服务功能 / 周南非
- 51 湖南省县志书篇目结构的历史演变及探讨 / 尹克加
- 58 第二轮志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杨帆
- 63 光绪《湖南通志·列女传》考论 / 姚分廷

经验交流

责任编辑 庆龙

- 67 精心修志 把乡镇企业载入史册 / 省乡镇企业局
- 69 精心编纂 确保质量 全力做好《城乡建设志》
修编工作 /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志组
- 71 加强领导 提高认识 认真编好《教育志》
/ 省教育厅史志办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晓天

副主任: 李跃龙 邓建平 李晓平 袁勇前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习加(长沙) 卢凯旋(省志)

任国瑞(省志) 刘运华(省志)

李敦楚(邵阳) 苏兆虎(益阳)

张征远(怀化) 陈念军(岳阳)

杨盛让(省志) 杨伟东(衡阳)

杨慈安(张家界) 易小兰(湘潭)

林有良(娄底) 林小军(株洲)

郑 茁(省志) 周南非(省志)

唐 璩(郴州) 龚 峻(省志)

夏业清(常德) 黄俊军(省志)

赖中林(永州) 熊明刚(湘西)



主办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地方志学会

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李晓平

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任国瑞

栏目策划:任 之

责任编辑:恕 德等

编 务:欧维之

版式设计:仙 玉

摄 影:李震举 黄先国

地 址:长沙市德雅路浏河村巷 37 号

邮 编:410003

电 话:0731-84212008 84221709(传真)

网 址:www.hndfz.hunan.gov.cn

电子邮箱:hndfz2009@yahoo.cn

刊 号:湘刊型内部资料准印证号 0177

印 制:湖南印美彩印有限公司

2013年6月出版

本刊赠送范围:省委、省政府
省人大、省政协、全国方志系统

- 73 发挥“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 高标准完成《计划志》编纂任务 / 省发改委

湖湘文化 责任编辑 任国瑞

- 76 古苍梧郡治之谜 / 谢武经

志人随笔 责任编辑 恕德

- 77 我与纸质期刊 / 欧维之

序言选登 责任编辑 恕德

- 78 《湖南彭氏》序 / 任国瑞

方志漫谈 责任编辑 任之

- 79 方志篇目的制订 / 李晓平

志苑视窗 责任编辑 蒲柯绍

- 66 郴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评谈地方志工作 / 本刊讯

- 81 日本收藏的湖南稀见方志 / 李龙如

- 75 《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出版发行 / 本刊讯

志坛文艺 责任编辑 蒲柯绍

- 82 恕德斋诗联近作选 / 任国瑞

- 22 诗联二首 / 李羽立

- 62 诗五首 / 陈英涛

- 68 诗二首 / 吴运申

- 72 七十感怀 / 吴贤章

- 68 端阳令·孝 / 任健鑽

- 17 一个人的旅行 / 肖和元

- 15 反说歇后语·肉包子打狗 / 康 耘

- 83 湖湘古谣谚·技艺特产(2) / 仙玉 喻长华

大事纪述 责任编辑 恕德

- 84 4~5月湖南大事纪述 / 李章进

宣传推广 责任编辑 仙玉

- 封面:汨罗屈原碑林 / 庆龙摄

- 封二:《湖南省志(1978~2002)》第六次编纂工作会议

- 封三: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

- 封底:省地方志编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大会



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晓天在会上讲话

在《湖南省志（1978~2002）》 第六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王晓天

（2013年4月26日）

同志们：

今天上午，我们欢聚一堂，召开《湖南省志（1978~2002）》第六次编纂工作会议，回顾总结2012年《湖南省志》编纂工作，交流经验，表彰2012年度省直修志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第二轮优秀志书获奖者，研究部署2013年《湖南省志》编纂工作。会议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内容非常丰富，意义重大。

现在，我代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讲以下意见。

一、2012年《湖南省志》编纂工作的回顾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湖南省志》编纂工作，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省志承编单位和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方式为主线，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创造了新成绩。

（一）第二轮《湖南省志》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1. 认真做好分类指导，促进编纂进度。一是加强日常指导。年内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对编写组的联系指导，贯彻落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精神，加大工作力度。年内到省粮食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交通厅、省乡镇企业局、省教育厅、省体育局、省水利厅、省宗教局、省住建厅、省科技厅等单位的编写

组进行调研指导，同时接待省科技厅、省妇联、省民委、省通信管理局、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国储局、省农业厅、省乡镇企业局、省发改委、省粮食局、省水利厅等单位编写组的来访，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认真听取编写组编纂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编纂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促使编纂工作正常推进。二是积极努力，发动未启动修志工作的单位启动修志，通过《湖南省志》第五次编纂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处室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宣传《地方志工作条例》，宣传修志意义，重新启动了《海关志》的编纂工作。

2. 切实抓好志稿的评审和编辑加工，努力提高志书质量。一是志稿评审方面。年内组织对《粮食志》、《民族志》、《城乡建设志》进行评审，做到认真阅读志稿，并根据要求，提出评审意见，得到承编单位领导的肯定。评审之后，又根据评审会的意见，与编写组一道研究修改方案，对志稿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二是编辑加工方面。对送审的志稿坚持三审定稿，认真细致地进行编辑加工和审稿，解决了志稿存在的问题，保证了志书的出版质量。年内出版了《科技志》、《军事志》、《体育志》等志书，《教育志》也已付印。

第二轮《湖南省志》于2002年正式启动编纂，截至2013年，已经出版36部：《共产党志》、《政府

志》、《工会志》、《物价志》、《审计志》、《出入境检验检疫志》、《林业志》、《财政志》、《出版志》、《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志》、《质量技术监督志》、《工业综合志》、《民政志》、《气象志》、《供销合作志》、《国土资源志》、《报业志》、《司法行政志》、《审判志》、《银行志》、《广播影视志》、《公安志》、《农业志》、《大事记》、《对外经济贸易志》、《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志》、《烟草志》、《环保志》、《检察志》、《税务志》、《水利志》、《军事志》、《外事侨务志》、《科技志》、《教育志》、《体育志》。正在编写的16部：《政协志》、《人事志》、《人大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旅游志》、《铁路志》、《电力志》、《医药志》、《文化志》、《武装警察志》、《工商行政管理志》、《卫生志》、《邮政志》、《地震志》、《物质储备志》、《妇女志》。

2012年，还评选出年度先进集体4个：《教育志》编写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志》编写组、《乡镇企业志》编写组、《城乡建设志》编写组；先进个人22人。

（二）认真组织开展第二轮优秀志书评奖工作

2012年，经省政府批准，在全省开展首次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的评奖工作，这也是对湖南第

二轮地方志成果质量的检阅。其中《湖南省志》参评单位有二十多家，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省内社科专家、市州和省厅局修志一线的代表及本委长期从事修志工作的业务骨干，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质量规定》，进行初评和终评，全省有58部志书获“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其中《湖南省志》有：

一等奖：《公安志》、《审判志》；

二等奖：《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志》、《体育志》、《检察志》、《水利志》、《烟草志》、《科学技术志》、《大事记》；

三等奖：《农业志》、《银行志》、《国土资源志》、《气象志》、《财政志》、《对外经济贸易志》；

优秀奖：《司法行政志》、《税务志》、《环境保护志》、《林业志》、《外事侨务志》。

在此，向获得第二轮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奖的单位，表示热烈祝贺，向为湖南省志编纂工作发展付出艰辛努力的修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三）第二轮《湖南省志》编纂工作的主要经验

党政领导重视，是做好省志编纂工作的关键。地方志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修志工作千难万难，领导重视就不难。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语言，悟出了修志的道理，道出了修志的经验，说明了只有领导重视才能做好修志工作。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它提出了明确要

求，而且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修志工作实践中，湖南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修志体制，由副省长、市长、县长，分别担任省、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主修《湖南省志》、市志、县志，并由一名副职专人负责，协助正职做好修志工作。这种体制，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湖南省党政领导刘正、周伯华、于来山、肖捷、路建平、许又声等先后任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出席全省修志工作会，并作重要讲话。领导对修志工作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省志》修志工作的开展。各承编单位领导亲自抓，亲自参与启动、审稿的过程，并且解决修志需要的人、财、物。省公安厅领导，亲自参加审稿会，订正史实，补充史料，提升了志稿质量，在这次优秀志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经验证明，凡是领导重视和支持的单位，修志工作都能顺利开展，并取得好成绩。

修志人的无私奉献是编纂志书的可靠保证。修志工作者艰苦奋斗、努力拼搏，是第二轮《湖南省志》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条件。为了打开沉闷的修志局面，为了推动修志工作的发展，他们发扬敢抓、敢闯、敢争、敢干的精神和勇气，宣传领导，争取支持；宣传群众，创建队伍；宣传社会，争得认同；宣传家人，争得理解。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勇于奉献，甘于吃苦，忠于职守，呕心沥血地在这块瘠薄的土地上，开拓出一片沃土，培育“方志事业这棵常青树”。可以公允而客观地说，没有这批带头人和拓荒者，就没有今天这样生机勃勃向上的方志事业。没有广大方

志工作者的“伏案研写，艰苦备尝”、“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和“埋头苦干”，方志事业便不会出现繁荣兴旺的局面。修志是一项高尚而重要的文化事业，同时又是一项烦难的冷清工作，但是我们广大的修志工作者，继承我国历史上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淡泊名利、默默耕耘，涌现出不少令人感动的模范事迹。

教育史志办的胡国强同志，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淡泊名利、不问仕途，多次放弃个人申报国家、省级课题的机会，尤其是办刊物和升职的机会，主动固守别人不愿干的修志工作，带领修志人员，协助《教育志》编委会负责组织资料收集，认真编辑校阅文稿，经常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工作，8年来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群众称之为“拼命三郎”、“老黄牛”，多次被评为国家、省级先进工作者。

《宗教志》的邹先觉主编，为了收集资料，2009年7月，妻子病危住院，在病榻边，他一边照顾生病的妻子打吊针，一边整理《宗教志》的资料制作成卡片，并毫无怨言。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志》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老干部参与修志，他们不顾年老体弱，在省档案馆查找、收集资料，中午都不休息，一个盒饭对付，继续干，兢兢业业，圆满完成编纂任务。

《电信志》主编何则同志，参加修志工作时已七十好几了，并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对志稿修订工作精益求精，在春节前，还在与省志的同志交流看法，商讨修改意见。正月初，病故在工作岗位上。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省志编修正是有了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有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才

取得巨大成绩。

(四) 编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这次参评的志书是基本符合质量要求,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湖南省志》有重大问题被推翻重来。有的志书质量非常高,得到省内专家和领导的好评。但是,也应该看到,少数志书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有的志书还存在一定质量问题,离精品佳志有一定距离。

第一,可读性不强。首轮新志书记述时间跨度短则百年,长则千年,古往今来之人、事、物应有尽有,并都有开端和发展经过,记述跌宕起伏,阶段性、可读性比较强。而二轮新志书是断代志,或称断时(段)志,所记只是眼前一二十年之事。一般都为读者所熟知,阅读时就觉得“没什么看头”。就可读性而言,往往“吊”不起读者“胃口”。

第二,篇幅偏大。篇幅偏大,有新增门类和记述、行文方面不够简洁等原因,但主要还是资料。资料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记述过繁、收录过细,舍不得割爱。记专业分志中的事物,如介绍机构、单位等,首轮新志书采用的是选介,每家数百字,如今却都是家家介绍,介绍得又特别周详。正因如此,才出现记一二十年之事的篇幅远胜于记百年千年之事的篇幅的现象。不同的志书,记述对象是不同的。一部志书只要把本级之事记述明白,其任务也就已经基本完成。过多、过繁地记载较低层次的事物,不仅篇幅大增,也势必与记述较低层次内容的其他志书大量地交叉重复。有的出现重抄第一轮志书的内容,有的以文件代替内容,记流水账。

第三,歌功隐过。这方面,首

轮新志书已经是个问题,二轮新志书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首轮新方志记历史上久远之事,用不到歌功隐过(或隐恶),只有是记解放后的事情时才存在此种弊端。但毕竟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且因人事变动比较大,记述时相对容易落笔。二轮新志书所记,都是改革开放时期之事,人事方面相对变化也小一点,当代人记当代事,难办的事就多,讲好话易,讲不好听的话难,落笔时就容易笔下留情,出现莺歌燕舞、歌功隐过的情况。尤其是碰到党员领导干部犯错、犯罪的,更是“蜻蜓点水”,甚至水也不点。

第四,记“工作”多。首轮新志书由于历史跨度长,要记的事情多,比较注意“事以类聚,类为一志”,一些过于具体的工作过程排不上号,记得较少,它不可能去逐年细写各部门的工作经历。而二轮新志书历史跨度短,“纵写史实”少了,有的如数家珍般地大量记述具体业务工作细节和经过。各行各业的具体、详细的工作情况一一入志,志书必然会“虚胖”。

除上述不足之外,二轮新志书编纂过程中还有其他毛病,如篇目结构不太合理,内容记述不太完整,前后有交叉甚至有矛盾,统计数据不太准确,有的提法欠推敲,书写有不规范之处,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二、2013年《湖南省志》的主要工作

2013年,《湖南省志》编纂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要始终坚持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湖南省志》编纂工作;二要始终坚持依法修志,进

一步深化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湖南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确保《湖南省志》编纂工作取得新成绩。

2013年《湖南省志》编纂工作要点:

一是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启动未开展修志的单位启动修志,重点做好《文学艺术志》、《民航志》、《保险志》等志的启动工作。

二是评审《统计志》、《电力志》、《旅游志》、《公路交通志》等志稿。

三是编辑并争取出版《民族志》、《宗教志》、《城乡建设志》、《文物志》、《社科志》、《电信志》、《粮食流通志》、《统计志》等志书。

(一) 进一步认识修志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工作

国家软实力这个概念,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其内涵主要是国民的综合素质、国家的创新能力、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制度的激励、规范和协调能力等,其核心是文化的实力、活力和影响力。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志书编纂是对特定地域或部门单位历史文化的集聚和梳理,是对现代文化的汇总和提高。其记述内容的原始性、丰富性、系统性、全面性是其它体裁的著述难以企及的,可以说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生产力,离不开挖掘、提高祖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价值,继承并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梳理和总结,从现实生活中汲取

人民群众创造的养分，离不开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洋为中用中充实我们的文化宝库，增强我国文化的创造力。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基础性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提炼，也正是地方志编纂工作所要完成的任务。

志书的编纂工作也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工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刘延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上，对此作了充分解析，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经济实力，而且要有文化魅力。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和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应是在当代先进思想指导下，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智慧，去梳理特定时期和范畴的历史资料，挖掘并审核历史的遗存，用已成熟并相对独立的志书体例给予记载。修志是以编纂高质量志书为其核心任务、主要成果的。但它不仅是编书、出书，其编修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本单位、本部门和本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再梳理、再认识、再借鉴的过程，是全面总结历史发展进程及经验教训的过程。

凡是有作为、有远见的领导人，从事领导工作，无不在两个环节上下功夫，一是了解历史，二是培养人才。修志过程，可获一举两得之效，是一个深入认识自身的过程，逐步挖掘潜在的过程。修志也必将修出领导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增

强、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之，志书的编纂不要只看结果，还要重视过程，让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能最大限度地发热发光。

(二) 加强领导，搞好协调和合作

地方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重要职责，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各部门责无旁贷。实践证明，领导重视与否是修志工作成败的关键。各承编单位要深刻认识地方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切实履行职责，为地方志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是继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修志是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官职官责”。要继续认真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办法》，继续加强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的管理体制。要把地方志纳入工作计划，解决修志中遇到的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要解决纠正一些部门存在的修志工作无人管的现象。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各承编单位要把修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单位财政预算，予以保证。

二是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志书的编修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需要各有关单位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承担志书编修的单位，要严格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办法》的规定，切实履行职责，按进度高质量地完成志书编纂，绝不能因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而影响全省第二轮修志的编写进度，拖全省地方志工作的后腿。特别是还未启动的单位，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也将请示省政府组织一次督查。

(三) 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

出精品佳志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是关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本，因此确保质量至关重要。

1. 坚持志书编纂的三个重要原则——明确主旨、抓住主线、突出主体。做任何工作，都应有一个主旨，就是向着什么目标，达到何种目的。修志也不例外，必须明确为什么要修志、达到什么目的。修志的目的历来有“六字真言”，即“存史、资治、教化”，这个概括应当是比较准确科学的，已成共识。也就是说，修志既为当代，也为后人，更为自身。为当代各行各业提供先人的行为轨迹、思想文化和经验教训，以资做好当前工作。为后人把当代人主要经历梳理编纂而后留存下来，以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并供其借鉴，作为发展创新的基础。为自身就是提高志书工作者及有关单位认识水平、文化素养和业务能力的。主旨不明确，修志就会失去方向，难以组织队伍，鼓舞士气、指挥作战，明确主旨是志书编纂的先行的第一位的工作。

主线是贯穿全书的主要脉络。志书编纂的主旨明确后，必须在众多资料中寻找这条主线，抓住这条主线，而后围绕这条主线组织编纂资料，就有可能做到主题鲜明突出、逻辑合理顺畅、结构有序严谨，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志书质量。主线不明确，常常会出现上下错位、缺项断档、逻辑混乱的弊病。对于读者来说，主线越清楚，志书就越有吸引力，越能更好地掌握志书的知识，更深刻地理解志书的内容。深入研究、准确抓住主线，是志书编纂的一个关键环节。主线在何处？它不是编纂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当中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即以经济发展水平为

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变化。第一轮修志，其内容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的主线是特定地域或单位的发生发展、新旧交替、兴衰变换。第二轮新方志是前志的延续，主要写当代上个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而这一阶段，正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所有工作，都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应是这一时期的主线。我们在制定方案、设计篇目、具体编纂的时候，都应紧紧抓住它、围绕它。

2. 坚持篇目设计的三重作用——指南、提纲、目录。篇目是志书的总体框架、设计蓝图。其设计质量决定着志书的优劣以至成败，决定着志书编写的效率效益。在第一轮修志中，有的志书的编修出现了重大反复，有的甚至推倒重来，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很大一部分是对篇目设计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设计篇目不能一蹴而就。对它的研究、调整、补充、完善，贯穿于志书编纂的全过程。它的完成也应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雏形篇目，即编写者在资料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整体规划和门类齐全、领属得当、布局合理、突出特色、题文相符等基本要求，搞一个比较粗疏的篇目。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一般设计到节。条件不具备时，设计到章亦可。它是一个内容范围和初步分类的框架。二是成型篇目，即在资料收集整理大体完成以后，补充、调整、修改雏形篇目，形成比较完整的篇目结构，作为撰写初稿的依据。三是定型篇目，在志稿撰写和修改过程中，作者的认识必然会随之而深化，同时也常常出现新的资料或对已有资料的补充完善以及纠偏改正，相应地对成型篇目进行补充修改，直至志书终审定稿，篇目

也随之最后定型，成为志书目录。

3. 坚持评议志稿和三级审查制度。每一部志书都要首先形成评议稿，广泛征求行业专家的意见，召开评稿会，请本行业专家、老领导，地方志编委会专业人员和领导参加。评稿会是专门找问题、挑毛病的会议，行业专家和老领导着重从专业、史实等方面进行评议，省志处的同志着重从体例、资料性、著述性、行文规范等方面进行评议。省志处与会人员在逐篇逐章逐节过关后，不仅在会上提出意见与作者磋商，还写出书面意见提交分志编辑。实践证明，志稿评议会，集众人智慧于一炉，通过总结志稿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做到存在问题明确，修改方向清晰，修改后志稿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

志稿评议后，承编单位根据评稿意见进行修改和总纂。总纂完成后，承编单位领导审查，着重在资料的真实性和政治观点上把关。送交省地方志编委会后，还要进行三审，进一步审核资料和体例，规范文风，删节重复。最后由省地方志编委会领导进行终审。经三审的志稿方可交付出版。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志书的质量。

（四）检查和督查相结合，促进省志编纂工作稳步发展

“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这是《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一项职责。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不断加大对第二轮修志的督促检查力度，2007年3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出明传电报，对修志工作进行了跟踪督查，将工作进展情况汇总并进行通报，推动了修志工作的开展。为加强对《湖南省志》编修工作的经常性指导、督促检查，2013年，省地方志编委会将认真落实几项制度：一是定期

协调制度，省志处要对承编单位的编修进展情况进行了解，情况记录在案，适时给予跟踪指导。二是业务例会制度，原则上，省志处每月召开业务例会一次，汇报、沟通承编部门编纂情况，研究解决重要问题，审议报送的方案、篇目、志稿，就下一步工作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三是现场指导和调研制度，省志处责任人定期或不定期深入承编单位，开展面对面的现场指导和调研。省地方志编委也要对各分志编纂情况进行综合调研，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如未启动修志工作，或虽然启动，但人员不到位、经费不到位、条件不到位等问题，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与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开展《湖南省志》编修的督查，并将督查情况通报全省，进一步推动省志工作。志书已经出版的单位，史志工作不能中断，要编辑出版部门年鉴、部门大事记等史志书籍，为下一轮修志做好准备。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工作会议，又是一次经验交流的会议，也是一次工作部署会议。自第二轮《湖南省志》启动以来，至今十年了，希望大家能以此会议为契机，加深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巩固修志中取得的成果，努力探索创新。

《湖南省志》编纂工作要借党的“十八大”的东风，抢抓机遇，不负重望，不辱使命，推动《湖南省志》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努力打造经得起社会检验的精品佳志，为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在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 王晓天

(2013年4月27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全省市州志办主任齐聚长沙，召开一年一度的全省市州地方志办主任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传达贯彻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精神，回顾总结过去一年全省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情况，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共同探讨，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地方志工作任务，切实推进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积极拓展方志工作新领域，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几点意见。

一、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精神

4月12-15日，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在历史文化名城郑州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交流各地各单位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情况，总结地方志工作经验，审视当前地方志工作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地方志事业发展水平。会议指出，在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贵在密切联系地方志工作的实际，认真思考和研究问题，与时俱进，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事关地方志事业发展全局的基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更为牢固，也才

能使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会上作了题为《注意防止倾向性问题，巩固和发展地方志事业大好形势》的重要讲话。对于当前地方志系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现实意义，他指出：“我们二轮修志的内容已深入改革开放时期，更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十八大精神，用以确立我们观察问题、判断是非、遣词造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指导、检查、总结、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回顾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到现在这四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在各地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深入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大力开展二轮修志、年鉴编纂、旧志整理、理论研究、读志用志、人员培训等工作，地方志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截至目前：二轮修志，全国规划的5882部志书中，已累计出版1348部；整理（或影印）出版的旧志累计达2000余部；已开通省级网站26个、市级网站193个、县级网站459个，共678个网站；已建成省级方志馆13个、市级馆52个、县级馆186个，共251个方志馆。新中国第一部国家层级的专门志《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及中指组主持编纂的《方志百科全书》，均可望于今年内出版。中指组办公室与

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十集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的播出，受到海内外好评，扩大了地方志文化的影响。朱佳木说，所有这一切表明，我国新编地方志事业在已有基础上，正步入一个全盛时期。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大好形势里，也还存在不少倾向性问题。比如，既存在忽视方志理论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倾向，也存在忽视志书编纂的倾向；既存在忽视志书质量的倾向，也存在忽视修志进度的倾向；既存在忽视改革的倾向，也存在忽视总结经验、继承传统的倾向；等等。对此，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注意防止这些倾向性问题，巩固和发展地方志事业大好形势。

会议号召，全国地方志系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就要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要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多力量！

二、2012年工作回顾

2012年，是全省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全面推进的重要一年。全省方志系统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位求进，加快发展，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市县两级方志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打

开了新的局面，为全面落实地方志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地方志工作法制化建设切实推进

自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出台以来，随着《条例》及湖南省实施《条例》办法的贯彻落实，我省地方志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步入依法修志的新时代，方志工作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过去的一年，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地方志工作，政府依法修志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去年，省政府首次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绩效考核范围，年初定任务，年中促落实，年底抓考核。年内，省地方志编委会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顺利通过了绩效考核。去年，岳阳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岳阳史志工作的通知》，决定史志办派人参加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掌握重大事件第一手资料；同时，落实《通知》精神，岳阳市各县市区在领导配备上，基本都做到史志办主任兼任党委办副主任。常德市将方志馆建设和《常德文库》的编修纳入《常德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常德文库》纳入全市“文化名城”建设项目。怀化市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市、县（市、区）两级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市志办将对市委、市政府承诺的一系列绩效考核指标，与县市区进行有力对接，从制度层面构建“工作一体化”平台。益阳市政府领导听取地方志工作专题汇报后，明确表态并落实充实业务队伍，增加财政拨款，年内市志办调入两名年轻干部，并落实成立了

6个县（市、区）地方志工作专门机构。永州市委常委两次集体听取史志工作的专题汇报并印发纪要，永州市各县、区委常委都分别听取修志工作汇报1-2次。湘潭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专门性文件，明确各单位史志工作责任领导及联络员，确保了市志承编单位修志工作有领导主抓、有专人负责。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永州、常德、娄底、衡阳、怀化、长沙等市方志馆建设都有了实质性进展。全省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

与此同时，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继续以《条例》的贯彻落实为推动力，加强地方志工作制度和机制建设，出台了很多系统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如目标考核责任制、督查通报制、资料报送制、志书编纂行文规范、志书审查验收办法等，初步形成了地方志工作行政管理和地方志编修业务规范体系，进一步丰富了地方志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内容，为地方志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行政和法制支撑。在《条例》、《办法》的贯彻实施中，全省广大地方志工作者依法履职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更加振奋了方志人的精神和信心。随着更加丰富的地方志成果的不断问世和地方志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对地方志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高的关注度，依法开展地方志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正逐步形成。全省地方志工作法制化建设进一步向前推进，方志工作步入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二）市县两级第二轮志书编修成果丰硕

我省二轮修志工作开展十余

年来，三级志书编修工作进展顺利，形势喜人，已全面进入编修、评议、出版高峰期，就工作进度而言走在了全国前列。2012年，各市州围绕中心，突出重心，继续下大力气抓了第二轮修志工作，市县两级第二轮志书编修又是一个丰收年。

年内，全省先后完成《临湘市志》、《攸县志》、《湘乡市志》、《汨罗市志》、《湘潭县志》、《株洲市北区志》等6部志稿的评议；完成《衡山县志》、《新邵县志》、《洞口县志》、《常宁市志》、《湘潭市岳塘区志》、《溆浦县志》、《攸县志》等7部志稿的省级终审验收；正式出版《芷江縣志》、《衡山县志》、《衡阳市城南區志》、《龙山县志》、《辰溪縣志》、《洞口縣志》、《吉首市志》、《新邵縣志》、《湘潭市岳塘區志》等9部志书；并有多部市县两级志书完成初稿进入分纂、总纂。

截至目前，市州一级二轮志书，已经出版3部（常德、张家界、岳阳3部市志两轮合修），评审验收1部（《益阳市志》），《衡阳市志》已交付评审即将召开省级评议会，邵阳、湘潭、株洲、郴州、湘西、怀化等市州志已完成初稿编写任务进入分纂、总纂阶段，娄底、长沙市志正在初稿撰写阶段，《永州市志》因首轮志书下限较晚目前正在酝酿制订编纂方案。规划中的122部县（市、区）志，现已出版72部，验收7部，评审11部，完成出版、验收、评审任务的志书总计已达90部，占总工作量的73%，其余志书编纂工作普遍进展顺利，县区一级二轮修志已完成工作总量的80%以上。从面上看，各市州第二轮县区一级志书编修，

永州、张家界两市已全部完成任务，分别是11部、4部；郴州市11个县市区已出版10部（资兴市志未出版）；长沙市9个县市区已出版8部（开福区志未出版）；常德市9个县市区已出版7部（安乡县志、临澧县志未出版）；邵阳市9个县已出版7部（邵东县志、绥宁县志未出版）；衡阳市、湘西州、湘潭市出版任务完成过半；其他各市的县市区志书编修、出版均在有序进行中。个别市辖区鉴于行政建制时间较短及建制调整等原因，区志编修尚未启动。

在力抓进度的同时，全省上下也都十分重视志书质量，力求在志书质量上求发展。2012年，省地方志编委会组织开展了第二轮三级志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评出了一等奖6部、二等奖22部、三等奖20部、优秀奖10部，其中，市县两级志书一等奖4部、二等奖15部、三等奖14部、优秀奖5部。这项活动是对我省前一阶段地方志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查，也是对今后修志的大推动，可以说，第二轮修志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市县两级志书编修成果丰硕。

在确保志稿质量方面，各地在稳扎稳打的基础上都在不断探索新路子，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湘西州就评议会后志稿修改阶段的质量督促、怀化市的专家坐镇审核工作制度、邵阳市专门的总纂工作规章制度等都颇有亮点。湘西州严格实行三审把关，质量达不到相应要求的志稿不准予召开评审会；对于评议会后志稿修改阶段的质量管理督促抓得很实，年内先后召开了《凤凰县志》、《花垣县志》（均为2011年召开评议会）修改工作座谈会、研讨会及修改点评

会。怀化市坚持“好”字当先，每一部志书“出炉”均按程序严格过关，做到程序化、精细化审稿。

《芷江县志》、《辰溪县志》终审稿均经过修志专家组两次审核；《洪江市志》送审稿出来后，专家组坐镇一个星期，反复审查修改后才准予召开评审会。邵阳市多次召开主任会议研究制定和完善总纂工作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措施，为市志总纂的顺利进行提供制度保障；邵阳县还以县政府名义下发了《邵阳县各级地方志书审稿、验收管理办法》和《邵阳县各级地方志出版、印刷规定》，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其他各市也都在抓质量、创精品方面做了可圈可点的文章，为后期编纂出版的志书质量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两级志书编修的同时，还有不少市县及时开展了部门志、乡镇志以及城区街巷志的编纂，进一步延伸了第二轮修志工作。邵阳市、县两级在部门志、乡镇志编修方面力度较大，卓有成效。隆回县召开了全县部门志、乡村志编修工作大会，全面铺开部门志、乡村志编修工作。长沙市在城区街巷志编修方面开了先河，《芙蓉区街巷路志》已经市级终审。这些工作的开展极大地丰富和延伸了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内容，值得肯定。

（三）方志资源开发利用领域不断拓宽

开发利用方志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各级地方志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地方志工作的不断深入，方志系统地情开发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不断拓展，越做越活，越走越宽，形成了资政决策服务、年鉴编

辑发行、方志数据库建设、旧志点校整理、地情资料整合等立体化开发的工作新格局。在这方面，各州市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良好成效，修用并举的地方志工作良性机制正在形成。现在，边修志边开发利用方志资源已逐步成为市县两级方志部门的基本共识，已经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任务的地方，大多数适时地调整工作思路，转移工作重心，将地方志工作从以修志为重点，转移到以志鉴编修为基础、开发利用方志资源为重点，为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续支撑。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方志资源开发向纵深发展的战略部署，很有意义。

近年，我们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在努力探索，如何发挥方志资源优势，致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二轮修志开展以来，省志委坚持修用并举，先后在桃江、怀化、平江专门召开了三次全省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现场经验交流会，旨在通过典型推介，以点带面，进一步推动用志工作。各州市很多地方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普遍的共识是：一要依法开展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二要大力营造读志用志的良好社会氛围；三要不断拓展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新领域。

过去的一年，市县两级继续探索，不断创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新的成绩。在搞好年鉴编修的同时，进行深度挖掘，地情开发成效显著。怀化市方志资源开发开始呈系列、有规模地向纵深发展，讨论制定了《怀化市2012-2016年方志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年内突出抓了红色资源、旅游资源、古籍旧志整理等地情开发重头戏，各县

区志办先后编辑出版《走近怀化革命老区》、《巫傩文化奇观》、《〈靖州直隶州志〉选粹》等众多地情资料著述。长沙市志办志鉴工作化被动为主导，以“将大事件存史，替小人物立传”为宗旨，开展《长沙年鉴》年度人物、年度事件评选活动，积极探索地方志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途径；县市区分别开展了《浏阳市森林公安志》、《长沙县通史》、《宁乡百年人物风云录》等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张家界市史志办着力挖掘地方绿色资源和红色资源，编纂、出版了《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开发保护史》、《先辈的嘱托——红二六军团后代寻访录》，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红色旅游事业服务。常德市史志办突出重大课题项目，积极主动融入地方文化建设，继续加强《常德文库》建设，着手开展《常德文征》点校工作。永州市史志办年内点校出版了清康熙九年《永州府志》，筹备出版《永州大事记》和《永州精英》等书。郴州市各县市积极作为，拓展用志工作领域：嘉禾县史志办权威发布《2012年嘉禾县委、县政府大事记》；宜章县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建教学科研基地；安仁县史志办编辑出版地方资源调研文集《天赋安仁》。湘西州各县市开发利用志资源各有侧重：保靖县着力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和苏区县申报工作；永顺县积极为老司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历史文献资料；吉首市、龙山县编辑出版地情书分别为市庆30周年、建党91周年献礼；古丈、泸溪两县加强首轮志书校勘整理，积极组织再版工作。邵阳市：邵阳县编纂出版精装版《古县千秋》；武冈市编辑出版《武冈古

王城》一书，并在武冈市电视台开辟“武冈市情”、“红色之旅”等专栏；邵东县编辑出版《邵东县2011大事记》为现实服务。株洲市志办围绕炎帝文化大做文章，编纂《中国炎帝陵志》，筹拍《神农大帝》电视剧。衡阳市县两级志办积极为各类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建设提供地情资料。

（四）地方志系统基础平台建设不断加强

近几年，全省方志信息化以网站建设为龙头，来势很好。网站总量逐步增加，数据库内容不断丰富，网站建设正由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数据库由小容量向大容量发展，地情网由省逐步向省市县三级全面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共开通市（州）级方志地情网站7个，分别是：长沙方志网、株洲方志网、湘潭史志网、岳阳市情网、常德史志网、怀化市情网；共开通县（市、区）级网站（网页）28个。从市州面上来看，常德、长沙、怀化、邵阳等市市县两级网站建设进展较快。2012年，省市县各已建成网站在原有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软硬件升级和信息库扩容，方志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怀化市市、县两级方志网站建设都有新的突破：“怀化市情网”全面改版升级，信息总变量达1000余万字，全年发布市情资料和工作动态信息800余条；“沅陵县情网”、“芷江县情网”、“靖州史志网”等县级网站均已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网站之一。“岳阳市情网”加大升级提质力度，调整栏目设置，更新信息内容100余万字，平均每天浏览900多人次。“常德史志网”全年点击累计7万余人次，在常德政府门户网站满意度调查中排名第

三。邵阳市年内有两个县市新开通了地情网站，全市已有市本级和4县（市）开通了地情网站。

2012年，部分州市方志馆建设也取得实质性进展。永州市史志馆，计划投资1000万元，现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6月竣工。常德市方志馆项目建设纳入到《常德市2012年项目建设年方案》，列入市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统筹规划，项目选址和基本方案已经市政府确定，项目推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娄底方志馆建设已列入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重点工程建设，列入娄底市文化建设四年规划，现已筹集建设资金2000余万元，2013年内将开工建设。衡阳、长沙、怀化等市方志馆建设也正在筹划之中。衡阳市正在积极争取方志馆建设立项筹建；县一级未开市方志馆已经建成，现正在布展，不久即将开馆。长沙市方志馆规划建设定位为长沙市地情馆、史志博物馆、地方文献中心等多功能方志馆。

回顾总结2012年全省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地方志工作必须树立大局和中心意识，围绕大局、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二是地方志工作必须遵照《条例》，坚持依法修志；三是地方志工作必须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重视和支持；四是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必须坚持开拓创新，勇于探索，不断拓展地方志工作新领域。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仍然存在规范性不够的问题；志书志稿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精品的问题；对

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缺乏新思考的问题；对地方志工作长远发展缺乏整体谋划的问题；修志队伍中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着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和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三、下一阶段工作部署

下一阶段，全省地方志工作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湖南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扎实工作，开拓创新，长远谋划，统筹兼顾，切实搞好第二轮修志和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把地方志工作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推进“四化两型”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主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主动助力建设文化强省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吹响了嘹亮号角。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文化强省战略以来，我省把文化强省放在富民强省大局中来推进，呈现出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良好局面。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新的历史时期，全省地方

志工作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精神上来，进一步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握历史机遇，主动作为，乘势而上，把地方志工作切实融入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去，充分发挥地方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独特的作用。在全省文化惠民和文化富民的文化建设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助力文化强省建设。当前特别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用十八大精神科学指导我们的地方志工作实际。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一精神对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地方志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修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精神，切实领会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用十八大精神指导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

二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积极履行《条例》赋予我们的工作职责。地方志工作就是全面履行《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的工作职责，扎扎实实搞好地方志各项工作。《条例》是我们新时期开展地方志工作的“法宝”。贯彻落实《条例》及《实施办法》，这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工作，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务必常抓不懈，用法制规范工作，用法

制为工作护航，努力营造依法修志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推进我省地方志工作法制化进程，依法健全机构，依法切实履职，依法充实队伍，依法争取经费保障，依法改善工作条件。让地方志工作更好地为文化建设助力，为社会发展服务。

（二）以《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为标准，全力确保志书质量

质量问题十分重要。第二轮修志，从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坚持质量第一的基本原则，自始至终把质量意识贯穿到修志工作的全过程。从前一阶段已经出版的志书和已经评审的志稿情况看，市县两级第二轮志书整体质量并不十分乐观，一部分志稿质量问题仍然堪忧，出版的精品良志不多。质量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正是我省市、县两级志书评审、出版高峰期。这个时期，特别要加强志书质量管理，以《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为标准，切实把好志书编修出版各个环节的质量关，多出精品，不出次品。加强质量管理，特别要注意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注意处理好进度与质量的关系。这是修志工作的老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必须高度重视。编修志书必须要坚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修志后期阶段，尤其要注意处理好进度与质量的关系，进度务必服从质量。修志工作不能盲目追求进度，急于求成。志书编纂人员要做到不急躁，不懈怠，不厌倦，不赶工程，不单纯只抢进度，不突击完成修志任务，要尽最大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当然也不能不讲进度，没有进度出不了成果，出不了成绩，也一样谈不上存史资政、服务社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

前提下,尽可能地加快进度,坚持“好”字优先,做到“又好又快”。

二要进一步规范志书质量标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出台,把志书质量标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规定》内容全面、要求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很强,对于我们的志书编纂工作、志书质量评比工作、方志理论研究等工作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二轮志书编修要认真执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严格按《规定》的体系标准把关,用《规定》来指导志书编纂,规范志书基本质量标准。在我们的修志实际工作中,要逐条逐条认真消化《规定》,并对照《规定》修改、审查志稿,切实把好志书质量关。

三要进一步规范志稿审查验收程序。《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湖南省实施《条例》办法对志稿的审查验收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二轮志书编修要严格按《条例》和《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验收。要切实做到专家会审,层层把关,级级负责,开好评审会,把好验收关。省志委在2006年下发过《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县志稿评议会的通知》,对市县两级志稿评议会有关问题进行了规范。《通知》就志稿评议会的日期择定、与会人员组成、会场布置、会议资料准备、会议主持、会议程序、会议记录、会议集体合影、宣传报道、会后工作以及志书出版报批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近几年,按照《通知》要求,全省市县两级的志稿评议会

得到了比较好的规范,绝大多数地方志稿评议会都开得很好。但是,在过来的工作中,我们也发现有个别地方由于种种原因,评议会还不够规范,存在走过场的问题。出版方面,个别志书虽按正规程序进行了验收,但却存在遗漏省、市两级审稿验收班人员名录的问题,这不是审稿人员名字不上书的问题,反映出的是志书是否经过审查验收的问题。希望各级志办一定要引起重视,严格“三审”制度,层层负责,环环把关,确保志书编纂出版质量。

(三)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积极实施方志资源开发战略

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搞好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是各级方志部门的工作职责。地方志工作者要不断拓展用志渠道,让地方志成果更为广泛地服务社会。

开展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是《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职责。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及广大方志工作者,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开发利用方志资源作为地方志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把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列入方志事业发展规划,长远谋划,科学部署,做好做实做强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今后长期的工作中,各级方志部门要做到修志用志任务统一部署,统筹安排,要把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绩效作为考核单位和相关负责人工作实绩的一项重要指标。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考虑安排专人来研究、组织和协调这项工作。这方面,怀化市已经走出了可喜的一步,正在筹划增设“地情开

发科”,专门负责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各级方志部门要不断开拓工作思路,丰富用志形式,创新工作手段,拓展服务领域,切实加大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工作力度,特别是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选准项目,抓出成效,多出成果,实行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开发,推动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向纵深发展,实现方志资源社会共享。

当前,我们讲要乘势而为,主动融入地方文化建设的大局,为建设文化强省助力,关键就是要发挥地方志工作自身优势,大力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积极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方志文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塑造湖南方志文化品牌,提升方志文化影响力,将我省地方志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在文化强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所作为。

开发利用方志资源,主要从下面几条途径着力:一是围绕“志”做大文章,对方志产品进行深度延伸开发。推介新志,点校旧志,编写简志,重印首轮志书,编修部门专业志、乡镇志、城区街巷志、企业志、学校志等。二是发挥“鉴”的大作用,充分利用年鉴这个优势平台为社会服务。要好好研究,积极探讨,把年鉴做得更活,更科学,更有现实服务价值。三是利用“网”筑大舞台,运用网络信息化实现资源共享最大化。市州一级还没有建立方志、地情网站网页的,要抓紧建设,县市区一级有条件的也都可以尽早部署启动网络建设。已经建立并开通网站网页的地方,要及时升级,及时更新,不断丰富网站信息。四是挖掘“地情”大宝藏,积极开发方志文化短产品。这包括编写各类地情资料书,拍摄

反映地方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及辉煌历程的影视作品，建立地情信息资料库，等等。

（四）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努力营造方志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

相对于启动早、进展好、进度快的第二轮修志工作形势，我省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还有所滞后，相对薄弱，理论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地方志事业长远发展来看，这样的现状令人忧思，值得深思。可喜的是，继湖南省地方文献研究所之后，2012年，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又挂牌成立。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方志理论研究。中心将把修志实践中碰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实用性和编纂方法问题，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方向，同时还会以课题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全国地方志系统、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交流与合作，开展方志学术活动。我们希望，中心的成立能够成为我省方志理论研究的又一助推器，切实推动全省方志学术活动的开展和方志理论研究的迈进。也希望，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以及广大修志工作者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找准方志理论研究突破口，加强理论工作，用理论指导实践，努力营造方志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

修志工作进展很好，理论工作也不能滞后，我们要尽快解决理论“短腿”问题。下一阶段，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及地方志学会组织务必要把方志理论研究提上议程，从三方面入手开展理论工作：一是通过应用理论研究，加强对志书编纂实践的总结和提炼，着力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二是通过基础理论研究，着力解决方志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三是通过实用性理

论研究，着手进行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理论研究。一方面，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丰富地方志理论，在应用中逐步建立和完善方志学科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把方志理论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方志文化生产力，用理论科学指导并推动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

今年以及今后长期性的工作中，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逐步把方志理论研究纳入全盘工作规划，健全机制，强化措施，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不断提升方志理论水平。要加强方志学术交流，与省内外修志同行及有关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建立学术协作关系，共同开展有针对性、有指导性、有一定分量的专业项目研究。要充分发挥地方志学会的职能作用，开展一些方志理论学术活动。要鼓励修志专家多发表理论文章，有条件的出版方志学术著作。要加强理论研究平台建设，办好地方志系统的学术刊物和地情网站，举办和参加方志理论研讨会，以刊、网、会为依托，夯实平台基础。

与此同时，修志专家和方志理论工作者，要善于总结、提炼并探讨地方志编纂与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好的方法和理念以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问题，将思考转化并上升为理论，用理论更好地指导修志工作实践。省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组织召开专题性的方志理论研讨会，希望各级志办也积极组织和参与更多的理论研讨活动。以此为推动力，更好地拓展和深化方志理论研究，更好地营造方志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我省地方志理论工作水平。

（五）以人才建设为依托，着力造就高素质地方志工作队伍

修志靠人才，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才能保证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稳步的发展。要搞好第二轮修志工作，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修志专业人才队伍；要进行方志理论研究，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有实践经验的研究型人才队伍；要进行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应用开发人才队伍。

一直以来，我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都比较重视自身队伍建设。近年，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方志事业发展需要，各级志办重点着力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和推行岗位责任等，加强方志队伍建设，夯实人才资源配置基础。目前，市县两级绝大多数地方志机构班子团结，齐心协力干事业，广大修志工作者爱岗敬业，全心全意谋发展，为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这次会议，我们就会对这一年来方志系统涌现出的一些先进集体和优秀工作者进行表彰。这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是这一年来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排头兵，全省地方志系统要向他们学习，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不断进取，进一步推动今年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客观地认识到，全省地方志系统的队伍建设还存在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人才建设陷入了瓶颈，亟待解决。当前，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专业人才断层比较严重以及复合型人才缺失的问题。我们的队伍中，专业人才包括方志编纂专业人才、方志理论研究人才、方志资源开发应用人才、方志文化宣传人才、方志信息化建设专门人才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青黄不接的

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引进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强培养留住人才。特别要下大力气引进和培养年轻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要给这些能干事的年轻人压担子，要创造条件和环境，让年轻的、有能力的人才愿意来、有事干、留得住，让地方志队伍中流动新鲜血液，让方志事业后继有人。

加强地方志队伍建设，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全省方志系统大兴学习之风、实干之风、团结之风、进取之风。广大修志工作者要继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要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要刻苦钻研方志业务，要坚持不懈学习科学、文化、社会、历史、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不断丰富知识信息，更新知识

结构，提高自身素养，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要求。我们地方志工作者特别要继承和发扬老一批方志人爱岗敬业、默默耕耘的精神，克服浮躁心理和埋怨情绪，脚踏实地，振作精神，潜心工作，为我省方志事业奉献智慧和才能。同时，我们的方志队伍还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不断开拓进取。新形势下的队伍建设，着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要强化专业意识，二要强化服务意识，三要强化创新意识，四要强化奉献意识。全省地方志系统要着力培养一批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肯奉献的优秀方志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强

有力的地方志工作队伍。

同志们，当前，我们的地方志工作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攻坚、转型时期，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即将开启新的一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全国省级方志机构主任会议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开好头，起好步，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志坛文艺 [反说歇后语]

肉包子打狗

● 康耘

原歇后语：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狗，自古以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实实在在的狗东西。你随便翻开书或词典看看，全是些“狗腿子”、“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友狐朋”、“丧家之犬”、“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之类的字眼。可见狗令人厌恶的程度。特别是，当狗叼了东家的鸡，咬了西家的娃，甚至患上了狂犬病成了疯狗时，左邻右舍则恨之入骨，一片喊打之声。

然而，世上偏偏有爱狗亲狗养狗的人。当狗作了恶，邻居来找狗的主人“告状”，要求对狗采取措施或“绳之以法”时，狗的主人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一方面要惩狗安邻，

抚慰受害人，另一方面却又心疼自己的爱犬，不忍让那畜牲受苦或遭殃。想来想去，便采取一个两全的办法：拿着几团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朝那“狗东西”砸去，边砸还边高喊：“看我打死你！”原来，“砸去”的是几个肉包子，不但没有打，反而犒劳它一顿美食。你说这世上谁会用肉包子去打狗？既是肉包子，就不叫打；既是打，就不会用肉包子。因此，所谓用肉包子去打，只是装个打的样子给旁人看的。

这使人联想起社会上一些人对铲除邪恶、惩治腐败等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虽然也高喊要“严惩”、“狠打”、“出重拳”，但采取的却是“肉包子”一类的打狗工具

和“肉包子打狗”一类的打击方式。这就是屡打不绝、屡禁不止，甚至越打越多，越打越猖獗的主要原因。所以，这条歇后语应改为：肉包子打狗——装模作样；装装样子。

也许有人急了：“你把这条歇后语封杀了，怎么办呀？如果要说明一个‘有去无回’的事情，拿什么来作比喻呢？”别急，歇后语多如牛毛。俯拾即是。比如：侵略军出征——有去无回；肥猪出栏——有去无回；亡命鬼抢银行——有去无回；给贪官送礼——有去无回；借钱给黑心汉——有去无回；尿尿到大河里——有去无回。等等。

（作者系汨罗市修志老人）

关于表彰2012年度全省方志系统先进集体、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湘志编[2013]3号

各市州地方志(史志)办公室、省志各编写组、委机关各处(所):

2012年,全省地方志系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第二轮三级志书的编纂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

显著成效,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了整体提升。为表彰先进,促进地方志事业更加繁荣发展,经综合考评,决定授予怀化市地方志办公室、教育志编写组等22个单位“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决定授予湘西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等3个单位:“全

省方志系统编纂工作优秀单位”荣誉称号,决定授予黄磊、贺培育等69名同志“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再接再厉,为繁荣湖南地方志事业再立新功。

湖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附一:市州先进集体、优秀单位、先进个人名单

市、州先进集体4个:

怀化市地方志办公室 岳阳市史志办公室 常德市史志办公室 湘潭市史志办公室

县市区先进集体14个(排名不分先后):

长沙市芙蓉区史志档案局 株洲市石峰区档案区志局 湘乡市史志工作办公室 桃源县史志办公室
临湘市党史市志办公室 桃江县史志档案局 新邵县史志办 芷江侗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
宜章县史志办 双峰县史志办公室 张家界市永定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耒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吉首市史志办公室 道县史志办公室

优秀单位3个:

湘西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株洲市地方志办公室 娄底市地方志办公室

先进个人39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晖晖	王日明	王晶	方建国	龙为民	左泽蓉	刘建平	李文沙	李兰芬	李秋安
张征远	张让前	张长元	肖韧	肖泓	余忠明	杨慈安	邹文程	吴夏	周卫锋
周友珍	周中心	欧立强	郭勇华	夏声朝	夏新文	黄磊	黄旭术	黄晖	蒋海龙
蒋祖智	葛锐	曾光明	曾祥云	舒代亮	谢国荣	谭善林	熊仲荣	廖爱国	

附二:省直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先进集体4个:教育志编写组 改革和发展计划志编写组 乡镇企业志编写组 城乡建设志编写组

先进个人2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国	王燕	王俊	古忠民	许泽奇	刘春新	张汉文	张援朝	何则	何江华
肖和元	陈映华	周先觉	周曙东	姜大军	贺培育	夏泽辉	梁先学	龚鹏	童迎世
温庆福	蒋响元								

附三:委机关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先进集体2个:年鉴工作处 机关党委

先进个人8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国利 李献珍 周南非 胡利 唐润秀 唐秀英 黄谨 隆清华

关于颁发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 优秀成果奖项的通知

湘志编[2012]10号

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史)办公室,省直各厅局编写组: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切实提高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志书的质量,鼓励先进,我委决定对已出版的第二轮三级志书开展一次评奖活动。经各市州地方(史)志办公室和省直各厅局推荐,我委组织省内社科专家、市州和省直厅局修志一线的代表以及本委长期从事修志工作的业务骨干,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上报参评我省第二轮已出版志书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并报委优秀志书评奖领导小组批准,决定分别授予下列58部志书“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奖项。(按笔画排序)。业经公示,特通知如下:

一等奖(6部)

《华容县志》《桃源县志》

《隆回县志》《望城县志》《湖南省志·公安志》《湖南省志·审判志》

二等奖(22部)

《龙山县志》《宁乡县志》《永州市冷水滩区志》《祁阳县志》《沅江市志》《芷江县志》《邵阳县志》《武冈市志》《岳阳市志》《郴州市北湖区志》《常德市志》《湖南省志·大事记》《湖南省志·水利志》《湖南省志·体育志》《湖南省志·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志》《湖南省志·科学技术志》《湖南省志·烟草志》《湖南省志·检察志》《慈利县志》《韶山市志》《衡山县志》《醴陵市志》

三等奖(20部)

《长沙市雨花区志》《东安县志》《宁远县志》《安仁县志》《耒阳市志》《吉首市志》《辰溪

县志》《岳阳市君山区志》《宜章县志》《津江市志》《临武县志》《桃江县志》《桑植县志》《湖南省志·气象志》《湖南省志·对外经贸志》《湖南省志·农业志》《湖南省志·财政志》《湖南省志·国土资源志》《湖南省志·银行志》《新田县志》

优秀奖(10部)

《长沙市天心区志》《双牌县志》《汉寿县志》《桂阳县志》《株洲市南区志》《湖南省志·林业志》《湖南省志·司法行政志》《湖南省志·外事侨务志》《湖南省志·环境保护志》《湖南省志·税务志》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志坛文艺

一个人的旅行

●肖和元

(一)

早早就出发
心似离弦的箭
长长的影子像扁担
一头挑着星星挑着月亮
一头挑着行囊沉甸甸
只有欢快的脚步
敲响急促的鼓点
不累,不累
快点,快点
满怀儿乐颠颠
回家的路越来越近
父母守在了家门前

(二)

去见一个人
十五个吊桶压双肩
这边低来那边高
一头奔鹿拴中间
放慢脚步心朝前
无形的手儿推后边
加快脚步怕人嫌
心急火燎为哪般
这爱之路啊
为什么说窄就窄
说宽就宽
说长就长
说短就短
汗水早模糊了双眼

(三)

古人闲游任马行
情由景生写诗文
行前偏遇上徐霞客
浓缩山水作盆景
撩乱世人眼
灌醉旅行者的心
匆匆上路无去处
见人不见物
美好的景致躲着哭
不如放下行囊
靠着菩提树打坐
闲看风起云涌人海茫茫

2012年10月8日晚散步中作
(作者系省志烟草志主编)

道光《洞庭湖志》：18世纪政界知识界 对自然湖泊的探索和思考*

●李跃龙

洞庭湖自古为第一大淡水湖泊，最早记载洞庭湖的历史文献当属《禹贡》、《山海经》、《战国策》和楚国屈原的著作。此后班固《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等专门著作均有记载洞庭湖自然、人文等内容的篇幅。但这些早期文献乃至后世著作，在专门性、全面系统性方面描绘湖区综合情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表明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全面考察洞庭湖、记录洞庭湖，都存在相当的难度。随着洞庭湖区的不断开发，对洞庭湖的认识和了解也在不断深入和更加全面。到清前期，在地方官员的奏折和皇帝批示中，涉及到洞庭湖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洞庭湖在粮食安全、防洪保安等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编修一部作为洞庭湖全史的志书，也逐渐在湖南省士大夫和文人学者心目中成为共识，开始酝酿、策划和实施。道光《洞庭湖志》就是清代中叶以前政界和学术知识界探索和思考开放治理天然湖泊形成共识后的一项成果。

湖志编纂经历了3个阶段。道光五年刻本卷首署名为“安抚陶云汀先生督修，岳郡守沈筠堂先生总纂，候选训导蔡世基原本，岳州教授夏大观补辑，六安州丞万年淳再

订。”最早由华容县拔贡蔡世基开始编修工作。光绪《华容县志》称蔡“天资敏悟，学极渊博。”乾隆十五年，叶酋（书山）出任湖南提学使，蔡被延聘入幕课士阅试，接触到大量湖区人士和府州县志，在叶的支持下，蔡开始“依门类录之”。后来湖志的再订者万年淳称他“一生精力，大约在洞庭一湖”。按朝廷惯例，一省提学（学政）任期并不长，多者三四年，短的一二年，但叶却任湖南提学使达6年之久，这样就为蔡世基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行政资源保证。经过蔡的努力，最终编成一部《洞庭志》4卷稿本。蔡世基去世后，稿本托付门生万图南，万作了一些诗词内容增补，但工作基本停顿。据在万图南处见到蔡世基稿本的万年淳评价，认为“考据详覆，采择精当，虽缺略颇多，经纪未备，然其规模已次第可观。”而蔡本人“学有余而养不足，识过人而才不逮也”。^①

乾隆五十八年，岳州知府沈廷瑛（筠堂）倡修《洞庭湖志》，发出《征修洞庭湖志启》，这份文告被收入后来出版的湖志艺文篇中。这位沈姓知府两年后转任长沙知府，在湖区工作了多年。他提出“溯百代之源流，摭拾珠多。逸士拟揽全湖之胜概，必征盖世之鸿文。考以形图，核之故实，如圣朝封典，水利堤防，岛屿之所濛回，

草木之所荟萃，当源穷而派别，复类聚以条分。他如风骚迁谪之所往来，神仙物怪之所栖托，忠臣孝子之所吟咏，黄冠缁衣之所流连，与夫豪侠之奇踪、隐沦之晦迹，”要“伸拾遗之手，搜罗新句，采访旧章。”^②这是第一份由政府主官发出的修志文告，也是从乾隆十五年启动编修湖志以来第一份尚能见到的湖志编修文规，弥足珍贵。沈知府将任务交给府学教授夏大观，夏在得到蔡世基稿本后，对原本增辑，扩大为6卷，内容更为丰富。但不久夏去世，修志工作再次停顿。

夏大观增补的稿本，由沈廷瑛呈送给在京御史安化人陶澍。陶在湖区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年轻时代即留心实学，关注民生，对编修湖志一事十分重视。嘉庆二十年，陶将稿本交付门生万年淳。万是万图南之侄，曾编修《巴陵县志》，于湖区史事较为熟悉，陶澍交待湖志订正“不须求急，但求尽善。”^③万年淳按照陶澍的要求，历时6年，在安徽省六安州丞的岗位上完成了对湖志的订正，定稿共16门：舆图、星野、沿革、水道、湖港、山洲、堤垸、赋税、物产、兵防、事纪、古迹、庙祠、游览、杂摭、艺文。得到了陶澍的基本肯定，“订讹补缺，倍于前书，其用力勤矣。”^④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SZKT(Z)003。

道光元年，陶澍完成对万年淳所呈定稿的审阅，增加皇言、舟筏两门，去沿革一门，其他内容也略作调整，并号召在皖省湘籍官员集资出版。至道光五年，历史上第一部《洞庭湖志》在安徽省刊印问世。

编修《洞庭湖志》，可传为佳话者有二：一、全志历时70余年，先后3次编修，承先启后，生生不息。其中蔡世基与万图南、万年淳叔侄是师生关系，陶澍与万年淳既是师生关系，又是上下级关系。有蔡世基、万图南、夏大观3人均是想竟其事而“未及成而卒”，令后人感叹；二、湖志编修始于长沙，继之于岳州，又京师、安庆、六安州，辗转几千里，“为南楚书，不成为南楚而成于江南。”万年淳曾发感慨“岂有其时复有其地乎！”^⑧相信后人也可从中感知地方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其生命的顽强和伟大。

二

道光五年刻本每页10行，每行23字，全志约27万2千多字。其中：序、凡例、目录7 3 6 0字，舆图5060字，皇言、分星各5520字，湖山9200字，水道2760字，洲港6900字，堤垸5290字，税课4140字，舟筏1800字，兵防2530字，风俗1380字，物产2300字，古迹5750字，祠庙1840字，游览9660字，事纪19090字，摺摭20700字，艺文157320字。按上述各篇字数分类汇总：记述自然面貌（包括舆图、星野、湖山、水道、洲港、堤垸）的34730字，占总字数的13%；记述社会情况（包括税课、兵防、风俗、物产、事纪）29440字，占总字数的11%；艺文、胜迹（包括艺文、古迹、祠庙、游览、

摺摭）195270字，占总字数的71%；其他（包括序、凡例、目录、皇言）12880字，占总字数的5%。

至首列陶澍、万年淳所撰序言。陶序着重论证洞庭即九江一说，并略述纂修原委。万序对三次纂修始末记述较详，文末称：“经数人纂辑参考之劳，前后七十余年而后就绪，时亦久矣；且此志为南楚书，不成为南楚而成于江南，岂有其时复有其地乎？盖必待其人焉耳。”^⑨

湖志凡例十二条。第一条提出：“本志与其他山川志不同……兹则地险为滇黔楚蜀之咽喉，水利资长岳澧常之蓄浚，关系甚巨，载笔尤宜详慎。”第二条指出记述范围为三府一州八县（岳州府的巴陵、华容二县、常德府的武陵、龙阳、沅江三县、长沙府的益阳、湘阴二县，澧州直隶州的安乡县）。第三条说明本志不设沿革一门，理由是“地有沿革，水无沿革”。第四条说明“兹志沿例直书”，“虽大吏亦称官称名”。第五条说明该志引用资料，“皆标本书名目”，对“有纪载互异抑或义有未安，间参鄙见”。第六条对记述的堤垸，明确为“与湖无涉者不录”。第七条说明“游览一门，统举古今来名贤硕彦功德文章卓然可见者”。第八条说明因“取材于各府州县志”，地点仍照“州县志体裁，抑亦不失文献之旧，使后之考实者有所据云”（如某地在县东、县西而不作在湖东、湖西）。第九条说明碑记列入艺文，而不另设金石门。第十条说明“一人之诗文有关洞庭者亦不必尽录，择其尤者而著录之”。第十一条说明与原本各门类记述内容的增益情况。第十二条说

明艺文分目情况。

湖志分十四卷，凡十八门：舆图、皇言、分星、湖山、水道、洲港、堤垸、税课、舟筏、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游览、事纪、摺摭、艺文。

湖志有手描图九幅：志首列“洞庭湖三府一州八县四大水入湖全图”（图后有二千多字的说明），本图为万再订时所增，可代表道光初年的洞庭湖全貌，荆江入湖有虎渡、调弦二口；舆图篇有图八幅（洞庭湖图，洞庭北望图、洞庭东望图、洞庭西望图、洞庭南望图、岳阳楼图、君山图、洞庭秋月图）。该篇文字说明中称：“旧图止有东西南北四图”，其余四幅为万再订时所增。

皇言篇有清代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及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祭洞庭湖神”一文。雍正九年、十二年有关修建舵杆洲的上谕，乾隆十二年、二十八年及嘉庆六年、七年有关湖区筑堤及严禁私挽的上谕及湖南巡抚奏折。有趣的是，在此门设置上万年淳与陶澍产生了分歧。万认为，以“皇言”为第一，但内容太少，祭文可收入庙祠，修舵杆洲石台和堤垸上谕可收入堤垸门，其他内容可入赋税门，不主张单列在志首。陶澍在定稿时否定了万的意见，一来可能出政治上的考虑，以皇言来宣示朝廷对湖区民生的重视，再者，当时湖滨已堤垸如鳞，已有与水争地之势，湖面愈狭，漫溢冲决为患甚巨，作为安徽巡抚的陶澍也正因为治淮治运而大伤脑筋，他看到邸报上两湖地方官员与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几位皇帝上的折子和朱批，这种份量显然与其他门类不可比拟。

分星篇设分星异同、星位星

度、昏旦度、星占、杂占，后附“分星论”。这种以天上星宿与地上疆域位置对应，据以“察灾异、观迁变”的说法，湖志编修者也认为“大抵天道湛密，不易窥测，星事凶悍，变迁不一，星家之说不可一例推也”，反映前人的一个人文观念。

湖山篇按湖、山分记。湖泊记有巴陵、华容、安乡、武陵、龙阳、沅江、湘阴7县共222处，分县记载湖名与位置，但有的仅记湖名，有的略述源委。对华容东北境、安乡北境及武陵县境内“距洞庭甚远之湖”，均未列入。对历史上洞庭湖各种名称有详细考证，从《山海经》到《太平寰宇记》，罗列湖名，但对湖泊的形成与发展、水位与泥沙等关键内容没有提及。而对洞庭湖群的大小子湖分属县记载甚详，对于今天我们研究洞庭湖区的演变有重要参考作用。山记有巴陵、华容、龙阳、湘阴、沅江5县共63处，大都记山名、位置，有的条目点缀山上胜迹和有关民间传说。

水道篇主要记述湘、资、沅、澧四水及其主要支流和几处独立入湖水道，荆江入湖水道则记述简略。篇首小序称：“爰考水经，参以咨访。”从记述内容看，属于咨访的不多，源流分合也不够详明。湖志编修者将水道探源的内容分散收录在艺文门内的记、议、考、辨中，使水道篇内容显得单薄，我们可以从中窥测编纂者的人文价值取向。但水道中沅、湘水系概念非常明晰，对于两百年前做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

洲港篇按洲、港分记。记有巴陵、华容、安乡、武陵、龙阳、沅江、湘阴7县的洲（滩、圻、咀、埭、脑）84处，港（江、溪、潭、浦、池、窖、夹、口）184处。篇首小序称：“水渚曰洲，水分流曰港。”后者如与水道篇并记，水系会更加明晰且阅读方便。

堤垸篇按县分记。记有巴陵、华容、安乡、石首、武陵、龙阳、沅江、益阳、湘阴9县的堤（垸、围、障、托）近200处。华容东北境“堤垸尚多，因距洞庭甚远”未记，石首仅记柳家堤一处（注明“防洞庭水患”），“境内堤垸甚多，俱防江水，与洞庭无涉”未记。益阳则注明：“堤垸皆为防资水而设，然资水之泛滥皆因湖水之壅遏，虽云防资，究所以防湖也，故录之。”本篇对纯属防水之堤与围挽之堤垸未加区分，武陵县还将陂水堰、渠列入，大多数堤垸未记保障耕地面积，均为不妥之处。湖区开发以筑堤挡水、化湖成田为主要，也是江南水乡开发的一种模式。保持水的自然状态与向水面索取更多的生活物资是一对矛盾。湖志编修者看到了这个问题，“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固已然。如洞庭诸湖濒之平旷衍沃，使概委而弃之，则膏腴之壤胥为蜃蛤之乡，良可惜也。圣主轸念黔黎，大沛膏泽，于各邑民堤外，动支帑项更建官堤，每岁饬令有司督民以时修筑，俾垂久远，盖保障之利溥矣。”这不是书生议论，可以看到陶澍、万年淳等人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政府官员考虑问题的角度。编者录入的堤垸按“其高厚，广袤

之数”排列，则是现代治湖中重点堤垸和一般堤垸概念的滥觞。

税课篇记述巴陵、华容、安乡、龙阳、沅江、湘阴6县的芦课、湖课、渔课的征课银数。立意“一丝一忽，上关天府之贡赋，下藉部屋之输将”，但主要为宣扬清朝的“敛至薄恩至厚”。芦课地亩包括上、中、下熟洲地和密、稀芦洲地，仅有巴陵、华容、龙阳3县。其余3县仅征湖课、渔课。

舟筏篇内容较少，主要记载运粮船的形制吨位、造价、船工船帮等，体现洞庭湖舫千里的水乡特点。篇末记巴陵县舟筏，包括运粮船、战舰、木牌、救生船。

兵防篇记述清代在岳州、龙阳二处设营驻兵情况，篇末附东湖（明山以东）、西湖（明山以西）水程。与舟筏篇内容排列归属关系零乱，战舰置于兵防比较适宜，而水程则应附于舟筏。在兵防论中提出了人为战守的决定因素，“战器不如战地，战地不如战人”；“有器而不得其地，虽有器无益也；有地而不得其人，虽有地无益也。”

风俗篇记气候、候风、舟中避忌、竞渡、作粽等11条。编者提出了“燥湿殊而风俗异，虽圣王有不能强齐者”的观点，认为湖区水乡“亦有非陆地所得而概者”，为我们至今所沿用。唯篇中对气候、候风、落槽分洪、翻流水、石米斗米的记述，已与风俗无关，属于自然、气象和水文等学科。

物产篇分鳞、介、木、竹、果、蔬、谷、瓜、药、草、花、兽、禽、货等类记述，篇末附“物产论”。本篇对湖区特产，记述较

为具体。“其近地之争利者不能禁御，惟一切断入于官，听民开垦，因地之高下定赋之厚薄，限年清垦，毋俾胥役因缘为奸，任水去来，不许私筑堤垸，岂不于国计民生不有裨乎！”湖志编者提出了湖区开发要以人不与水争地的观点，此后二百年的历史证明，前人是具有远见和智慧的，这也是道光志的一个亮点。

古迹篇记述岳州府城、君山及巴陵、华容、安乡、龙阳、沅江、湘阴等县名胜古迹75处。

祠庙篇包括寺观，共记述28处。与古迹篇均缺常德府、澧州的内容，而长沙府、岳州府所辖湖区县以巴陵县华容县内容特别多，有失偏颇。

游览篇主要记述曾来洞庭游览的文士、名人，该篇小序称：“洞庭游览自屈原始”，“汉晋以来，代有名公巨卿周流游览题咏于其间”，只“择其卓然表著”录之，共记载88人。小序称洞庭游览自屈原始，显然不符合事实。历代人士的时序排列较为零乱，硬伤较多。篇末的论曰，实为艺文篇概述，缕析和评品洞庭湖文脉，而非游览本身，张冠李戴，为本志的瑕疵。

事纪篇分朝代记述，上自唐虞，下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事纪内容包括“天事、王事、人事”，“三者惟战守(人事)最多，故宜详书之以垂警戒。”天事中记述灾害较详，并有较多的地震纪实。

摭摭篇分摭地(12条)、摭人(16条)、摭事(16条)、摭神(74条)、摭仙(12条)、摭释(8条)、摭物(21条)、摭诗(11条)及补遗。其中考证洞庭湖神柳毅，增加陈卷山的说法。陈卷

山为陶澍万年淳友人，出游京师，曾携夏大观稿本南下，后任宜章司铎，他发现宜章县土著柳氏奉柳毅为远祖，认为不可靠。万采用了他的意见。摭摭篇内容取材十分广泛，涉及神祇和社会百态，是研究湖区民间社会生活弥足珍贵的资料。这一内容是道光志作为人文山水志最核心的部分，价值不在艺文篇之下。

艺文篇辑录骚(4首)、赋(13首)、记(15首)、碑记(11首)、文(3首)、序(4首)、疏(1首)、启(3首)、议(2首)、解(2首)、辨(4首)、考(9首)、诗(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五排、七排、词、四言、六言、联句、集唐)等共约1007首。“录其有系于湖者，以资考核。”其中，议、解、辨、考所辑录的一些文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

道光《洞庭湖志》是洞庭湖历史上唯一的专志，第一次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湖区的水道、湖泊、山峦、洲港、堤垸、赋税、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第一次用编年体的方式记述了湖区的礼祥、藩封、兵战，第一次以摭摭的形式记载洞庭湖众多的古史、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掌故、逸文逸事，第一次最为完备地收录了洞庭湖的历代诗文，这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可以看成十八世纪末以前中国社会政界、知识界认识、研究洞庭湖的整体成果，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值得十分重视。

道光志编者提出了“不与水争地”^①的治湖治水思路，这是今后洞庭湖保护治理和开发的宝贵思

想财富。在十八世纪以前，江湖关系呈相对简单的自然状态，但因泥沙淤积，洞庭湖围垦加速，人类活动因素对湖泊演变的影响也在加速，人与水的自然状态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湖志编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的信息。万年淳在《修永济堤议》中写道：“近日对江洲地渐淤，君山后湖一带广轮数百里，秋时水落，虽可以艺植，终当听水之去来，而不可与水争利。”在堤垸篇小序中开宗明义说“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这个思想贯彻湖志始终。对于处于江湖关系巨变前的十八世纪，历览四口南流局面形成后的洞庭湖兴衰起伏，后来人不得不佩服道光志编纂者的眼光。在治湖理念上，前人的经验值得总结，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湖志的编修于十八世纪，刊印于洞庭湖沧桑巨变前夕，保存了洞庭湖全盛时期的历史面貌。在《湖山》中载明：“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水涨则长江亦与湖相通，虽江北之荆州、安陆、德安等郡水所到处，皆可目为洞庭，自近代沿江各建堤垸，湖端尽成阡陌，长江得以循堤而下。斯江之形势分，而洞庭一湖亦遂以长江为界，显其畛域焉”。其舆图勾画了湖泊丰水期间的水位线，为我们推算全盛时期的湖面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更显得十分珍贵。

湖志编者提出了编纂湖泊志的一些原则，如《凡例》中提到少铺张胜景，详写湖区水利的原则，万年淳在序中重申“不似太湖、西湖之志，仅记景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镂而已”，这一系列看法和主张应该是湖志的后期编修人员在总

结旧志人文山水志和湖志前期编修的成败得失后,根据当时现实考量做出的编纂指导思想上的调整,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也是现实实际需要,提高志书使用价值的一种探索,虽然这一些主张在刊出的湖志中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但为后来的自然实体志编纂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仍然十分难能可贵。

道光《洞庭湖志》编修历七十余年,多人参与这一项工作,各种资料均取材于湖区各府州县志,万年淳在谈到编修湖志调查研究的难度时说,“非买舟沿湖上下,一年半载,访问明白,不能猝办。”即使今天,也难做全,所以其弊病和缺点也在所难免。其主要的有:从全志篇目内容上看,仍然没有摆脱旧志人文山水志的窠臼。记载湖区自然面貌的篇幅仅3.4万字,只占13%,其中水道仅2760字,湖港仅6900字,湖山仅9200字。人文社会内容,仅艺文类,就篇幅浩繁,共计19.5万字,占全志71%。文人士大夫的吟咏唱和之作,分量超过全志三分之二,实际上仍然是“记景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镂”,与传统的太湖志、西湖志没有多少差别。因为编者多为巴陵、华容人士,在全志资料和取材上,奇重奇

轻,岳州府的内容多,长沙府、常德府、澧州的材料相对较少,而湖北荆州府所辖湖区县的材料更少。即使艺文所收录,内容也较为狭窄,诗词1007篇,名称以巴陵、岳州、巴丘、岳阳4者为题目的有404首,以岳阳楼、南楼为题目的有244首,洞庭湖区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特色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岳州代替了洞庭湖,岳阳楼诗词取代了洞庭湖题材的创作。其二,从记载湖泊水域实体内容上看,反映湖泊流域水系的多,特别是对“九江”、“五渚”、“湘江”等的考释,连篇累牍,对湖泊水面的记载相对特别少。将洞庭湖主体列入湖山一门,本已不太科学,而对“洞庭湖”的记述,竟然列入巴陵县条下,就更加不合适。十八世纪的洞庭湖,其主体水面跨越几个县,号称八百里,至少已覆盖巴陵、华容、湘阴、沅江、龙阳等县域,道光志的编纂者在7个县的条目下记述了大量的子湖,按其自身的说法是“洞庭一区,广逾八百。以子湖计之,累百盈千,指不胜数”,^①记载洞庭湖这个浩浩荡荡的大湖,只有区区五、六百字,岂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本来很小的篇幅内,对湖泊的形成与演变、泥沙的

输送和沉积、堤垸的围挽与兴废,以及湖区范围内有关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方面的记述,则更难得一见了。

湖泊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历史上江南的开发利用都与湖泊湿地相关联。洞庭湖的开发模式形成和发展,为大江大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表率,她是湖南的“母亲湖”,也是天下粮仓,从战国时期楚国开始,其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板块早于湖南其他地区。道光志间接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定位,它不仅体现了政界对湖区的管治,也反映了知识界精英分子对湖泊地区的认识和感知,总的看来是瑕不掩瑜,可视为十八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各界对洞庭湖的探索与思考的总汇,值得今天我们重视。

①万年淳《与宣城令严半农求刻纂整柱〈洞庭志〉启》,道光《洞庭湖志》卷十,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78页。

②道光《洞庭湖志》卷十,第227页。

③⑤⑥道光《洞庭湖志》万年淳序。

④道光《洞庭湖志》陶澍序,又见《陶澍集》下册。

⑦道光《洞庭湖志》卷十,第286页。

⑧道光《洞庭湖志》卷二,第40页。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志坛文艺

诗联二首 ● 李羽立

七律·神舟十号会天宫

蒲艾粽香漫域中,谁征碧昊越苍穹?
神舟十号探星宇,壮士三君唱大风。
一桌新题求解析,次轮佳客驻天宫。
太空授业超凡事,遥课诸生识变通。

敬悼刘人寿吟长联

近日惊闻人寿公仙逝,闻窗外鹤
声啼唤,怆然作此。
吟席远闻名,每每捷才惊满座;
嚶鸣长引领,声声杜宇泣诗翁。

年鉴条目及其撰写*

● 邓建平

条目是一部年鉴的基本构成单元和内容主体。条目撰写是年鉴合成的核心，条目质量的高低是评判一部年鉴质量的主要标志。基于此，本文结合年鉴编纂实践，就年鉴条目类型及其要素规范、撰写年鉴条目应把握的原则、条目内容质量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年鉴条目类型及其要素规范

将年鉴条目进行科学分类，分别研究其构成要素、特点和撰写要求，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探讨条目撰写的基本前提。

关于年鉴条目的类型，年鉴理论界来说法不一。有的根据条目篇幅大小或反映对象的份量，将条目分为重点条目和常规条目；有的按条目反映面的宽窄，将条目分为概述性条目和典型性条目；有的则将条目分为重点条目、常规条目、综合条目、专题条目四种类型；有的根据条目反映信息的深度将条目分为浅表性信息条目（包括常规浅表性信息条目和非常规浅表性信息条目）、深度信息条目（又可细分为调研报告型条目和综合记事型条目）。我们认为，根据条目的基本资料所涉及的范围和条目的内容性质，年鉴条目应划分为综合性条目和专题性条目两大类。下面分别就其子类与要素规范加以阐述。

1、综合性条目

综合性条目，是指综合记述一个地区、部门、行业、学科发展全

貌，或综合报道社会生活中某方面重要情况的宏观条目。这类条目一般包括定性叙述、基本事实或主要过程、因果关系等基本要素，以年度内工作考核指标和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完成情况等特点为基本内容。它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可比性特点，其选题选材是全方位的，同一主题的任何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层次的材料都不应疏忽。在此基础上，运用概括、总结、归纳等手段，将分散的、杂乱的信息熔炼成集中、系统的信息，综合展现所反映事物的全貌，向读者提供综合性的、高层次的信息。

综合性条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综述、概况、综合记事三个子类。综述条目侧重于揭示年度内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及趋势，概况条目侧重于勾勒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全貌，综合记事条目则着重反映某类重大事件和其他重要信息。由于记载的重点有所不同，各有侧重，这三个子类条目的内容要素也有所区别。

综述条目。设立综述条目的一般是所辖类目繁多的大部类。综述条目在年鉴中属于分目层次，置于部类其它分目之首，统领部类内各方面的信息。它的选题选材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各条目各具特色，相互间又具内在逻辑关系，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条目群。其显著特点是既综合概括，又适当分析。撰写原则是简述背景，勾勒总貌；综述成就，分述特点；纵横比较，彰明得失；简略评述，预测方向。

概况条目。概况条目是系统记

述分目标题引范围内的全面情况的条目，综合反映一个部门、行业的基本情况。其主要特征和基本要素是记述内容的全面系统性和文体表述的综合概括性，基本要素包括行业、部门的年度基本情况、主要工作指标和成就、主要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等。

综合记事条目。综合记事条目是年鉴条目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记述的是行业某一侧面的年度重要信息。其主要特点和根本要求是综合性与记事性的有机统一，通过运用概括和归纳的手法，反映记述客体“面”上的主要事实，概括事物各个层次的特点，提供“线”上的重要信息。

2、专题性条目

专题性条目记述的是一个地域、一个部门、一个学科的某一方面或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它通过对一个个“点”的记述，反映出地域特色、行业特色、部门特色、学科特色、年度特色。这类条目要求题材单一，记述具体，信息确切。专题性条目是拓展年鉴有效信息量的重要表现形式。

根据其记载的内容，专题性条目可划分为记事条目、机构条目、会议条目、产品条目、资料条目、人物条目等。

记事条目。记事条目指记述某一具体事物、事件和现象的条目，是专题性条目中最常见的类型。它以资料重要、信息新颖、内容生动见长，是年鉴内容更新的主体。其基本要素包括事主、时间、地点、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SZKT(Z)004。

过程、原因、结果等。

机构条目。机构条目指记述年度内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条目，一般以年度内新成立或有重大发展变化的重要机构为记述对象。其基本要素包括机构名称、简要沿革、隶属关系、组织形式、基本职能、年度发展变化和突出成就等。

会议条目。会议条目是以年度内重要会议为记述对象的条目。主要内容包括会议名称、召开时间、地点、主办单位、主要议程议题、取得的成效或产生的影响，重点反映会议取得的实质性效果，而会议的气氛和程序可以从略。部门或行业的年度工作例会和没有实际成效的会议，一般不立目记述。

产品条目。产品条目是记载年度内重要新产品、新成果或获得重大奖励的产品成果的条目。主要内容要素包括产品或成果名称及其研制完成者、完成时间、主要技术性能、质量特点、鉴定或获奖情况、推广应用效果、生产能力或市场状况等。

资料条目。以资料介绍为主的条目。主要用于介绍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机构、职工队伍状况，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一项工作的发展现状，反映某项经济技术指标、某项产品或某项工作成果在全国、全省、全行业、全学科中的地位，推介重要的学科知识和学术观点、历史名胜、旅游景点、风土人情等资料。

人物条目。人物条目即以人立目，介绍人物的条目。年鉴入目人物一般包括先进人物、新闻人物、著名专家学者、重要逝世人物等，所选录的人物必须具有强烈的年度感，重点突出，表现集中，所辑入的资料要有鲜明的新颖性和高度的准确性。人物条目的基本要素包括人物姓名、性别、职业、职务、职

称、政治面貌、民族、出生年月、出生地、简要经历，主要业绩等。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传略、名录、表。传略是一种人物简介，主要用于介绍有突出贡献或特殊影响的人物，一般还会配有传主照片，篇幅精悍，信息容量大，记述生动，视觉效果直接。名录主要用于简介名人、新闻人物、领导人物、逝世人物等。表即人物表，常见者有任职表、英模表、先进人物表、获奖表等，它的信息容量大，全面系统，检索性强。

二、年鉴条目的撰写原则和基本要求

条目撰写是年鉴编纂的主体和基础，条目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年鉴的内容质量，甚至可以说，条目的质量是年鉴的生命。要撰写好条目，必须把握住其撰写原则、选题选材、文体文风和内容质量诸方面。

1、严格遵循条目撰写原则

年鉴是系统编辑某一地域、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纂出版的资料性文献。撰写年鉴条目，要紧密结合年鉴的内容，以编纂出资料翔实权威、反映及时、信息含量密集的真实系统、科学严谨、全面规范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鉴内容质量的规范要求撰写条目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四：一是开门见山，直陈其事。年鉴条目要求用平易朴实的语言，把事情交代清楚，无须按照一般写文章的程式去套，切忌“戴帽子”。二是用事实说话，寓理于事。事实是条目的灵魂，条目必须把事实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写清楚。条目撰写采用纪实手法，完全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情况和事物，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让读者从中获得信息，得出结论。三是重点突出，就实避虚。撰写条目要尽可能减少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防止以偏概全和内容残缺的现象发生。但由于条目篇幅的限制，必须要用概括性手法来处理资料，突出重点。概况和综述性条目要有宏观意识和全局观念，强调从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去记述某项工作、某个领域的发展变化情况，防止一般化地堆砌过程、记流水账的弊端。必须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概括，把握主线，拓展深层次的资料，适当反映事物的各个层面，使主体深化。专题性条目重点突出当年的大事、要事、新事和具有年度特征的事，要写出深度，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和在同一层次上重复。四是文字要精练，结构要严谨。年鉴的简约性规范要求年鉴条目撰写尽可能简明扼要，概括情况宜用点睛之笔，叙述事物惜墨如金。在能够准确表述内容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最精练的文字陈述事实，尽量去掉那些铺陈过渡和起承转合一类无实际内容的词语，省去那些空话、大话、套话以及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力争做到无一赘词冗语。

2、优化条目选题选材

选题，是根据年鉴框架规定的范围和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条目的具体题目。选材，是根据选定的题目，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筛选出可资利用的素材。优化选题选材，是提高条目内容质量的前提和基础。

条目选题选材必须依照统一的原则、标准和时限。条目的基本内容以年度动态信息资料为主，题材的时限一般都规定在上一年度之内，或以上一年度内的共同资料为主，设条标准和选材原则是其资料的社会价值，亦即其提供的信息量

和信息的价值量。与此相适应，条目的选题选材必须全面系统、真实可信、富有新意、具有特色。

全面系统。选题选材全面系统要求年鉴对应范围的主要领域没有重大遗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且密集程度高，资料相对完整。要做到这点，条目的撰写者要从上年度各方面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选择具有指导价值、现实价值和存史价值的大事、要事、新事加以记载，应能反映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多样性、连续性、可比性，使之系统化。同时，选题还应有层次性和平衡性。所谓层次性，指在一个领域、一个部门、一个学科内，要使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选题达到有机结合，层次分明，互相呼应，相互补充。所谓平衡性，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使各个部类、分目中选题立目的数量与其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相适应，做到综合平衡，详略得当，防止畸轻畸重，本末倒置。在实际工作中，任何年鉴和条目都不可能穷尽相应领域的全部情况和信息资料，但主要领域的基本情况、主要指标数据和其他重要信息资料应当齐备。不应因撰稿人的个人好恶或资料收集的艰辛而发生大的遗漏。

真实可信。年鉴内容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质量要求决定条目选题选材必须真实可信。首先，客观地反映事物，选题选材不受功利主义需要左右，记述事物不掺杂撰写者个人观点。其次，年鉴条目选择能反映事物本质和主流以及预示事物发展方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息加以记载。第三，选题选材必须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如实记录社会现实和各个领域的动态信息，做到基本情况、基本资料符合实际，事实准确，各类数据准确，撰写表述准确。既记载发展、成就和经验，也反映困难、问题、失误和教训，真实地记录历史，使

之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第四，杜绝反科学、伪科学的内容，消灭知识性差错。

富有新意。年鉴的年度性特征决定它必须为使用者提供新情况、新资料。这就要求条目选题选材必须富有新意，追求鲜活，及时反映新情况、新进展、新成果、新事物、新问题。选题必须是年度内发生的新事物，选材必须反映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征，要善于发掘和选择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生事物。条目撰写要逐年创新主题，更新内容。一方面，非稳定性条目推陈出新，记述好年度的大事要闻等动态信息，全面反映年度新事物。另一方面，稳定性条目逐年更新内容，全面更新地方、部门和行业概况以及某些相对独立的领域和一些职能部门主要业务的基本指标数据，并以年度内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来替换旧的内容。

具有特色。年鉴的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是通过其主体条目表现出来的，条目的选题选材必须突出地区特色、行业特色、学科特色，突出时代特征和年度特点，重点记述年度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and 人民生活的重大事情、重大问题。条目撰写人员要有敏锐的视觉，抓住各自地域、部门、行业的工作重点，年度内的新情况、新事物、新成绩、新特点，从独特的视角选题选材，筛选出独具特色的题材进行记述。同时，条目撰写者还应能站在宏观高度，把握住各自地域、行业、部门的大事要闻，尽量减少对日常事物和一般工作情况的记述，从而突出富有特色的资料。当然，通过对内容的精心安排，达到自成一格，也能使条目特色更加鲜明。

按照全面系统、真实可信、富有新意和具有特色的原则，符合条目选题选材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地区、部门、行业、

学科的概况；二是年度内主要活动及实绩；三是具有显著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的重大社会事件或自然现象；四是获得重大奖励的事项和人物；五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事物；六是其他重要信息资料。

3、正确使用条目的文体和语体

条目的文体。文体亦即文章体裁。年鉴条目的内容和功用决定其只能采用说明体和记叙体两种体裁。说明体主要使用定义、诠释、分类、分解、比较、图表等方法，对事物进行说明。在年鉴中，它主要用于介绍基本情况、综述主要成就、解说事物、简介人物、揭示问题、阐明事理的条目。记叙体是运用录实、叙事、记人、写景、状物等方法对记述客体进行描述的文体，主要用于记述行业业绩、单一事物、景物、会议、人物、重大活动的条目。

条目文体的基本要求是篇幅短小精悍，写法直入直出，内容要素规范。通过大量采用说明体和部分采用记叙体，以及二者的交叉使用，使得年鉴条目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大为提高，并呈现出年鉴条目的独特样式和风格。

条目的语体。语体指言语交际所必须遵循的体式 and 风格。年鉴是一种年度资料性文献，也是政府年度公报，其条目宜采用公报语体。这种语体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是选词通用化，尽量采用人民熟悉的、广泛流行的词语进行表述；用词务求准确，推崇实话实说，杜绝假话和虚浮之语、溢美之词，不容易出现歧义或笼统的词语；措词务求平正质朴，实事求是，不随意褒贬，忌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不刻意追求“时髦”辞藻，不用或少用形容词；修辞崇尚简洁、平实、明快的风格，而戒繁丰、藻丽、含蓄的格调；注文尽量简化，句式宜短不宜长。

4. 提高条目的内容质量

条目内容质量是年鉴质量的基础，而衡量条目内容质量的标准主要是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亦即条目的有效信息含量。有效信息是指符合受众目的的信息。一条目被检索的频率越高，被引用的内容越多，消除疑问的程度越大，其有效信息含量就越高，条目的内容质量也就越高。反之亦然。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条目的内容质量呢？我们认为，至少应把握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条目的内容必须完整充实，选题选材应有全方位的考虑，同一主题的任何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层次的材料都不应疏忽，要提供反映对象的完整信息。第二，确保条目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是年鉴条目内容信息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要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据实而录；要严格审核，确保条目内容符合事实，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国家规定的统计口径和对外宣传口径，符合科学常识。第三，提高综合性。充分运用概括、归纳等手法，将分散、杂乱的信息熔炼成集中、系统的信息，使条目在尽可能短的篇幅里容纳尽可能多的信息量。第四，实现专题性。条目的序列化，以保证在有限的面积上有效地增大信息的密集程度，并防止条目编写的随意性。第五，适当增加知识性主题。及时整理年度内出现的新知识、新概念，并对已形成稳定知识内容的主题，及时设目立条予以反映。第六，有效使用好附属资料。有选择地选录一些附属资料，扩大条目的内容，增强其实用性。通过使用统计表、示意图、名录、目录、文摘、照片、小资料等多种形式，发挥这些附属资料篇幅小信息量大，内容直观，题材灵活的特点，充实条目内容，提高条

目的实用性。这其中，条目内容的准确性是提高条目内容质量的关键。事实准确、表述准确、数据准确，这才是条目资料的价值所在，也是年鉴的价值所在。

要保证年鉴条目内容的准确性，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反映客观事物。其次要不断提高条目撰写人员的素质。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记述是否如实准确，主要取决于撰稿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高低。撰稿人员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政府的中心工作；要学习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分析问题，不断提高研究资料、提炼资料的能力；要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将事实简洁准确地记录下来。

5. 增强条目的可读性

年鉴是公开出版物，读者具有社会广泛性，因此，年鉴必须不断增强可读性。质量高的条目，不仅要主题鲜明，资料充实，结构严谨，而且还要做到遣词造句的准确生动，使人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悦耳，韵味悠长。为此，条目的撰写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主题鲜明生动。选材要有个性，应从总体上和全局中把握记述对象的社会意义，从浩繁的信息中提炼出最有代表性的资料，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掘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年度效应的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从而提供能满足社会和读者需要的信息。二是文字通俗晓畅。条目的语言要准确明晰，必须使用规范化的语言，遣词造句既尊重文法语法，又合乎生活常理；词语的运用要清楚明白，简洁洗练，要切境、达意、适度、得体。条目的文字必须平易通畅，要用普普通通的话，用大家都懂的词语，写出特色，写出深度，做到事顺文直，情直理顺，词稳笔

畅。条目用词要新颖生动，“随类赋彩”，脱套出新，形象生动，富有情趣，以情感人。三是笔法灵活新颖。条目撰写要遵循全书统一的规范，无规范则编不出严谨的、独具风格的年鉴。但是，条目的规范化并非要求笔法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恰恰相反，条目的规范化提倡在统一的规范下体现各自的特征。就一个具体的条目而言，可以在其内部要素配置、修辞手法、起始结尾等方面灵活处理，在一定的规范内求得笔法的生动灵活。四是语气亲和亲民。除专文、文献外，条目不能使用命令式，说教式语言，以免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失去可读性。

年鉴条目及其撰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种实践活动，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多方面的探讨。随着年鉴事业的发展 and 年鉴编纂实践的不断丰富，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更加深入，成果会更加丰硕，对年鉴编纂的指导意义也会更大。

主要参考文献

许家康：《年鉴内容质量评价标准与条目编写》。《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6期。

李善忠：《条目质量是年鉴的生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

高生记：《再议总纂在年鉴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4期。

许之标：《从百科全书的条目性质来看年鉴的条目性质》。《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陈超萍：《如何撰写深度信息条目》。《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王占生：《年鉴条目内容的编辑》。《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浅议年鉴创新的现实需要及创新途径*

● 杨盛让

自2001年以来,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创新为号召,努力促进年鉴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希望通过创新框架、充实内容、张扬个性,办出特色,进一步提高年鉴的编辑质量,促进年鉴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这几年,年鉴创新已成为年鉴界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年鉴编辑部门的自觉行动和努力方向:在年鉴创新方面作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年鉴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探索的领域很广。在此笔者就年鉴创新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年鉴创新是现实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年鉴编纂工作的重要指南和基本思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作为文化产品的年鉴存在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年鉴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年鉴无法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年鉴改革创新关系到年鉴的发展方向和生命力。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年鉴如果不改变刻板单一的形象,将有可能走向死胡同。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1、作为信息载体,年鉴与其他信息传媒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其传播信息的手段和方式原始单一,缺乏动态感观,难以吸引读者;其传播信息的时效性较差,不能快速到位,难以满足社会各界对相关信息及时了解的需要。因而其在信息领域的生存空间将日益缩小,生存压力逐渐增加。

2、管办分离给年鉴的经营运作带来极大挑战。当前,国内年鉴不论综合性年鉴还是专业性年鉴,多由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主办,一直享有“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根据2003年7月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精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党政部门所办期刊中,属于年鉴专业

技术类别,并确有必要保留的,可仍由主管单位主管,但要划转到部门所属具备条件的相关单位主办,实行管办分离”。作为“背靠政府”的年鉴实行管办分离,就意味着今后不得再打着政府的旗号去征集广告和搞发行,这对运转日益艰难的年鉴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3、年鉴官味较浓,服务面较窄。长期以来,地方综合年鉴奉行的宗旨是为党政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详尽的地情资料,因而把党政机关领导、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作为年鉴的主要服务对象,服务面较窄。要想将读者群定位于上至各级领导,下至寻常百姓,能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要,目前的地方综合年鉴尚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胜任。

因此,年鉴创新是现实的需要,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年鉴的生命所在,创新势在必行!

二、年鉴创新的途径

1、年鉴性质和功能定位要有新的突破。

长期以来,我们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年鉴称为“官书”、“史册”、“政府年度公报”。这些说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 SZKT(Z) 009。

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新创办的年鉴，对于争取领导重视、争取资金、争取读者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些说法并不能完全代表年鉴的性质和它的功能，而只是反映了年鉴的某个方面。受其影响，当前不少年鉴将其读者群普遍锁定为党政领导、公职人员和科研工作者，服务对象较为单一。编辑出版的年鉴，多数则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书一样”。因此，年鉴创新，首先要从年鉴的性质和功能上着手。年鉴的性质是资料性工具书，其功能是“服务”。一是可以为党政领导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二是可以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翔实、全面、准确、权威的地情资料，三是可以为国内外人士提供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招商以及旅游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功能的大小，决定着读者面的宽窄，读者的多少决定着年鉴生存空间的大小。应当说，这几年，一些办得好的年鉴，其主要优势就是突出了“资政”、“服务现实”这一功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在读者看来，年鉴所提供的信息、资料与自己的需要联系密切，既可读又可用，这样年鉴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年鉴的这种“资政”、“服务现实”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它既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书籍，也不同于地方志，更不同于其他资料手册或地情书之类的书籍。

2、年鉴框架要有新的设计。

年鉴框架是年鉴工作的蓝图，是年鉴内容的载体。经过20多年的

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政府机关职能逐步从领导型转向服务型，朝优质、高效、廉洁方向发展，经济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而作为全面记述一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变化情况的年鉴，更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方面，国外年鉴比我们做得好。比如《新加坡年鉴》，作为一部国家级年鉴，《新加坡年鉴》总共才只有30米万字，相当于我们年鉴通常体量的1/3至1/5，但内容却并不显得单薄。究其原因，主要是其框架简约，全书只有24个类目，少而精当，类目下直接记事，避免了我们年鉴采用多层复杂型框架带来的一些弊端。24个类目均设有与内容相关的整幅图照，类目之首均设有概况性论述、“一年回顾”及纲领性标题，其类目、分目、条目标题及正文均采用不同颜色及字体，以示区别。

框架创新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与时俱进，优化结构。框架总体设计应同一地之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同轨同步，充分反映当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二是突出地方特色，彰显自我个性。这方面，目前国内兄弟省市年鉴和我省有关县市年鉴都不乏成功之作。如《上海年鉴》突出了“外向型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云南年鉴》突出了“旅游”、“烟草”和“花卉”。我省的《浏

阳年鉴》和《耒阳年鉴》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浏阳年鉴》突出了“烟花”、“花卉”、“菊花石”，《耒阳年鉴》突出了“电力”和“煤”。三是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框架创新要在继承原有框架优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继承好的东西，搭建新的框架，深化主题和内容，做到相得益彰、优势互补，而不是一味地求新求变，把原有的纲目搞得面目全非。四是排列科学、合理。框架创新切忌为创新而创新，标新立异，而应在类目划分、内容归并、资料排列组合等方面讲求科学性和逻辑性。如果框架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较差，就好比人因骨骼错位而成为畸形，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也没多大用处。

3、内容选择要有新的思路。

内容是年鉴的主体和生命。年鉴只有不断更新内容，做到内容全面、丰富、准确，才能增加可读性和生命力。年鉴内容的选择应以有利于增加有效信息量、为读者喜闻乐见和满足读者的需要为标准，凡是有助于增加年鉴有效信息量，能够为读者喜闻乐见和满足读者需要的都可以尝试。这方面，国外的年鉴要比我们的年鉴做得好，如《新加坡年鉴》载有“访谈录”，以访谈的形式将大众关心的热门行业、热点问题以及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载入年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关于内容选择上的创新，笔者以为应在以下方面作有益探索：

①选题选材的时空范围，必要时可以有所突破。过去，我们在年

鉴的内容选择上严格遵守以年有限，不越境而书，画地为牢，这无疑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长许家康先生在为《中国——东盟年鉴》搞策划时，就建议部分内容下延至出版年度的6月或8月，以体现年鉴的及时性和新颖性。事实上，国内不少年鉴内容选择的时空限制早已有所突破，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一些评估性选题，包括述评性文章和述评性条目，以及一些对实际工作有较强指导意义的前瞻性、预测性选题如果能载入年鉴，对于提高年鉴的信息价值和增加年鉴的服务功能都是十分有益的。

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反映客观现实。年鉴要全面反映现实，就要在如实记录新成就、新发展、新变化、新经验的同时，如实记录新困难、新问题、新矛盾。对于一些热门话题，一些在网络上、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的突发事件、重大失误、灾害性事故等等，年鉴都应有客观的记录，而不应一概回避。不能把年鉴当成“功劳簿”、“报喜鸟”，只报喜不报忧。诚然，成功的经验让人激动，使人鼓舞，催人奋进，但失败的教训同样弥足珍贵，使人警醒，引以为鉴。

4、记述方式和表现手法要有新的招数。

现代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各种群体对信息的了解要求便捷、快速。作为纸质媒体的年鉴应借鉴其他媒介的表现手法，与时俱进，用新的记述方式和表现手法来提升年鉴内容的表现力和活跃度已

经越来越显得必要了。因此，我们在增强内容的贴近性、加大内容的信息量时，要改进记述方式和表现手法，如中心工作、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的记述，都要有新颖、灵活的表现方式，让内容的编排有张有弛，广度与深度并重，严肃与活泼互补，富有新意和表现力。不要因循守旧，僵化地坚持条目是唯一的记述方式和一成不变的表现手法，一些重大事件、重点问题、热点问题，可进行多角度、多体裁、立体化地反映。要善于运用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和多种资料形式，如图、表、录等，坚持图文并茂，充分发挥图表的作用，将图片、表格与正文融合在一起，使其相得益彰。如《吉林年鉴》，随文配图就是一大特色，全书400多页，随文配图就达200多幅，不但增强了文字的直观性和吸引力，还解决了彩页收录图片有限的难题。图文并茂，既活跃了版面，又传神达意，有美不胜收之感。需要注意的是，选取图片，应力求信息含量最大化。

5、年鉴组稿要有新的方式。

年鉴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年鉴内容的创新。年鉴内容的创新说到底就是年鉴内容的充实，增加年鉴的有效信息容量，而增加有效信息量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努力挖掘、拓展深层次的资料，大量增加统计图表数量，成批量地增加指南性资料，以及荟萃地方知识性资料，这些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建立在各级政府机关的撰稿队伍是难以完全做到的。这就需要我们改变过去的思维定势，打破现有的单一的

组稿渠道，大力拓展稿源，拓宽组稿渠道，建立一种以各级政府机关为主、以自由撰稿人为辅的多元式的组稿机制，实行编辑直接采编（包括从社会宣传、传媒和互联网上采编）与组稿相结合，这样编、撰结合，既能有效丰富年鉴稿件的信息量，提高年鉴的编辑质量，又能促进年鉴的组稿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6、工作领域要有新的拓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WTO的加入，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年鉴过去那种编书、卖书、拉广告的经营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正逐步变得举步维艰了。年鉴事业要想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拓宽工作领域，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经营模式。在编书、卖书、拉广告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年鉴的权威性，以及年鉴涉及面广、信息渠道多的优势，大力开展调查、预测、论证、咨询等服务项目，将年鉴服务社会、服务现实的功能发挥得最大最全，将年鉴工作的涉及领域拓展得最宽最深。如马鞍山地方志办公室利用为《南京年鉴》撰稿所搜集到的资料，在《马鞍山日报》上开辟“走进南京都市圈”专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还有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充分利用《长沙年鉴》组稿面广、发布信息权威的优势，联合有关单位，开展年度长沙人物评选活动，将评选结果在各大媒体上公布，并在各主要宾馆内滚动发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成功的尝试非常

值得年鉴界学习和借鉴，它不仅扩大了当事人、物、事件的影响，而且也成功地将自身推向了社会，从而进入了社会公众的视线，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三、年鉴创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正确处理好年鉴创新与规范的关系。

当前，年鉴界不少同仁在谈到年鉴创新时，片面地把规范与创新对立起来，认为创新就会导致不规范，或者认为规范就会阻碍创新。其实，规范和创新是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两个重要手段，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规范在前，创新在后，规范是基础，创新是提高，年鉴只有在规范的基础上创新，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创新则是因人而异的。创新必须具备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来自于年鉴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更来自于年鉴编纂工作的实践，没有年鉴编纂工作的实践的创新是空洞乏力的，过分强调创新，就会使年鉴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基石，使年鉴不成其为年鉴，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创新还必须具备客观的创新条件，没有条件，就没有创新目标，便谈不上创新。规范不是机械地照搬照录，更不是一成不变。规范它强调的是年鉴的共性，而年鉴的个性则是多姿多彩的，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因此，规范和创新是年鉴编纂工作中的两个轮子，二者不可偏废，离开规范的创新是违背科学的蛮干，只有在坚

持规范的前提下创新，年鉴事业才能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2、年鉴创新决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猎奇，而是一种新的方式和思路。

目前，年鉴创新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不少做法已得到年鉴界的肯定和赞赏，但也应自警，力戒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当前，有些年鉴，为追求“卖点”力图使年鉴进入“寻常百姓家”，刊登了不少“便民服务”方面的信息资料，有的还刊登了火车或汽车、航空运行时刻表、健身小常识、小验方和购物指南、就医指南等内容，还有的年鉴为增强其可读性，辟出版面，每卷登载几则民间故事或笑话之类的东西，这种做法很值得商榷。试想，谁会为查一下交通运行时刻表或者阅读几则小故事而花上上百元去买年鉴？或花很大精力去翻阅年鉴呢？再说，交通时刻表、办事指南等是动态的东西，不断发展变化的，缺乏稳定性和准确性，而年鉴出版周期较长，时效性欠缺，因而其提供的信息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是无效信息。

3、年鉴创新不能将实用性与实用主义混为一体。

年鉴的实用性是指一部年鉴在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实际程度。当前有些年鉴工作者对年鉴实用性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与把握，他们片面地认为，在商品经济时代，一部年鉴的实用价值应当体现在其为本部门、本单位创收的力度上，错误地将实用性与实用主义混为一体。在

客观上将年鉴的改革与创新工作引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一是为了部门利益，不适当地扩充年鉴广告，偏离了正确的办刊宗旨。二是不以贡献大小和政绩为依据，“谁出钱就登谁”，搞变相的“有钱服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殊不知，年鉴的纪实性彩色专版（即广告彩印）也是年鉴的一个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选择纪实性彩色专版时，一定要有目的、有重点、有专题的进行，决不可瞎抓，捞到什么是什么！这方面，我省《株洲年鉴》做得比较好。它的彩色专版都是分专题进行征集和编排的，很有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

4、年鉴创新应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

年鉴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一哄而起，盲目行事，更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吃成个胖子，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记述内容多，牵涉面广，它的改革创新不能想当然，头脑发热。我们既要有敢于创新的勇气，又要有善于创新的能力。思路决定出路，没有思路、思路不清或思路不对，都不可能搞好年鉴创新工作，甚至还会带来严重影响。年鉴创新必须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每编辑出版一卷年鉴只要有一两个创新闪光点，只要是向着创新的目标前进一步，不断有新意，我们创新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综合处处长）

论统计数字 在续志中的作用和运用^{*}

● 卢凯旋

记述新时期历史进程的续志，应当体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实践，突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反映科技教育和卫生体育的改革和发展变化，呈现不断提高的人们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续志资料性强，信息量大，必然要容纳大量的统计数字。正确地运用统计数字，可增强续志的资料性和科学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如果数字运用不当，势必影响续志的质量，降低使用价值。因此，深化认识统计数字在续志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运用和处理统计数字，是提高续志质量的重要课题。

(一)

统计数字是续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在续志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离开了数字，就编不出志书。

在续志中适当地运用统计数字，是志书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数字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记录，是事物量与质高度的科学的概括。无论自然，还是社会，无论物质文明建设，还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都离不开数字。续修志书是系统地记述首轮志书下限以来一定地域范围内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既要反映存在或发生什么事情，事物的性质、特征、状况，也要反映事物的数量程度、数量关系和数量界线，只有运用统计数字，续志记述才能全面、真实。实际上，在续志的编纂中，大到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就小到某项工程的进展情况，往往都要用数字来表示。志书结构的篇章节目，目为实体，是志书记事的基本细胞，数字则是细胞核。续志，离不开统计数字。

续志运用统计数字，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事物。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同时存在着质和量，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中有量，量中有质，数量是质量的表现，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只有一定的数量，才能表示一定的质量。因此，对事物量的记述，便是事物质的记述的基础。运用统计数字记事，才能准确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特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

续志中正确地运用统计数字，可帮助人们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字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科学告诉我们，定量记述的前提是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研究世界一切事物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也说过：“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670—671）。定性记述是定量记述的升华，定量记述是定性记述的基础。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说明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就一定要借助于统计的一些基本指标和方法，运用准确的统计数字作依据。续志运用数字记述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及现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可形成系列数字，具有科学的排比性，就有利于反映自然和社会诸事物的发展规律。所以运用统计数字进行记述，是志书高层次的记述方法，也是志书科学性的标志之一。

续志运用统计数字，可达到言而有据，事达理明的效果，增强说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SZKT(Z)010。

服力，避免空话、套话。续志中需要反映的气候、自然资源、人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等内容，运用数字直接说话，以少量文字画龙点睛，可达到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省事丰的效果。

(二)

要正确地运用数字并非易事，从志书编纂的实际情况来看，数字的运用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数字本身不符，有的计算方法不当，有的统计范围、口径前后不一，有的数字来源不可靠，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但不能发挥数字作为“无言之史”的作用，而且会严重影响续志的信誉。因此，续修志书中正确运用统计数字要注意五个问题：

第一，要注意统计数字的来源。同一事物，由于部门不同、统计时间不同和统计口径不同，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数字。如粮食产量，统计部门、粮食部门、农业部门各有一套数字；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公安部门、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统计局也各有一套数字。因为要求不一样，数字也就不同。即使是同一部门对同一事物的统计，由于统计时间不同，又有预计数、快报数和年报数之别，在范围上还有全社会和部门系统内之分。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以块块为主的全社会数据，部门统计数字则是以条条为主的系统内数据。如果不注意数字的来源，信手拈来，就会出现互相矛盾的现象，使读者无所适从。因此，运用数字时，首先要弄清数字是哪个部门的，是什么时候统计的，包括了哪些范围。方志运用数字，不论是首轮社

会主义新方志，还是续志，都要坚持以统计局公布或认定的数字为准。这是因为，统计部门是国家专门设立的统计信息的机关。1989年国务院再次明确规定统计部门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具有信息、咨询和监督职能。统计部门依法搜集、汇总、公布的数据具有准确性、全面性、科学性、权威性。统计局的数据是法定数据。使用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增强志书的权威性。某些数字统计局没有，则应以该项业务主管单位的计划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为准。同一部门的几套数字，应以最后定案的年报数为准。

第二，要注意统计指标的统计口径范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众多的统计指标组成。要做到科学地运用统计数字，就必须了解国民经济核算的知识。特别是要熟悉那些常用的、重要的统计指标的含义。总量指标即绝对数，如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总人口等等，这是说明事物总的规模和水平的指标；平均指标，如人平收入，平均亩产等等，是说明某一事物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平均水平；相对指标，常用百分比，是反映事物的发展速度或完成计划程度的指标。续志中使用的统计数字应以绝对数为主，因为绝对数值中直接反映了事物的规模和水平，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从绝对数中计算出来的发展速度、比重结构、系数等各种派生的相对指标——百分比和指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规律。

在使用统计指标时，一定要摸清其统计口径和范围。如城镇人

口，有包括郊区的数字，也有不包括郊区的数字。工业总产量有全部工业(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乡以上工业(不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独立核算工业(不包括非独立核算工业)、全民工业、集体工业等不同口径、范围。统计数字浩如烟海，续志运用数字时不能见什么用什么，一定要与所记述和反映的内容相一致，要根据需要而定。用哪个口径的数字最能确切地说明问题，就采用哪个，应注意运用那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数字。另外，续志要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史实，同一统计指标的不同年份的统计口径，应做到统一。以便形成系列数字，以利于进行纵向对比。方便读者使用。

第三，要注意数字的真实、准确。数字的真实是指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数字。我们收集的数字，是在实践过程中统计出来的，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有些数据不够真实。甚至虚假的现象是难免的。所谓准确是指反映事物本质的数字，有些数字反映了实际情况，但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不正确认识，就会把某些问题当作成绩去写。如一个工厂的产值大幅度增长，并不能完全表示这个工厂发展迅速，因为如果产品质量差，造成积压，还是没有效益。数字有讹，不易识别，不但不能发挥数字在志书中应有的作用，而且会影响志书的信誉，应予以高度重视。所以续志中运用数字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推测估算，不能带任何主观框框去取舍统计数字。应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更不能先把记述的基调定好，然后去找适合

自己口味的数字。另外，还应掌握正确的计算方法和记述手段。净增数不包括基数，如从10增加到50，即“增加了”4倍，而不能说增加了5倍。又如倍数只能用于数量的增加，不能作数量的减少，如从50减到5，应当说减少9/10，不能说减少了9倍。又如绝对数的增减可用“增加”、“减少”，而相对数的增减应用“增长”、“下降”。

第四，要注意正确运用数字进行对比。为了更深刻更具体地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志书往往利用表格对不同时间或不同空间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即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纵向对比是时间范围上的比较，也称动态对比，以显示事物发展的速度和趋势，分为环比和定期比。环比即本年度与上一年度对比，把各年度上升下降准确地反映出来。定期比即固定某一年为基期年来进行对比，基期年一般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如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起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一年，1980年是翻两番的基础年……。选择这些年份进行定期比，可以反映事物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横向对比是空间范围上的比较，也称静态对比。如湖南与全国对比，与邻省对比。省内不同地区或不同部门的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体现志书“资治”的作用。只有同时收录某些必要的数字资料进行横向对比，才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横向对比，可以开阔视野，显示某项事物在总体事物中的地位和同类事物中所具有的典型水平，以反映一个地方的优势和特点，差距和不足。续志应以纵比为主，横比为

辅，力求达到纵横交错，浑然一体。

志书中运用对比的方法，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组织，进行科学对比，才能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状况，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用不可比的数字进行排列对比，是一种不科学的表现。如反映不同时期总产值的变化，要用不变价格才能作时间上的对比，如果各年度的产值不按某一年度的不变价格计算，不消除不同时期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这不同时期的产值指标是不可比的，这种对比反映的情况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计算总产值使用过1949年不变价、1957年不变价、1970年不变价和1980年不变价等几种不变价格。在使用这些价值指标时一定要弄清它究竟是何种价格，不同价格的价值指标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第五，要注意运用多种表述形式。文字与数字相结合是志书记述的最常用的形式。一般说来，志书的记述以文字为主，在文字记述的精要处多用数字来表达。如经济诸志的概述，主要用文字表述，并用少量数字加以说明，做到叙而有据，事达理明，增强说服力。

统计表是用简要的数据，对事物进行概括、综合、归类、分析、比较的表达形式，是志书运用数字的重要形式。以统计表数字表述一地各方、一方各业、一业诸事、一事多年的状况，可增强志书的直观性。特别是经济诸志中多项经济指标的统计数据，运用统计表这种形式，可以化繁为简，广储信息，比文字更集中更突出。志书中采用统计表一定要规范，统计表一般包括表头、表体、说明三个部分。“表头”即统计表的标题，应有地方(单位)、时间、事项三个要素，

并在右侧标明计量单位。“表体”是统计表的主体，由纵标目和横标目组成，应遵循便于排版和阅读的原则精心制作，纬短经长宜制竖表，纬长经短则制横表。表内的文字和数据要整齐规范，上下、左右要对齐，有空位的地方应以“—”线表示没有数据。“说明”是对资料来源和表内某些问题的注释，编排在表体的底线之下。统计表的位置和作用决定了表的运用范围和运用原则，只能以表辅文，以表佐文，不能以表代文，以表伤文，要避免表文脱节和相互重复、矛盾。表的运用应根据表的作用、记述的需要和版面容量去精选精用，收到化繁为简、聚零为整的效果。

统计图是根据统计数字绘制的图形，是形象地表述数字资料的形式。它以数字为基本内容，实际上是图化了的表。它借助于几何的线条、形或现象本身形象等形式，显示所记述事物的数量，表现其状态、构成、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具有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等特点，志书中采用统计图，可以活跃版面，增强记述的形象性、直观性和可读性，是运用数字反映事物的好形式。

总之，续志中运用数字应做到文表图并用，宜文则文，宜表则表，宜图则图，灵活运用，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此外，续志中运用统计数字时一定要用法定的计量单位，必须遵守有关统计数字保密的规定，不使用未公开的密级数据。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省志编纂处处长)

中美年鉴的比较研究*

——从美国的《世界年鉴》^①编辑出版反思中国年鉴的现状

● 黄俊军

2010年下半年,我有幸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湖南省第十期中青年赴美高级培训班,利用这次出国培训难得的机会,收集了一些资料,对中美年鉴做一番比较研究。我在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马丁·路德金图书馆翻阅了一些美国年鉴,例如:《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最近几十年卷、《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 Yearbook》1992年卷、《Peterson's College & University Almanac》2009年卷(《彼得逊学院和大学年鉴》)、《The Universal Almanac》1997年卷等等。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找不到有关评介、研究年鉴方面的任何理论性文章和书籍。通过咨询学校图书馆的有关专家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才知道在美国,年鉴只是被看作第二手资料,所以关于它的理论性文章几乎没有人撰写。美国编年鉴不是政府行为,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机构统计美国一年编了多少种年鉴。

美国出版年鉴历史悠久,“美国最早一本年鉴是1639年出版的《新英格兰年鉴》,从这以后到18世纪,在这个国家年鉴的销售量

比任何种类的图书都多。”^②到现在年鉴已成为人们熟悉的出版物,具有巨大的读者群和雄厚的社会基础。从质量上看,他们有一批有影响的、有信誉的、提供信息准确、及时、密集、高质量的年鉴。如美国的《世界年鉴》1868年创刊直到现在还在每年出版,发行的总量超过8000万册,现在每年发行165万册。^③从数量上看,他们的年鉴品种繁多,销售量大,靠发行维持年鉴的生存和发展。据美国稻草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两卷本《美国年鉴》一书提供的数据,仅从1639年到1850年间,美国就出版了1.4万多种年鉴。使用1990年12月《在销图书书目》(BIP)光盘检索出,美国在销图书书名中带有yearbook者,为1862条,有almanac者,为615条,有annual者,为4058条,合计为5920条。虽然同一种年鉴的不同年版本会重复在光盘中出现,但从以上数字中,可以看出美国出版年鉴的一般概况,估计美国在销年鉴在2000个品种以上。^④在加州圣何塞大学图书馆的sjlibrary.org搜索书名“almanac”,有1846条,搜索书名“annual”有2901条,搜索书名“yearbook”有984条,总共有5731本有关年鉴的书,^⑤该图书馆并非美国最大的图书馆,也不是全

美出版的年鉴都购买了,除去同一品种的重复年鉴,可以佐证美国每年出版年鉴至少不会少于2000种。

选取美国《世界年鉴》作为反思对象,有其代表性:《世界年鉴》由《纽约世界报》于1868年创刊,1876—1885年其间曾停刊10年,1886年又恢复每年出版,到2013年已有140多年历史,现在每年发行160多万册,是美国年鉴第一畅销书。美国社会对该年鉴的评价是:“从一本书里拥有最多的信息来说,《世界年鉴》依然是冠军”(美国图书馆协会《藏书家》);“当代人们所知晓的最有用的参考工具书”(《洛杉矶时报》);“《世界年鉴》就各种各样的科目提供了简短的、精确的信息”(《纽约时报》);“作为一名平民百姓、州长和总统,我必须依靠《世界年鉴》上精炼、准确的信息,同时(阅读此书)也是为了乐趣。”(美国前总统杰米·卡特)。^⑥《世界年鉴》原副总裁、编辑部主任罗伯特·法米盖特曾说过“《世界年鉴》是全世界最畅销的英文版年鉴。它的目的就是编制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客观资料信息。成千上万人的家里都拥有《世界年鉴》,以便通过它查阅一年当中的资料 and 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成千上万的学生、研究人员、新闻工作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SZKT(Y)013。

者和商人都要用《世界年鉴》。在美国，你可以在每一所学校和图书馆里找到《世界年鉴》。每年11月份出版的《世界年鉴》都超过上千页，它在数以千计的科目中向读者提供上百万个信息资料。”^⑥“多年来《世界年鉴》曾两度成为美国总统上任就职时的宣誓用书^⑦。一位是卡尔文·库利奇，他是沃伦·哈丁去世后由一个地方法官主持就职的；另一位是林顿·约翰逊，他是约翰·肯尼迪被暗杀后在空军1号飞机上宣誓的。并且《世界年鉴》也是约翰·肯尼迪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办公桌上的唯一一本参考工具书。”^⑧从2010年www.almanacworld.com网站征订广告上有一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办公室的照片，其身后书柜中就有美国《世界年鉴》，很显眼。综上所述可见《世界年鉴》在美国是有影响力的。

我认真翻阅了《世界年鉴》的2011年卷、2009年卷、2008年卷和1999年卷，2011年卷为32开的平装本，2008年卷是16开的精装本，两年卷的都是1008页，精装本是30多美元，平装本只要12.99美元，16开和32开两种版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字号的大小不同而已。从www.almanacworld.com网站的买书广告可以看出，《世界年鉴》的很大一部分是作为礼物购买送给亲朋好友的。32开本便于读者阅读和携带，并且便宜，尤其是相对于美国民众的收入更是便宜实惠。我托美国朋友在www.amazon.com网站订购一本2011年卷的《世界年鉴》，网络购买更便宜，只要8.59美元，11月15日出版，月底收到书。《世界年鉴》书中没有广告，^⑨有32页

彩色插图，有16页世界各国的国旗和美国、世界几大洲的地图，还有16页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年度各种大事的新闻图片，类似于《湖南年鉴》彩色插页的“湖南风貌”。

《世界年鉴》的检索系统分为目录和索引两部分。目录非常简单，仅是各个篇目的名称，使读者了解该书的大致内容和结构；索引部分却非常完备，它设立了“主题索引”和“快速参考索引”。前者是根据作为标识的主题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的检索系统。后者实际上是分类索引，它按资料的学科、专业内容在分类法中的相应类别进行编排，使内容相同的资料集中在一起，能够体现学科、专业的系统性。两者虽然在不同的篇，但经过索引联系在一起，使读者分析研究资料十分方便。总之，它分为总索引与快速检索指南两部分，详略得当，读者按照不同的需要很快便能查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为了方便与我国综合性年鉴的比较，现把以上四卷本《世界年鉴》的主要目录译录如下：2011年卷有17个部类，即：特辑和一年回顾、2010年图片、经济、商业和能源，犯罪，军事，健康卫生和重要数据，知名人士、艺术和媒体，科学和技术，消费者的信息，美国的实据和历史，世界地图和各国国旗，美国政府，美国的城市、州和人口，世界历史和文化，体育，索引。^⑩2009年卷有18个部类，即：特辑，2008年大选，2008年年度评论，2008年图片，经济、商业和能源，犯罪，军事，健康卫生和重要数据，知名人士、艺术和媒体，科学和技术，消费者的信息，美国政府的实据、历史和选举，美国的城市、州和人口，世界历史和

文化，体育，工商和社团名录，索引。^⑪2008年卷有17个大的栏目即部类，它们是：特辑，2008年大选，2007年年度评论，2007年的图片，经济、商业和能源，犯罪，军事，健康卫生和重要数据，知名人士、艺术和媒体，科学和技术，消费者的信息，美国政府，美国的实据、历史和选举，美国的城市、州和人口，世界历史和文化，体育，索引。^⑫1999年卷有63个篇目，即：索引，1998年十大新闻，特辑（1998年中期选举、克林顿弹劾调查），特载（即将到来的下一千年），本年度大事记，1997-1998年最高法院主要决定，1998年诺贝尔奖，第105届议会主要活动，讣告，历史上的主要纪念日，1998年著名语录，1998年非常规新闻，各种信息资料，美国政府，国会，州与地方政府，美国内阁，经济，农业，就业，税收，能源，环境，艺术和媒体，1998年图片报道，国防，航空和宇宙航行，气象，灾害，教育、协会与团体，天文与日历，值得注意的人物，美国人口，美国城市，世界开发和地理，总统选举，国旗和地图，美国历史，美国总统小传，美国资料，世界历史，历史人物，科学和技术，度量衡，国际互联网络和电脑，建筑物，桥梁和隧道，美国的州与其他一些地方，表彰与奖励，宗教信息，语言，贸易与运输，旅行和旅游，健康，邮政信息，消费信息，社会保障，世界各国，1998年图片报道（承前），重要统计数据，犯罪，体育，快速参考索引。

从四卷本的目录看，1999年卷的目录类似于我国地方志中市县志书的小篇结构，篇目比较多，排序也比较随意，内在逻辑性不强；

2008年卷、2009年卷和2011年卷有些类似于我国地方志中市县志书的大篇结构,跟《湖南年鉴》编排采用“部类、分目和条目”差不多^①,从2007年起,《世界年鉴》的篇目就改为大篇结构,把60多个篇目进行归类合并形成10多个部类,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性强了许多,如2008、2009年卷的“世界历史和文化”部类就把以前的“国旗和地图、世界历史、历史人物、宗教信息、语言、建筑物、桥梁和隧道、世界各国”等8个篇目的内容归到这一部类下,一是减少内容上的交叉重复;二是便于读者阅读和查找相关内容。从2007年起部类目录基本稳定下来,所不同的是为了强调年鉴的年度性,有些民众特别关心的内容升级为部类,如2009年卷多出的一个部类就是“工商和社团组织指南”从相关篇目中抽出来独立为部类,其它部类都一样。2011年卷的部类与前面几卷差不多,就是减少了“大选”的内容,排序有一点不同。从目录中还可以看出,《世界年鉴》在内容编排上和中国大多数综合性年鉴不同。该书把内容分为信息、资料两大部分;同时根据多数读者对内容感兴趣的程度来编排书目的内容,重要的信息关注度高的资料放在书的前面,而把读者群稍小且较为专业的资料内容依次编排在书的相对后面。

二

一、关于年鉴的读者对象

目前,我国年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机关团体和图书、资料、研究单位,然而美国《世界年鉴》主要是面向广大市民读者。《世界年鉴》每年发行约165万册,其中15万册是16开精装

本,主要供图书资料部门收藏;150万册是同样内容、同样版面的32开简装本,是卖给广大市民的。在美国购买和使用年鉴的人很多,每个学校都买《世界年鉴》,许多家庭把《世界年鉴》作为必备的读物,甚至把它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这就是每卷年鉴必须要在感恩节(11月下旬)前上市的原因。由于美国的三个最大节日:感恩节、圣诞节、元旦都集中在11月下旬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期间是人们休假、访亲探友的高峰时期;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一年将尽的感觉。《世界年鉴》抓住这个机会,在每年11月中旬就出版了本年度的年鉴。在信息资料选取时间方面,不像中国年鉴是自然年度,而是从上年10月16日到本年10月31日。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由“市场来决定”,没有“市场”的商品是没有人愿意提供的。《世界年鉴》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其读者群服务的,也就是说读者需要看什么,他们就编什么,正如《世界年鉴》原副总裁、编辑部主任罗伯特·法米盖特所说“我们也从《世界年鉴》的使用者那里得到许多建议。我们一年收到成千上万封信件。最近几年随着电子邮件的使用,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读者通常会告诉我们他们喜欢《世界年鉴》里面什么样的内容,或者他们还希望看到其他一些什么样的内容。”^②

二、关于年鉴栏目内容的设置

现在美国《世界年鉴》大的栏目即部类不到20个,大部分是固定栏目,每年变化不大。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有一部分栏目会增加或减少,如第一部分所述。笔者重点翻阅了以上四卷本《世界年鉴》,发现《世界年鉴》每年新的

信息约占1/3,其余2/3的内容都是过去若干年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内容也不完全局限于上一年度的统计资料,有的是采用前一年或者前几年的统计资料。2009年卷《世界年鉴》,完全反映2008年内容的栏目和分目只有很少一部分,如:“2008年十大新闻”、“2008年大选”、“2008年年度评论”、“2008年图片”、“2008年诺贝尔奖”、“2008年著名言论”等。绝大部分栏目的内容是既有历史资料,又有当年的情况;既有基本常识,又有新的发展信息,便于对比。年鉴在反映本年度内容的同时,也要对本年度以外的信息资料进行适当收载,从而反映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趋势和动态。然而如何把握这个时间跨度,中国综合性年鉴资料内容大多只上溯到上一年度,占全书的99%,也有少部分内容可能反映到前三年或五年,但很少能看见上溯到前十年、几十年、一百年、甚至更早,如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记载。《世界年鉴》信息资料所载内容时间跨度很长,如《世界年鉴》2009年版经济篇中最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表所列资料是1997年到2008年,而财政收入、支出、盈余和赤字概况表是1941年到2008年、预算收入和支出表是1789年到1940年、国债情况表是从1870年到2008年等等。在《世界年鉴》中,另外还有一些部类如历史上的主要纪念日、万年历,世界开发与地理、国旗与地图、美国历史、历史人物、美国总统传记、世界历史、度量衡等,历年年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有的只有某些增加或修改,如“美国内阁”栏目中历届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再有一部分栏目是属于科学常识、生活知

识之类，如“世界探险与地理”中，关于南北极、火山、海洋、岛屿、世界城市等介绍；“健康”栏目中关于各种疾病的预防、检查常识；“邮政信息”栏目中关于信函、特快专递、包裹等邮资及有关规定。而中国综合性的年鉴中就没有每卷都重复这些原原本本的内容。《世界年鉴》不仅记载美国和世界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也适当报道了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件。如1999年卷在其特载即将到来的下一千年来专门安排了两篇日程表：千年日程表和世界主要商品交易会及展览会，时间从1999年到2000年，详细介绍了所要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发起人以及如何联系等等；^⑩2009年卷的天文学从367—385页，主要是预告2009年的所要发生天文现象和大事的时间、地点等等。^⑪这些都是中美两国所载信息资料延伸范围的取舍标准不同。

为什么中美年鉴在内容的取舍标准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想最主要的应该是中美年鉴编纂者的编辑角度不同所致。年鉴是记载、反映社会所发生各种事情的信息资料工具书，但是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记载、反映这些内容，中国综合性年鉴一般把视角的落脚点放在政府一边，反映或介绍政府部门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以及怎么样去做这些工作；或是让年鉴所载其他内容专供政府部门阅读。从表面看年鉴内容似乎也涵盖了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所反映内容的外延较为偏狭。《世界年鉴》编纂者是带着社会一般读者的视角来反映和记载信息资料的。内容安排以多数读者为中心，读者需要什么，他们就编什么。实用性强、检索率高、一般读

者比较关心的内容，占的篇幅比较多。一般说来，《世界年鉴》内容在总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即：①读者普遍关心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和实况；②社会各部门知识、常识性的信息资料。上述不同的视角落脚点，在年鉴内容安排上具体表现为：中国综合性年鉴部类条目基本上是由工作概况、工作业绩、经验教训、内部建设、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等几部分所组成。《世界年鉴》则根据每一部类性质而安排不同内容。首先，它将所有事件叙述性的条目全部安排在大事记里，而剩下部类则几乎不再反映事件的内容；其次，利用一些部类如美国政府、经济、农业、环境、艺术与媒体等介绍美国和世界在上述社会各部门中的发展实况，这是属于知识性的信息资料；最后一些部类是常识、指南性的内容，如税收、国际互联网络和电脑、健康、消费信息等。此外它还有一些部类兼有知识、指南两方面性质的信息资料，如就业、教育、旅行和旅游、天文学等。这里我们通过几个具体例子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年鉴在信息资料收载时视角落脚点上的差异。如大事记，中国年鉴一般只收载国内大事，而《世界年鉴》大事记分为三部分，即国内、国际，还有综合部分内容，即属于一般社会民间信息资料，老百姓感兴趣，但中国年鉴通常忽略。还有“教育”篇中，中国的年鉴记述各级教育部门工作概况、年度内的教育管理情况等等，《世界年鉴》对教育部门工作情况和业绩避而不谈，用大量的篇幅简要介绍各大学的情况，包括每个大学的校名、地址、创办年代、学费、住宿与伙食费，学生与教职员的数目，可以获得的学位等；在“教授工资”一栏中，分别

列出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各类不同级别教授的年薪数目；在“大学费用”一栏中，列出了几十年以来各种类型大学学费、住宿费与伙食费的增长情况；再如，在税收篇里，中国年鉴通常记述各税收部门工作概况、税收收入情况、税收管理及手段等等。《世界年鉴》除在经济篇里用图表形式对美国主要税收收入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外，对税收部门工作情况和业绩则弃而不谈，却为读者专门提供纳税人应该知晓的纳税常识和信息资料。

三、关于年鉴内容的叙述方式

中国综合性年鉴各个条目基本上是以文字叙述方式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在碰到一些只需以统计数字来说明社会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概貌时，往往也要“统计数字文字化”，使人读起来不那么方便。

《世界年鉴》在内容叙述上非常简约，在叙述事件时讲究实况和实效，对所发生事件或者一些重大数据后面的背景、规律和影响等一般避而不谈。在《世界年鉴》中，文字叙述性条目只占百分之二十，而各式各样的图表或统计表格将近百分之八十。如在美国政府篇中，全篇用图表形式分别介绍了美国政府的构成，包括总统在内主要官员的工资，各部门、机构地址及其第一负责人等等，至于政府在本年度做了哪些具体事则一字不提。而在经济篇中也是通篇数表和一些简单的统计说明，没有文字性分析与述评。

四、关于年鉴的出版时间

美国《世界年鉴》每年11月中旬出版，例如2011年卷的年鉴在2010年11月中旬上市。一般信息资料，如一年大事年表，是从2009年10月16日至2010年10月31日。为了缩短出版周期，编辑部不是齐、

清、定一次发稿，而是每年从10月份开始分五次发稿，没有变化的内容先发稿、先印刷，然后不断增发新的内容，最后一批是关于美国读者关心的11月大选的内容，2010年11月2日中期选举结束。选举结果一出来，不到10天首批年鉴可以进书店。他们拥有高速印刷机，留在最后的印张，很快就可以印出来。国内的综合性年鉴出版时间各不相同，大致是从7月开始到12月相继出版，主要是受制于上一年度的统计数字的公布。我们年鉴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前一年的，基本没有或者很少有当年的资料。

五、关于年鉴的运作机制

美国《世界年鉴》创刊于1868年，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第一本年鉴只有120页，现在每年年鉴1000页左右。目前编辑部只有6个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有很多的供稿渠道，有政府渠道、各州(市)政府、外国政府、联合国机构、非营利的研究机构、专业机构、行业机构等等。美国《世界年鉴》还建立了一套覆盖全美国社会的完整的统计报表制度和指标体系，全面、准确地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数字信息。他们的资料来源也有部分由企业主动提供，部分从上市公司公开材料及行业协会获取。《世界年鉴》不是官办年鉴，是民营机构。这些供稿渠道不是靠官方指示，而是靠业务关系建立起来的。撰稿人提供的材料，有的是付费的，有的是免费的，如政府提供的信息就是免费的。撰稿单位一般是固定的，但提供稿件的人经常变动。每年编辑部都要发出很多问卷，请各有关方面回答。比如世界各国动物园的情况，每年都发信提问，请有关方面回答。编辑部的提

问如得不到回复，就反复询问，多数都可以得到回答。还有一些内容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独创性。如每年的10大新闻话题和10大历史事件、大事年表等，其他的如2008年卷的新闻测验，2007年卷主编C. Alan Joyce的《网络时代的年鉴》都是该卷的亮点。而我国综合性的年鉴供稿渠道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靠政府的行政指示来组织稿源，整本年鉴基本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更谈不上有多少闪光点。

三

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年鉴的性质、作用和工作要求也不一样，两国读者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生各类事件的兴趣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在编辑中国综合性年鉴时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世界年鉴》的模式，但是美国《世界年鉴》的一些编纂方法和经验，对我们中国年鉴同行多少还是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通过对美国《世界年鉴》和地方综合性年鉴的比较，笔者有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地方综合性年鉴不能完全照搬美国《世界年鉴》的模式，要正确定位，走中国特色的年鉴事业之路。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编纂地方综合性年鉴列入政府地方志工作任务之一，其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已给地方综合性年鉴权威准确的定性或定位，即地方综合性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这个定义明确了地域是本行政区域，明确了内容是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

况，明确了时间是年度性的，明确了性质是资料性文献，明确了主体是政府行为，由地方志机构负责。地方综合性年鉴是“官书”，“官本位”是综合性年鉴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本。事实上，脱离了“官本位”，任何综合性年鉴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不要一提到“官本位”，就以为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办好地方综合性年鉴必须立足于“官本位”，不能在“官书”和“民书”之间左右摇摆。地方综合性年鉴编辑单位都是在各级地方志机构中，年鉴是政府管理的文化事业。其实国外的年鉴如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地区等都是民间出版机构，没有归属于政府主办、主管，他们所编的年鉴记载的内容大多是知识性和生活指南性的信息，其服务对象是普通大众。中国的地方综合年鉴，首先它记述的信息资料是一地一年各行各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成就，不是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的资讯信息。这种中国地方综合性年鉴出版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年鉴读者群，只能是政府部门、机关团体和图书、资料、研究单位的人员，不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地方综合性年鉴只有本着年鉴出版的本质特性，坚持正确的新闻和政治导向，立足地方特色，提高品位和质量，必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年鉴之路，沿着这个方向去大胆创新，做强做大。这才是年鉴事业健康持久发展和长期生存的准确定位。

二、要借鉴美国《世界年鉴》的一些编纂方法和经验。地方综合性年鉴是“官书”，并不是说年鉴要编得现在这样“官气”十足，废话连篇。年鉴传统的组稿方式是由政府发红头文件，习惯向党委、政府所辖各部门征集年鉴资料。由于

多年来稿件来源单一，在年鉴信息中形成了“千鉴一面”的现象，在这种定势下编纂的年鉴反映各个部门的政绩太多，记载部门的工作过程很多，反映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信息太少，以至于社会上对我们所编的年鉴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年鉴资料有用但是不够用”，形成这样的后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一些部门旧体制打破了，新体制尚未健全，造成部分行业管理上的“真空”；还有一些新兴行业，由于组稿渠道的限制，从而导致年鉴信息反映不全面。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的转变，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民间组织的活跃，按照旧有模式组织的年鉴稿件，就不可能如实地反映时代变迁。因此，我们必须学习美国《世界年鉴》的组稿模式，需要我们突破“官方”单一供稿模式，要在单一的“官方”供稿模式基础上，拓宽信息来源渠道，拓宽载体平台，扩大组稿范围，向民间社团、行业组织、学术团体、私营业主、社会贤达等一切可以提供现实需要的资料的组织和个人征集入鉴稿件。除此以外，有些不在政府及其部门掌握之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资料还可以由专家学者、电视网络记者、报章杂志记者、自由撰稿人和年鉴编辑人员等有偿提供，也可以由年鉴编纂单位组织年鉴编辑人员去收集信息、自撰稿件等等，慢慢形成一些自己原创的栏目和内容。

适当增加年鉴中统计图表数量。统计图表用简练的文字、数据、图像，对事物进行归类、概括、分析、比较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化繁为简，具有直观性和便览性，使资料一目了然，方便读者，增强实用性，节省篇幅。美国《世界年鉴》2011年卷的统计图表

粗略统计有近1100个，占据年鉴很大的篇幅。统计图表并非统计年鉴的专利，反观我们的地方综合性年鉴不仅图表不多，而且一些图表还文字化。

要像美国《世界年鉴》一样尽力提高信息资料的实用性。年鉴之所以称为年鉴，是因为其具有将所载内容提供给读者借鉴、参考的性质。因此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信息资料给读者，或者说读者是否能够读到他所关心的内容，这就是年鉴在编纂过程中所面临的实用性问题。综合性年鉴因其所载内容覆盖面广，读者群大，这就要求它根据不同阶层和行业读者对信息资料的需求，而将年鉴所载信息资料的完整性与读者针对性相结合，使色彩纷呈的各项社会内容在年鉴中既疏而不漏，有的放矢；又全而不赘，各尽所用。年鉴作为一部参考性工具书，它不可能和教科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功效。因此在内容编排上，它一方面要具备有辞典、百科全书那样的矜持与凝重，另一方面它还带有灵活、简便、轻松的风格。同时尽力满足读者使用的方便性。年鉴是让人们查阅的参考性工具书，因此编者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到它使用的方便性。这不仅要求在目录索引上替读者做种种考虑，让读者在节时省力的情况下很快便能查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而且在年鉴每一年度的内容编排上也要尽量顾全到它的资料完整、齐备。

①《世界年鉴》是国内一种约定俗成的翻译，其实它的全称应该译为《世界年鉴和实据参考工具书》，英文为《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是一部反映美国社会和世界情况的综合性年鉴。

②C. Alan Joyee(现在美国《世界年鉴》的主编)《The Almanac in the Internet Age》，来源于《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08》第7

页，World Almanac Books A Reader's Digest Company, 2007。

③美国《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的网站即www.worldalmanac.com

④代龙基：《国外年鉴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1期。

⑤来源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大学图书馆的网站slibrary.org。

⑥评价来自于美国《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的网站www.worldalmanac.com

⑦、⑧、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3期第55页。

⑩卡尔文·库利奇是美国第30届总统，任职于1923~1929年；林顿·约翰逊是美国第36届总统，任职于1963~1969年。美国总统就职时通常是把右手放在《圣经》上宣誓，以示他说的话绝对忠实。上述两位总统起先都是副总统，由于当时他们各自的总统在任内突然死亡，按照美国法律他们得立即接任总统，以免权利真空。在接任总统时他们也要宣誓，但他们手扶的是《世界年鉴》，而不是《圣经》。

⑪笔者在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图书馆翻阅的几十种年鉴都没有广告插页。

⑫World Almanac Educatoon Group, Inc.: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11》, World Almanac Books A Reader's Digest Company, 2010。

⑬World Almanac Educatoon Group, Inc.: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09》, World Almanac Books A Reader's Digest Company, 2008。

⑭World Almanac Educatoon Group, Inc.: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08》, World Almanac Books A Reader's Digest Company, 2007。

⑮可以参见《湖南年鉴》已经出版的每一卷的目录和编排形式。

⑯World Almanac Educatoon Group, Inc.: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9》, World Almanac Books A Reader's Digest Company, 1998。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年鉴工作指导处处长)

瞿宣颖方志理论初探

● 刘运华

瞿宣颖何许人也？金性尧在《伸脚录》中说：“蛻老（接即瞿宣颖）对秦汉至明清历代官制的精通，确实身怀绝技。《刘禹锡集笺证》获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他兼具功力、识力、才力。”对瞿宣颖的文史才能推崇备至。周劭在《闲话皇帝》中说：“论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梁新会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寅恪）、瞿（兑之）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更是把瞿宣颖赞为20世纪顶尖的“史学大师”，评价之高，还未曾见过。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他的生平事迹如何？瞿宣颖（1894~1973）别名益锠，字兑之，号铢庵，晚号蛻园。湖南长沙人。晚清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第三子。早年师从王闿运、王先谦。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1年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编译馆馆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27年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编译馆馆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并致力于整理和校订古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其主要成就体现在掌故学、方志学、秦汉史等方面，著述甚为丰富。^①据俞汝捷初步统计有三十多种。

2011年，笔者有幸参加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的《方志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才第一次知晓瞿宣颖的大名，且知道他是湖南长沙人，于是有心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本文不揣浅陋，拟对瞿宣颖与地方志以及他的方志理论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瞿宣颖与地方志

瞿宣颖是20世纪著名的方志学家，他对地方志的研究造诣颇深，他是民国时期方志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余绍宋甚至将他与章学诚并列。^②通过细心的爬梳整理，可知他在地方志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一）参与编纂《北平志》和《北京市志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设北平特别市。翌年北平特别市古迹古物评鉴委员会倡议遵令修志，9月9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正式成立，11月，于院内设立史学研究会，以吴敬恒、李宗侗、张继、沈尹默等为常务委员，决定编纂《北平志》。瞿宣颖起草制订《北平志编纂通例》，“以纪述北平近代之史迹为主旨。尤注重于社会状况之变迁。”^③内容分为六略：一为疆理略，记地理；二为营建略，记“人力之建置”；三为经政略，记北京当时的地方行政设施；四为民物志，记社会状况；五为风俗略，记民俗调查；六为文献志，记属于北平的史料。^④为编纂《北平志》，除收集

古籍和档案资料外，还对北平庙宇进行了绘图、照片、拓碑、记录等工作，共拓片1200余幅，照片2000余张，庙宇平面图700余幅，记录800余份，查得庙宇882处。与此同时，《北平戏剧志》、《北平风俗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岁时志》等专志问世。^⑤瞿宣颖编纂《北平史表长编》，记事从938至1899年，此乃编写北京历史年表的第一次尝试。1932年12月1日出版北京历史上第一种具有北京地方志特色的期刊《北平》（半月刊）。共出两期。第一期刊登文章有瞿宣颖的《北平志编纂通例》，第二期刊登有瞿宣颖的《北平史表长编》卷一（徐炳昶校补）。^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志》编纂工作停顿。1938年秋，日伪“北平特别市”设立“北平市修志处”，决定编纂北平地方志，以原清史馆总纂吴廷燮为总纂，邀集瞿宣颖、夏仁虎、夏孙桐等一批方志学专家学者参与编修。该书所记地域范围为北平城区及大兴、宛平二县。时间为远古至1938年，重点记叙光绪十二年到民国二十年（1886—1931年）左右，特点为详近略远。分为舆地、建置、民政、度支、文教、礼俗、宗教、前事、货殖、金石、艺文、人物、选举、职官、名迹、故宫诸目。及至1939年秋，“为经费所限，”全书匆匆告成，凡196卷，现存157卷，合订为50册，约400万字。现存的是1940年稿本。1986年北京市将整理点校此书的工作列为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SZKT(Z)014。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七五”重点研究项目，1996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名为《北京市志稿》。该书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其中官方调集的档案资料尤为珍贵，有着其他同类文献所无法比拟的价值，因此在北京方志文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⑤

(二) 在南开大学等开设《方志概要》课程。瞿宣颖在《志例丛话》《引言》中说：“不佞以十九年（按：1930年）之春，为南开大学高材生述方志概要，秋间在清华、燕京两大学亦授此科。”^⑥

(三) 撰写《方志考稿（甲集）》。1930年，瞿宣颖受任风苞的邀请，为其天春园所藏地方志书撰写方志提要目录，瞿宣颖在《志例丛话》《引言》中说：“不佞以十九年之春，……为任振采君撰《方志考稿》。”这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1930年大公报社出版。该书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以提要形式介绍所收录的方志，述及编纂源流，分析优劣得失。^⑦主要取材于任风苞天春园所藏方志，全书分为6编，总目“甲集”，共著录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省方志600多种。瞿氏自序称“每书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其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所录方志，以现存者为限，没有遍考佚志。大多为清代方志，包括乡土志与文献志等，未及山水志。书中排列顺序“依清一统志例，一省之志，首省通志，次府若直隶州志，次县若州厅志，次乡若镇志。”各志提要篇幅长短不一，详于名都之

志而略于僻邑之志，“苟于近著而宽于前代。”瞿氏自序称此书之纂“将使读者开卷而了然于其源流所自与其内容所涵”。此书为近代一部较有影响的方志目录提要专著，所得评价多佳，如任风苞序称此书“仰自有方志以来未有之盛举矣”，可称“书目中之上乘”。亦可“为今后治方志学者之津梁”。又如余绍宋评价此书“体例既佳，考论亦当。”^⑧今人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在《〈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也给予此书高度评价：“编制提要目录确为一项繁重工作，前人曾有部分试作。1930年，方志学家瞿宣颖所著《方志考稿（甲集）》由大公报社出版，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主要著录天津方志收藏家任风苞天春园所藏方志600种，逐一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志其要点，录其史料，为学术含量颇高之目录学专著。”^⑨

(四) 参加上海通志馆的筹备工作。瞿宣颖在《志例丛话》《引言》中说：“本年（按：1932年）夏间，上海市府筹备志馆，复预授简之役。盖理首于此者两年。”^⑩瞿宣颖在上海通志馆究竟做过什么具体工作，由于手头资料缺乏，不能一一考证出来。翻阅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词典》，里面有《上海年表稿》词条：“《上海年表稿》系稿本，未刊刻。现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近人瞿宣颖辑，此稿共八卷，分前稿和续稿两部分，各为四卷。前稿起自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迄于清顺治十八年。续稿起自清康熙元年至民国二十年。……著录体例，先列公元，次干支及纪元年份，同年资料分条编列，注明材料出处。此年

表所辑材料，主要依据上海《同治志》、《明史》、《申报》、《上海租界史略》、葛元熙《沪游杂记》等书。书记载内容涉及历代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可为研究上海地区发展史，及新修志书提供参考。”^⑪《上海年表稿》应是当年上海市府筹备志馆时，瞿宣颖“预授简之役”的成果。

(五) 参与编纂《河北通志》。1932年，河北省政府奉国民政府令，着手编纂《河北通志》，由时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的瞿宣颖兼任河北通志馆长。瞿宣颖到任后，即先期礼聘傅振伦、王重民、孙楷第等人为名誉纂修，又聘王树枬、贾恩绂、谷鍾秀、张国淦、高凌霄、华世奎、张志谭等人任总纂。瞿宣颖拟定了“整理方案”，内中拟定修志方法有六：其一“修志首要义例”，认为体例不定，志书难成；其二，主张新增篇目，以收录有关新内容；其三，应妥善处理新旧志关系；其四，主张定例必赖通才，分修宜出专门之手；其五，认为志书以实用为归，应注意近代史料征集；其六，主张编纂志书，宜用征稿计酬法，以保证志书质量。瞿宣颖还与傅振伦、王重民、孙楷第等人通力合作，往返致书，商订编纂事宜，瞿宣颖在给三人的复函中，不赞成三人所言概征各县新旧县志，访求各种碑刻，征求河北人著述三项急征资料，认为金石艺文存于人间，未必有毁灭之虞，惟官府档案，容易散失，提出在重视金石艺文征集时，不应忽视官府档案。^⑫瞿宣颖还要傅振伦代为拟定修志计划，草拟《河北通志》例目。《河北通志·例目》中正编有疆里考，记《大事记、通纪、杂记》、政治略、政治与党务

略、财务略、选举略、教育略、外交略、军备及治安略、建设略、礼仪略、民族略、民生略、民俗略；文物考（艺文、传闻、古道、军事）；列传（政略、懿行、学术、艺术）等。（载《河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河北通志》征集到一些历史资料，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河北通志》的纂修也就停止了。^⑤现今流传于世的，有《河北通志稿》铅印刊本39册47卷，志稿38册和部分志料及发表于《河北月刊》上的《河北盐务志》以及《河北通志·县沿革图表》等。^⑥

（六）撰写《读方志琐记》。《读方志琐记》，载《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5期。全文载录了瞿宣颖从全国10个省22种府州县志中辑选的反映各地区各民族有关农民起义、农业经济、人口、赋税、宗教和中西交通等情况的许多资料；提出有计划地“分类摘抄”方志资料的建议。^⑦

（七）分类摘抄方志资料成《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瞿宣颖曾下功夫辑录了方志中社会生活资料，收入其所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⑧《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由纲、目、按、自注和附录5种不同性质的文字构成。这种大纲与细目相结合，叙述与评论相结合，正文与注释相结合，正录与附录相结合的论述方法，将《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粘合为一个浑然天成的有机整体。^⑨

（八）撰写《志例丛话》。《志例丛话》，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期。此文主要述评前人修志理论与修志方法，并分析其利弊得失。分通论、方法、地理、建置、古迹、经济、社会、风

俗、人物、氏族、通纪、丛录、讥贬、杂录等十四门，综论方志的源流、性质、内容、体例并指出旧志的缺点。除介绍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所用的方法外，还提供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谢启昆、阮元、吴汝纶、徐继畲和民国方志学家缪荃孙、余绍宋关于修志的经验，都有参考价值。^⑩《志例丛话》是瞿宣颖的一部方志学代表作，从方志基本理论等角度对作者的方志观进行了系统阐述。通过对其文本的解读，结合他的修志实践和其他方志学著作，可以使我们对瞿宣颖的方志理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二、瞿宣颖的方志理论

（一）关于方志源流

有关方志起源问题，据有学者统计，至少有17种说法。较有名的有下列几种说法：方志起源于《周官》说，方志起源于《禹贡》说，方志起源于《山海经》说，方志起源于古史说，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说，方志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方志多源说。^⑪瞿宣颖赞同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的说法，认为“方志记地方之史迹，其体裁与《越绝书》、《华阳国志》实为一家。”“《越绝》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以记传，实后世志州县者所仿。”^⑫值得注意的是瞿宣颖是从“体裁”的角度来看方志的起源问题的。

（二）关于方志性质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志学界对此也有过长期的争论，到清代乾嘉时期，

有戴震“地理派”和章学诚“历史派”之争，民国时期，黎锦熙持“史地两性说”最为著名。戴震认为“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⑬戴震明显认为方志性质属于“地理书”。而章学诚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⑭自然，章学诚认为方志性质乃属于“历史书”。黎锦熙认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方志固为方域之地志，然须将事事物物穷源竟委，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已，必使读者能就演变之实，推知感引之总因”。“方志固为地方之历史，然全国民族之荣瘁隆污，史家笼统抽象之谈，须待此而征实，而灼知；本乎史而定施政设教之方针，亦待此而后能备纤悉周到之方案，而后能谋部分具体之实践。”^⑮黎锦熙认为方志性质既是历史书，又是地理书，两者“兼而有之”，但“兼而未合，混而未融。”^⑯黎锦熙可谓民国时期“史地两性学派”的代表人物。民国时期，对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形成了三派，除“史地两性学派”外，还有以贾恩级为代表的“地理学派”和以王树枏、瞿宣颖、李泰棻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在继承章学诚“志属信史”观点的基础上，对章氏之说又有新的发展。^⑰瞿宣颖在《志例丛话·通论》中也首先讨论了方志的性质问题。“方志者，果何物乎？”他认为“方志者，地方之史而已。”^⑱首先，方志是“史”，“记地方之史迹”。编纂一个地方的地方志，就“是为此一地方有史，是纪述此一地方生育长养之序程。”^⑲其次，方志不是兼具史地两性之书。他说，“论者动以方志

为兼具地理历史两性之书，其实误也。此误由来固已久矣。宋以前有图经而无方志。名曰图经，则明为地理书而非历史书”，所以他认为方志也并不是“图经之变象”。^⑨再次，方志也不是“记现状之书”，不是“史料”。1929年，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发表《续修浙江省志提案》（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7期81号），主张解散方志旧体，以编辑年鉴、专门调查及省史三书取而代之。^⑩这就是所谓“新三书体”。瞿宣颖对此并不赞成。把年鉴和专门调查等同地方史，等同于地方志，“是盖未审夫史与史料之说也”。他认为，“凡史必以史料为依据。年鉴也，专门调查也，是皆所以备修史之史料也。无此则史不可成。故与其谓年鉴调查与地方史并列，则无宁谓年鉴调查为地方史之长编，差合于史之义。”他区分了“史”和“史料”的不同。他说，“一切学问，贯穿最难。史也者，正所以奏贯穿之功者也。史料也者，未曾贯穿之史实也。”为了说清史家通过“分纂综辑”把“史料”上升为“史”这个道理，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云上海五十年中之雨量平均为若干寸，此一事实也，此史料也，此年鉴与调查之好材料也。凡人所知止于此而已矣。一如史家之手，则由此雨量一事可以研寻而得其与农田丰歉之关系也，由农田丰歉之关系而可得金融消长之关系也，由金融消长之关系而可得社会宁扰之关系也，由社会宁扰之关系而可得政治伏伏之关系也，以何因缘而成某时代之状况，以何因缘而某时代之状况演化以成今日之状况，纵横两方，千端万绪，大弥

六合，细入无间，皆在史家分纂综辑之妙腕中。然后可以得真史也。”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此史之所以贵也。”瞿宣颖认为年鉴不是方志，方志不是记现状之书的说法，是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认为“史料”并不等同于“史”，需要有“真史家”，需要史家认真收集资料，“分纂综辑”方能“作一活泼而详尽之史”。这种主张对于摆脱当前有些地方片面强调志书的资料性，修志只是堆砌资料，不在“贯穿”上下功夫，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瞿宣颖为什么认为方志的性质是“地方史”呢？认为方志是地方历史书，乃“史之流”、“史之属”。这种观点较早可追溯至《周礼》。以后许多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但人们只把方志作为“点缀风景馈赠寅僚之物”，方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到清代，章学诚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方志为国史要删”，是“国史之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地位，瞿宣颖认为章学诚的这种观点，可以“矫昔时轻视方志之习”。瞿宣颖在章学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方志就是“地方史”，因为在瞿宣颖看来，“史”非常可“贵”。首先，“欲了解国家与民族繁然万殊之习性情状，必自了解各地方之史始。”其次，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正因为方志重要，瞿宣颖认为“方志之作、岂苟焉而已”。

当今商业大潮滚滚而来，人们竞相追逐物质的东西，对于精神的东西也就看得轻了。影响所及，尽管大多数方志工作者还在志苑里默

默耕耘，却也有不少的人心情浮躁，没有那种神圣使命感了。重温方志学家瞿宣颖“方志之作，岂苟焉而已”的话语，对于我们去除浮躁，潜心修志，增强地方志工作的历史使命感，应当不无助益。

（三）关于方志体例

体例问题，是瞿宣颖最关心的。一部《志例丛话》，大抵讲的是方志是什么，方志写什么，方志怎么写，最根本的是讲方志的体例和方法。瞿宣颖关于方志的体例问题有一个根本看法，那就是，“作地志者，合诸体例成一书，又必分诸书以还各体，方为体备而用宏。”瞿宣颖批评“旧志体例既多未允，分门别类，支离破碎，久为有识所诟病。”他认为，“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之力。大抵工于鉴裁者合则极包罗之象，分之则尽剖析之能。非然，则如市中之杂货肆，欲取何物，先自茫然”，“故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之允。但各地方情状万殊，亦不够强其为一，要在秉笔者之能相体裁衣耳。”

瞿宣颖的方志“诸体例”包括哪些？有记，有志，有传，有图，有表，有录。瞿宣颖认为，“凡志中之各门类，于古各有专书。”因为清洪亮吉在《登封县志》、胡虔在《柿叶轩笔记》中“一一考证其由来”，瞿宣颖对此深表赞同。洪亮吉《登封县志》叙录包括下列门类：皇德记，舆图，土地记，山川记，大事记，道里记，坛庙记，伽蓝记，冢墓记，职官表，选举表，户口簿，会计簿，学校志，名胜志，物产志，循吏传，烈女传，逸人传，高僧传，丽藻录，金石录，杂录。胡虔在《柿叶轩笔记》中说府县志体例本于史部之地理而附益

以传记，包括专详地理，纪载一方大事，郡县沿革，星土之记，疆界道里，户口田赋，风俗物产，山川水利，艺文金石，人物有传，贤惠有传，方外有传，征辟科举，职官名宦，辍辑见闻，选录诗文。凡此皆各自为书，分门著录。从洪亮吉、胡虔所列方志门类来看，包括了记、志、传、图、表、录各种体裁。

除“志”之外，瞿宣颖非常重视“记”这种体裁，在《志例丛话》中单列“通纪”一门加以论述。他认为，“地方之大事，宜汇通为纪以尽其变，不得仅于大事年表中叙寥寥数语，亦不宜散置列传中，使读者难于捉摸。盖一邑之事，未必为众所周知，非特笔综录之，无由著也。”

瞿宣颖也非常重视图表的运用。他认为，“夫图与表皆所以辅文字所不及”。他批评“旧志于舆图之书法，多不讲求”，“旧志中建置之图多粗疏模糊，久为读者所厌”，“又旧志建置图多仪及衙署、书院、学宫三项，而地方名迹转不以图传”，“往时每新修一志而将前志之图削而去之，遂失其因革损益之迹”。他称赞“嘉庆《东流县志》出李兆洛之手，于绘图之法斤斤言之。而光绪《山西通志》中之疆域沿革图谱，朱墨分明，瞭如指掌，均为可贵。自余则解用开方法者已为上乘”，“乾隆《鄞县志》出于钱大昕之手，有天一阁及天童寺阿育王塔图”，“《南海县志》独将明志之图并列，大可为法也”。他认为“今后舆图之胜于旧志必不待言，所当注意者，沿革图应取光绪《山西通志》为法也。”他建议“今日摄影之术至精，径以照片入志，可祛漫漶不正确之弊。然照片仅能示建筑之片面，全部位

置尤关重要，则非绘平面图不可。近《北平志》为庙宇志长编，即以照片与平面图并列”，“不独公共建筑也，即民居亦应以图片存其实状。”他还建议，“今统计图解之法通行，如有适宜之资料，尤应制成图解以便寻究。”瞿宣颖称赞吴恭亨在《慈利县志》中提出的“新志体要”，其中有一条是“详表略文”。瞿宣颖解释说，“其曰详表略文者，以旧志不能利用图表也。”瞿宣颖认为这是“有为而言”。瞿宣颖认为，有些“虽明知其要，而苦无处以容纳之”的内容，可以用表处理。例如，“旧志于民众信仰虽明知其要，而苦无处以容纳之。盖民间所祠，并非秩祠，又在释老以外，不得云寺观也。”“王闿运《湘潭县志》礼典篇为群祠、佛寺二表。”“吴氏《慈利县志》则为祠祀志，而附以家庙寺表观表等。”瞿宣颖认为，在“人物”门类中，那些“仅载姓名”，“若似旧志之肤庸”“无事实可取”的人物，“尽可以一表了事”。

传，就是“人物传”，是志书门类中的重要体裁。瞿宣颖提出“人物不能强分门类，旧志孝友忠义之属久为诟病，无俟烦言，然亦不能绝无排比之法，要宜略以时代性质为次。”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传写人物，瞿宣颖强调“唯以事实为主”，“亦更不须著一褒贬之词”。“例如宦绩必须著其兴何利，除何弊，文苑必著其曾撰何书，属于何派。”“采访之际，悬格尤须森严。如终不能举出事实，则惟有阙疑以俟而已。”这更是真知灼见。这对纠正当前有些志书撰写人物，流水账式罗列生平简介，很少见到具体事实的弊病，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瞿宣颖主张设立“丛录”门类，“其无所附丽者然后归入《丛录》为是”。清代章学诚认为“文士华藻掾吏案牍，皆不可以入志”，而“凡欲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所以，他主张“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征》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二为一尤不可也。”（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而瞿宣颖认为，“今按时代变迁，改制易辙有不可拘墟者，不如酌其性质，随事立题，不必预悬格式。”章学诚所谓“掌故”方面的内容，像“本处现行条例规程等”，“公共机关之文件有永久保存之价值者”，“一切未经发表之史料”，“前志中之表册无文字可传无庸入志者，如选举表，列表女之类”，都可归入“丛录”。瞿宣颖认为，“旧志滥载诗文固属可厌，然章氏以《文征》附入正志之后一说，亦有可商。”他主张，“果其为已经刊行之诗文，不妨但录其出处，后之读志者自可按图索骥，元不必一一逸录，枉灾梨枣。若其未经刊行之诗文，确与地方史事有关，或为本地人士所撰，足与人行谊相发明，即可归入《丛录》，尤为简要。”这样，瞿宣颖不但继承了章学诚的“三书说”，而且，根据时代要求，对《文征》《掌故》二书加以改造，总而标之曰“丛录”，使之与正志连为一体，既达到了保存一方文献的目的，又使志书“瘦身”从而达到了文风简要的目的。事实上，现在的志书大多采用了瞿宣颖的主张。

（四）关于方志内容
志书写什么？这是瞿宣颖讨论

的重要课题。在继承旧志传统的基础上，瞿宣颖主张根据时代变化，把具有时代性质的内容写进志书，尤其注重经济、社会方面的内容。经济内容方面，他认为“旧志中之经政一门，仅指田赋、武备等数项，自不足以尽今日之制度。宜就一切事业之属于行政范围者，如财政、如警政、如交通、如司法、如公用，分门叙述而佐以图表，此例民国《胶澳志》及《定海县志》差为明备，可资借镜也。”又认为“县邑文献以田赋一门为最繁杂，难寻端绪。然民生利病，大之系于此，若掉以轻心，恶其害己而去其籍，则大误矣。旧志半草率者，多仅录现行之制，而略去宋明以来旧制，甚或以别有《赋役全书》，遂不复详载于志。殊不知《赋役全书》极难保存，若不附志以行，则久将无考。”瞿宣颖非常推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认为“史迁货殖之篇，久无嗣响。在近代工商业化之郡邑中，尤应有此专篇以穷社会经济之变。旧志中若博山之于玻璃，浮梁之于瓷业，类有专篇，固其宜矣。即寻常物产，寻常贸易，亦应详实记之。”

社会内容方面，他尤其注重宗教、风俗、氏族、狱讼等方面。他认为“自魏晋以来，各种宗教之活动于社会者何可胜道？”“今后志书似不宜再沿用寺观之称，宜并罗一切而名之曰宗教建筑。”“至于宗教之活动，如教徒之多寡、演教之历史，及其所经营之事如慈善教育等等，宜列为一篇，名之曰宗教事业，庶乎克备。”瞿宣颖认为“人民之社会活动，在往时似甚幼稚。然如善堂、书院、社学、社仓之组织，及一切地方公益之提倡，实未尝缺乏。汉以后绅士团体为中

国社会问题中一大案，其活动力实驾行政官吏而上之，若不综合叙述，不能显示社会真状。今后宜将此类问题汇为一篇，名曰社会活动。近代发生之新事业，如教育，如慈善，如卫生，如出版，以及上述之宗教，至是皆有所容纳矣。”瞿宣颖批评旧志“每述风俗则必摘拾史传陈言以资发端，而于当时民间风俗之实状转不之及。”他借用道光《大同县志》上的话说，“今于历代地理志等书不抄录一字，而以今日之见闻习尚质言之”。瞿宣颖在阅读旧志时，“每苦其叙述风俗仅具形式而不得其真。”所以他主张“今后修志，宜标民俗为专篇。所有家庭之组织，职业之选择，社交之往来，信仰之类别，以暨起居饮食服御娱乐艺术等等习惯，无不在纪述之范围。歌谣与谚语为民众文学之所表现，尤应广为甄采，不得以其俚俗而忽之。”瞿宣颖认为“氏族一事，在地方文献中最关重要，斯盖文化升降之所由系，而一切社会制度所因依也。”“千百年来社会所以构成，纯在于此。”“此而不讲，何以了解社会真状哉？”瞿宣颖认为，“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创人谱一例，于此事独有会心。”他在《方志考稿》中引申其说曰：“核而言之，人民里贯是政治社会制度所从出也，其迁徙之迹，又文化升降所从显也。自汉以来，立世久远，苟能举诸疆宗巨族，溯其渊源，踪其分合盛虚往来久暂，斯诚治史者一伟绩，足令吾曹深明历来社会组织之进化情状，且布露吾民族精神与世共见也。惜乎昔之治方志者，多忽视谱牒为无从重轻，而私家谱牒又闕不可见，散不可纪。汝纶独以卓然远到之识，创人谱一例，网罗散逸，

详而不冗，可以垂为法式”。瞿宣颖认为“县邑档案中最足窥见社会情态者，莫如狱讼。今修县志宜悉搜罗而董理之，断自若干年，为盗案若干事，为奸案若干事，为争产案若干事，为索债案若干事，某事之特殊性质若何，特殊经过若何，其判决后之影响若何，某时代与地域之分配若何，有特殊案件为地方所传说久而弗衰者，尤宜详予纪载。”

瞿宣颖也重视“古迹”方面的内容，他对“古迹”的看法，非同一般，很有见地。他认为，“吾人既作地方史也，则地方之一事一物皆当作古迹观。皆当追求其历史而纪述之。”他认为“旧志记古迹多忽视居宅，殊不知古之胜迹今为民居或今之民居建自前代者，其可记之价值正不亚于寺观之流。”瞿宣颖认为，“一村之民，某姓家何在、有何胜景、有何传说、建自何年、何时易主，若以活泼之笔写之，真良史也。”又认为“旧志于坊巷中兼记居宅者尚偶见之，而记及市肆者则绝少。不知各地皆有至古之店肆，足以左右其地商业者。此而不记，何史之足云。”

在内容上，瞿宣颖主张写出一地的特色，而要写出一地的特色来，首先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抓住富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来写。瞿宣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譬犹为人作传焉，岂直记其姓名爵里生卒年月而已，岂直记其作传之时作何状而已，必溯述其所生之家世，其所禀之气质，其所受之教育，其所交之友朋，其所历之境界，其所营之事业，其所溯之习性，其容止语言起居饮食服御好恶举无一不当精研而深著之，然后所传之人跃然如在目前，其人之美恶功罪然后可以昭然共见。”瞿宣颖

设问：“善为志者何以异此？”抓住富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来写，就能做到“吾为《上海志》，则当使人读志而可知上海之何以为上海。吾为《杭州志》，则当使人知杭州之何以为杭州。”

（五）关于修志方法

瞿宣颖在《志例丛话》中谈修志方法，是从三个层面来谈的。首先，编纂地方志，对于旧志来说，是推倒重来，还是续修？其次，从编纂程序上来说，主要注意什么？再次，各门类具体怎么写？

是推倒重来还是续修，瞿宣颖主张续修。“曾国荃在山西撤属修志”，“其言曰：经费支绌不得，不设法变通，应将府志暂缓兴修，州县原有志书亦无庸更动。先令各牧令查明原修志书以后应载各事实，另修补志一册。即照原分门类，挨次编纂。其有原修志书以前事实前志未载应行添入者，另列补遗一门。或前志已载尚须辨正者，另列纠误一门，以期简便。”瞿宣颖赞“其办法类简而易行”，“有保存地方文献之实，而不居修志之名，亦不致有修志之费，诚良法也。”他主张，“今后修志，当严立规程，只可将前志加以整理而约取之，不得叠床架屋，修而又修。如自揣不暇及此，尽可即以采访所得汇成刊布，毋庸遽行修志，空耗物力。”“他日物力有余，正可从容根据旧志融会新料而成良史也。”

编纂程序上主要注意什么？瞿宣颖着重注意到资料长编的编写和人员的准备。

瞿宣颖认为修志首先要学习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办法，编写资料长编。他在《志例丛话》中论述“方法”时说：“凡著书有一

定方法。司马温公撰《通鉴》，先为长编。宋人记其事云：分修诸人按年录写，联为长卷，然后公审其异同，定其去取。观其《考异》三十卷，可知其力之勤。其长编稿存洛阳至盈两屋，可知其取材之博。以近代史学方法言之，则所谓原料之搜集与整理也。”

他认为编写资料长编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按照现代学术规范，注明资料出处。他说，“为长编之法，最要者注明出处，则来源之虚实，传说之异同不难覆按。高似孙《剡录》，潜说友《临安志》之例甚善。此为著书不易之规，而修志者多忽视之，以至精粗杂糅、茫不可辨。不独为长编如此，即定稿时亦应如此。尤须注明卷数。至新出之书，并须注明页数。罕见之书，并须注明所藏之地。复见之文则须注其初见之处。凡学术上之著作通例如此，不可违也。”

他提醒在引用文字时，注意保持原貌。他说，“引用之书决不可改易文字，凡有删节，宜以删节符号表出之。引书起讫尤应表以引用符号。此则古人所不讲求，而今兹宜注意者。”

瞿宣颖认为方志之作，要严肃认真，不可随便。在人员准备上首先要选好主编和编修人员。他说，“众手修书，自古难之。古人官修之书所以能佳者，全在一学识超卓精力弥满之人一手鉴裁。尤必其分修之人皆学有专长，能举其职，又必假以优闲之岁月。”“分修之人虽极一时之选，而无负责者为之主裁，则仍于无绩。”

同时，他要求地方人士通力合作，提供资料。他说，“虽然，有贤史家为之秉笔裁定矣，若地方人士不能了解志之意义而尽力以扶助

之，则史家亦不能为无米之炊也。”

各门类具体怎么写？瞿宣颖认为，“凡志中之各门类，于古各有专书。”因为清洪亮吉在《登封县志》叙录、胡虔在《柿叶轩笔记》中“一一考证其由来”，瞿宣颖对此深表赞同，同时主张参考古人的写法。比如，“记山川之文，鄙注最为可法。以其随宜叙记，不拘成格，摹绘景物，能使读者如亲临其地也。”

（六）关于方志资料

瞿宣颖对于方志资料，也有很好的意见。因为瞿宣颖认为方志就是地方史，所以，他在《志例丛话》中论述“史料”的观点也可看作论述方志资料的观点。首先，瞿宣颖认为方志资料是修志依据。他认为，“凡史必以史料为依据”，“无此则史不可成。”其次，瞿宣颖认为保存方志资料不容易。他说，“故知不独修史难，即存史料亦殊不易”，“地方史料之至可珍而遭无知之劫者岂复可以数计？”他认为，“中国为最富历史之国而亦为最不善保存历史之国。地方之史，则保存者犹希焉。”他分析了保存方志资料不容易的原因。一是不得其人。他分析说，“盖地方政府之实权不操于行政官而操于胥吏，胥吏利于档案之湮没以为舞文弄法地步，决不肯轻易示人。”他借光绪《登州府志序》中的话呼吁：“夫留心文献，未可责于俗吏；而能以论著成书有资文献者，亦未可以望之于俗人”，他希望“自今以往，长民者皆不以俗吏自为，而乡人士亦不以树文献之望，无使郡邑故事至于颓败不可收拾焉。”一是“保藏不得其法”。

一是“水火寇盗”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解决办法一是州县需要设立志科。他说，“严格论之，今日修志尚非急事。取章氏立志科之说而厉行之，乃真刻不容缓之事耳。”一是需要“严立规程”，“明订标准”。一是需要地方人士“尽力扶助”。他认为，“夫方志之撰集，仰给于乡人之倾助者，若谱牒也，传状也，著作也，古物也，传闻也，非以公诚之心悉索而献之于秉笔者之手，则虽班马复生，亦难成传世之作。”所以，需要地方人士了解修志的宗旨，“举故实以相资”。

(七) 关于其他

瞿宣颖对方志文风也有所论述，他认为文风简洁在于条理。他说：“文之简洁与否，不系于其量之多寡，更不系于事之丰高。苟无条理，则事虽俭，字虽约，其不能简洁犹是也。苟具条理，则虽支流万派，朝宗于海，起讫分明，必愈形其简洁。”

通过上述论，我们了解到，瞿宣颖是20世纪重要的方志学家，他是民国时期方志学界“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有过长期的修志实践，对修志理论的研究造诣也颇深。他撰写的《志例丛话》是民国方志学上的名著，他在书中对当时及以前的许多修志名家的修志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修志主张，这些修志理论对于我们当前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综合《瞿宣颖与地方志》，王桂云著，辛亥革命网，2012年3月6日；《方志百科全书》《方志编研名人（古代·民国）》（讨论稿），《方志百科全书》编辑室，

2011年4月，第40页。

②参见《瞿宣颖与地方志》，王桂云著，辛亥革命网，2012年3月6日。

③《关于北京地方志发展之概况》，北京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张雅晶，转引自民俗学博客-张勃的星空。

④《〈上海通志〉总体设计初探》，姚金祥著，《上海地方志》1991年第2期。

⑤《〈方志百科全书〉总体设计书（讨论稿）》，《方志百科全书》编辑室，2011年4月，第61页。

⑥《关于北京地方志发展之概况》，北京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张雅晶，转引自民俗学博客-张勃的星空。

⑦《关于北京地方志发展之概况》，北京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张雅晶，转引自民俗学博客-张勃的星空。

⑧《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3页。

⑨《方志百科全书》《方志编研名人（古代·民国）》（讨论稿），《方志百科全书》编辑室，2011年4月，第40页。

⑩《中国地方志词典》，黄苇主编，黄山出版社，1986年11月，第512页。

⑪米新夏：《〈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载《书屋》2002第1期。

⑫《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3页。

⑬《中国地方志词典》，黄苇主编，黄山出版社，1986年11月，第206-207页。

⑭《中国地方志词典》，黄苇主编，黄山出版社，1986年11月，第555页。

⑮《傅振伦方志思想研究》，梅溪笔谭-搜狐博客文章。

⑯《略论民国〈河北通志稿〉》，秦政才、王宪政著，载《中国地方志》2000年6期。

⑰《方志百科全书》《方志编研名人（古代·民国）》（讨论稿），《方志百科全书》编辑室，2011年4月，第40页。

⑱《读方志琐记·编者按》，朱士嘉撰，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226页。

⑲《〈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内容简介》，瞿宣颖编，戴维校，《湖湘文库》，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

⑳《志例丛话·编者按》，朱士嘉撰，

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2页。

㉑《当代志书编纂教程》，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10页。

㉒《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6-197页。

㉓《记与戴东原（震）论修志》，章学诚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37页。

㉔《记与戴东原（震）论修志》，章学诚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37页。

㉕《方志今议序例》，黎锦熙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236页。

㉖《方志今议序例》，黎锦熙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236页。

㉗参见《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廖晓晴著，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第32卷第1期。

㉘《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3页。

㉙《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4页。

㉚《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第196页。

㉛《方志百科全书》《方志编研名人（古代·民国）》（讨论稿），《方志百科全书》编辑室，2011年4月，第24页。

以下引文除标明者外都引自《志例丛话》，瞿宣颖撰，转引自《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朱士嘉编著，《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5月，不再标明。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湖南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

依托政府互联网信息平台 强化地方综合年鉴传播和资政服务功能*

●周南非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运用,网络这种具有快速、及时传播功能的传播形式被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级各地党政机关政府部门为进一步深化职能的转变,纷纷建立起自己门户网站和信息平台,也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政府的门户网站是一个信息快速散的平台,是政府在线服务的主要渠道,它强调对各个部门提供的信息进行整合,并通过统一的平台提供给公众。我们编辑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是政府主导主办编纂的重要信息集合体,是政府对社会每年发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白皮书”,有着海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信息和实用性资料。如何将这些信息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互联网政府信息平台或地方综合年鉴自己建立起来的网络平台,广泛地传播给社会各界,让地方综合年鉴的大量信息服务于现实社会,也宣传年鉴的使用价值,使社会各界通过这个信息载体了解和查阅各种实用信息和资料,这是地方志和年鉴编辑部门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新课题。

一、政府网络信息平台与地方志、年鉴的相融性分析

(一) 政府信息平台的权威性和覆盖性。政府信息平台(门户网站)是提高政府能力和为大众服务的一个综合性窗口,代表了政府对公众与企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信息平台是最大的信息制造者、采集者、使用者和发布者,并可代表一个时期,一定阶段网络发展和进步的现状和成果。进入信息社会,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过去无法想象和比拟的。它传播的目的在于实现信息的广泛交流和共享,其权威性和覆盖性其实正是地方志、年鉴的相关信息资料向社会广泛发布和人民群众广泛应用信息的最佳平台。

(二) 地方年鉴的出版存在时效性缺失。年鉴出版一般情况是以年为周期的,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其作用是其他一般工具书所不能替代的。年鉴富含大量信息,信息量是年鉴功能

的标志。年鉴以承载大量信息而存在,这些信息应该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年鉴出版形式和信息获取方式均不能做到时效的有效性。

时效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所起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和信息是基本的生产要素,所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格外迫切和强烈。年鉴出版时效性显得越来越重要。年鉴时效性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使用价值。所以年鉴出版得越早,通过网络传播得越快,其时效性越强。反之,时效性越弱。而且其中的信息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失去其最大利用价值。网络经济时代,信息的来源渠道越来越广泛和全面,读者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获取其所需信息,年鉴编纂部门如果不重视出版和传播的时效性,久而久之,读者就会流失,市场就会缩小。

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发展趋势

(一) 传统纸质出版地方年鉴存在的不适用性。盛世修志和编纂出版年鉴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逐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一般课题,编号为:2012SZKT(Y)022。

渐开始的文化事业，我们编辑《湖南年鉴》也是从上世纪的1985年开始编辑出版，现已连续出版27部。从过去的条件和实际情况看，这种传统的纸质出版物虽然在过去的年代里和条件下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各方面的作用，但从当今信息化手段提高和信息化程度飞速发展的现状看，年鉴的传统出版方式已摆脱不了实效性差、传播方式单一、应用范围局限、索取资料和信息麻烦，并且使用起来不方便，不便携带等缺陷。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年鉴编纂单位和年鉴事业发展也不平衡，特别是年鉴的使用效率下降，发行量也不断减少。就《湖南年鉴》发行情况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行还在1万册以上，现在只能发行几千册，并且发行工作非常困难。还有大量的城市年鉴、行业年鉴发行只有1000—2000册。特别是购买年鉴后，均搁置于书柜，可以说由于查阅不方便而成为了摆设。

(二)、电子版、网络版年鉴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并依赖于现代科技与信息技术，我们传统的书版年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冲击和挑战，要继续生存下去就要有所应对、有所创新。而出版电子版、网络版年鉴正是迎合了这种要求，通过架构、功能、风格的改变以适应读者的新的需求。网络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后的“第四媒体”。年鉴编纂出版必须求新求异，充分利用政府网络平台传播信息量大、传播快捷和传播方式多样的优势，以最新、最快、最

有效的获取信息的方式来吸引公众。创新是年鉴发展的生命力，电子版、网络版年鉴则是创新年鉴传播方式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也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三、加强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和服务功能

(一) 地方综合年鉴资政和服务面狭窄的原因。年鉴作为出版物长期存在读者面狭窄的问题。这是因为年鉴自身编纂形式和受众的局限性而决定的：一是从编纂的内容看，承载的信息资料是记录一年或几年的发展状况，即使刊登一些民用资料，普通百姓不会为了获取少部分可用信息而购买整部年鉴，年鉴的读者范围被锁定为职务使用者。其次，年鉴的“彩色宣传专栏”绝大多数刊登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不是与大众生活相关的消费产品。年鉴服务功能越来越小，失去读者市场。二是从地方综合年鉴所涉及的地区和行业来看，其读者范围锁定在一定的地域或行业，限制了年鉴进行市场空间扩张。其发行量和影响力远不及其他媒体的电视、报纸、期刊。长期以来，年鉴编纂内容中没有与大众工作、生活相关的信息，离普通百姓生活只能是越来越远。三是从年鉴出版时效性看，年鉴信息具有发布和更新的滞后性，与大众对即时信息的要求不吻合。其信息滞后期至少为半年到一年，有的三、五年出一本，周期更长。对于要求即时了解社会信息的大众来说，年鉴已经

无法满足需要了。

(二) 大力拓展地方综合年鉴服务面。地方综合年鉴要努力增强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要下决心和力气，进行探索、改革，不断拓展地方综合年鉴的服务面，使年鉴事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要不断扩大年鉴服务的对象。年鉴是为现实服务的信息载体，要树立符合现实要求的新观念，打破传统思维，重新认识年鉴，把“官本”位思想有意识的投向普通百姓，把为大众服务作为扩大读者面的新要求。强化服务功能，力争进入广大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和家庭。年鉴不仅为经济、政治、科技、文教等部门服务，而且要走向企业和社会，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要。

二是要充实、完善年鉴内容，首先要提高年鉴有效信息率。年鉴的有效信息率高低从根本上决定其质量好坏，作用大小，发行面狭窄。拓展服务功能的重心就是要增加年鉴的有效信息容量，充实年鉴的内容。增加年鉴的有效信息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努力挖掘、拓展深层次资料。②增加统计图表数量。③增加横向对比资料。④增加指南性资料等等。还可设置普通老百姓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化信息，如水、电、气、住房和城市建设、电信等的行政政策、收费标准等，还可以登载专业化信息，如投资政策、行政赔偿、司法救助、土地管理等信息。还有就是社会热点信息，如事业与家庭生活关系，

道德与金钱关系,婚姻、子女教育问题等等。

三是要探索年鉴出版方式的创新,引入多媒体光盘制作年鉴。多媒体光盘为载体的电子出版物,不仅信息容量大,具有便于携带、便于检索,便于利用的优势,可以赢得更多的用户、扩大发行量;年鉴可尝试利用网络形式出版发行,网络具有传递信息迅速、方便,信息更新速度快、无地域限制等优势,可打破年鉴信息一年一更替的编纂方式,做到信息随时更新,及时发布。

四是要建立横向和纵向征集资料网络和发行网络。发行网络体系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让更多社会群体享用,同时,加强与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层面的联系,拓宽信息渠道。发动编辑人员主动上门收集信息,变动征稿为主动求稿、采稿,经常征求读者对年鉴的意见,了解读者对年鉴的反映。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特定的文化产业,要培育更具活力的、大众化的市场,需要从经营思路上来一个转变。首先可通过适度扩大年鉴的宣传彩页,获得正当收益,也是拓展市场空间,求得年鉴事业正常发展的必要手段。

五是年鉴自身要多做宣传。让社会更多的了解年鉴,运用年鉴和推介年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读者群。不断扩大年鉴产品交流,使人们认同年鉴的使用价值。

六是开辟新的现代网络信息平台。要面向社会用鉴需要,构建群众读鉴、社会用鉴的信息平台,并

通过政府网络信息平台传播年鉴有效信息,让更多的用户加大读鉴、用鉴力度,最终达到服务于现实经济社会的目的。

(三)探索地方志、年鉴编纂部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途径。长期以来,地方志、年鉴的编纂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笔者认为,这些纲领性的文件、法规都将随着时间的变迁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修改和修订),地方志书是二十年编修一次,这种编纂方式离现实生活实在是太久远了。这里举个例子,2013年4月26日,省地方志编委会召开《湖南省志1978-2002》工作会议,也就是说11年后还在研究那个时段省志的编纂工作。这里想要说明的是记录历史一定需要“沉淀”,还是这样的编纂方式本身就 need 改变,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编纂工作人为的没有按时按量尽早完成任务。还有就是志书、年鉴编纂出版后,成品又厚又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把它们放进书柜或由收藏单位收藏,就是志书、年鉴的归宿,真正很好地为现实经济服务成为空话。

笔者认为:第一,地方志书、年鉴都可以出版《简本》,这些“简本”浓缩全书的精华和重要内容,通过赠送和发行的方式交给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公众使用,达到服务于现实生活,起到资政教化的作用。据了解,深圳年鉴社就一直出版《深圳年鉴》简本,收到良好的效果。省地方志编委会还可以通过与省教育厅或湖南出版部门

等相关单位合作,将编纂的《湖南省志》简本、《湖南年鉴》简本交给或发行给全省的高中以上或大专院校的学生,作为一种教学辅助资料版本,人手一本,让年轻人可以学习和掌握湖南的基本省情、历史沿革和发展变化的各种知识,有利于服务教育,培养学生爱国、爱家的情怀。

第二,鼓励全省地方志系统与有关单位和部门开展横向合作,充分利用地方志系统掌握省情、地情的独特优势,探索开发地方志资源,服务于现实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提高地方志系统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许又声还一直强调,地方志、年鉴工作部门要加强传播工作,服务于现实和工作大局。株洲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地方志优势,联系株洲市政府、华谊兄弟影视公司等单位等拍摄有关炎帝陵内容的电视记录片,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取得较好地效果。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长沙年鉴》编辑部同有关权威的互联网网站联合举办“长沙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浙江省地方志系统也有《地方志部门与高校的新型关系》、《浙江方志与浙江旅游关系研究》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些都说明地方志和年鉴的编纂工作是可以贴近现实生活,为当代经济社会服务是大有作为的。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工会主席)

湖南省县志书 篇目结构的历史演变及探讨*

● 尹克加

一部志书的篇目体现的就是其框架结构，实际上也就是志书所述内容的总体安排。篇目制定原则从属于志书体例，体现著者的编纂思想。“著书者，以义为体，而例从之。”^①修志未动，篇目先行。篇目设计不当，后面麻烦难了。“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之允。”^②“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之力。”^③我省第二轮市县志的编修，现在县区志已完成总出版任务的60%，市州志绝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时候，从地方志书发展的历史沿革中考察篇目演变的情况，从而吸取其中的精华，势必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志实践有所裨益，笔者企图从这个方面作些尝试，谨做抛砖引玉。

中国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悠久，但真正走向成熟和形成规模，还是明代以后。湖南在清康熙三年（1664）才正式从湖广分治，但是境内府县两级的修志却早已有之。可惜的是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并不多见，笔者只能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几部旧志出发，再结合建国后新修的一二轮志书状况，笼统地谈点看法。

一、明代志书的基本篇目

明洪武九年，朝廷即诏天下州郡县纂修志书。“永乐十年（1416年），朝廷为编修《一统志》而颁降《修志凡例》16则，沿《大元一统志》例，规定志书采用平目体，又称门目体，即多目无纲，平行排列，无所统属”^④。

嘉靖十五年（1536），由刘黻主编的《衡州府志》分全志为9卷26章，也是采用的这种一级平目。

全志设天文地理、建置沿革、风俗、郡邑职官、山川名胜、古今亭馆、城池、公署、邮驿、关梁、坊乡、藩封、古迹、田赋、土产、廉帑惠政、祀典祠宇、陵寝、丘墓、学校、书院、选举、辟举、例贡、府吏、人物（乡贤）、节孝、名宦、流寓、兵防、将才、祥异、纶音、御制、五箴、艺文、别录、寺观、仙释、杂志40类。

对照朝廷的《修志凡例》，《衡州府志》有其自身的特点：一、在“天文地理”中，讲“翼轸分野”，沿袭古代星占术的概念，总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与天上的星座位置有固定的对应，这是一种科学不发达的表现。在“地理”中讲了方位“东傍湘江，北背蒸水，岭开越岬，路转荆门。”作为府志，对于所属8县一一列名作了疆域和建置沿革方面的简单介绍。二、在社会门类中，增设了“邮驿”、“关梁”、“坊乡”，邮驿是古代传递文书、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驿站，最早的邮递机构。关是关隘，梁是桥梁，关梁就是关津要塞，有军事地理的作用。三、将“廉帑惠政”合为一类，颇有新意。廉帑为粮食货币，惠政为仁政，二者合而为赈济弱民。四、将人物细分为乡贤、节孝、名宦、流寓，有了具体的标准，特别是“流寓”，可以记外籍在衡名流。

几乎与《衡州府志》同时纂修的嘉靖《常德府志》，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采用的则是纲目体。将一些相关的内容升为一个大门类，门下设若干目。如沿革、分野、形胜、山川等就归为“地理

志”，这样显得集中和精炼一些。该志共二十卷，共分为地理志、建设志、食货志、学校志、祠祀志、守官志、兵防志、人品志、艺文志、方外志10大类，外加一个“拾遗（附）”，有的一个大类占3卷。

该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分野”一目中，有个“岁时杂占”，分月结合农历24节气，收录一些农家谚语，讲气象知识；另将“祥异”结合自然灾害也归入此类，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分野”门类的科学性。该志在“地理志”中设了“里至”，分别写明了府境和所属4县县境的区域范围，符合朝廷的《凡例》要求。在“地理志”中还出现了“景致”一目，将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处都搞了个“八景”，但仅有名称，无具体描绘和说明。

关于明代县志，笔者手中仅有明万历四年（1576）以邑人李元复为主纂修的《桃源县志》。该志篇目有点类似三宝体（土地、人民、政事）：以天文、地文、人文分成三大类。天文讲分野、占候、祥异这一类由老天爷管的事，地文讲形胜、景致、疆域、山川、古迹、关梁、陂塘、土田这一类自然地理的东西，这里比较细化了的是将草、药、木、竹、鳞（鱼）、介（有甲壳类水产）、虫、鸟、兽、货（油、绢、棉等物产）、谷、蔬、瓜、果等分类，等于现在我们所说的“自然资源”，但资料简单，许多物产仅标一名称，无具体说明。人文又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还是主体，讲建置沿革、风俗、户口、赋税、公署、廨舍、儒学、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为：2012 SZKT(Z) 012。

武备这些常有的事业，中部分讲在这里任职的官员及政绩，以及乡贤、进士、乡举这些地方精英。下部分实际上就是“艺文”了，大量的名人诗文居然占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当然这也与该县有“桃花源”这一名胜有很大的关系，是个著名旅游景点。

二、清代志书的基本篇目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修志事业的鼎盛时期，在志书种类、成书数量、以致志书质量等方面，都明显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皇帝采纳了保和殿大学士周祚的上疏“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为汇为《大清一统志》作基础。关于志书体例，朝廷要求“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集成书”^①。河南通志成书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凡50卷，陕西通志成书于康熙六年（1667），全书凡32卷43门。对于二志，章学诚认为“不相统属之法不足师法。”

始著于康熙七年（1668）、成书于康熙九年，由前明四川巡抚、后髡发为僧的钱邦芭纂修的《永州府志》可以反映出深受明末通志影响的清初州志的一些特色。全志24卷，列目135个，如明嘉靖《常德府志》一样，《永州府志》在篇目上还是采取的二级平列，按照事物性质大致进行归类：设有图像（有43张地理舆图）、天文、舆地、建置、秩官、学校、山川、祀典、选举、田赋、武备、人物、艺文、外志（灾祥、耆寿、仙释等）。与嘉靖《常德府志》比较，该志将“田赋”单独列志，不是排在“食货”之下，并且占了2卷的分量，就大为增加了记述的内容。“山川”不列在“舆地”之下，单独列“山川志”，突出记载。艺文分

状、表、赋、颂、记等20余目，分门别类，记载颇详。将“灾祥”和“瑶峒”入外志也别具一格。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突出标志就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理论形成完整系统体系，特别是强调地方志是独立于地理学之外的一门专门的学问，为“一方之全史”的观点，在体例上“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通志事纪），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典章制度），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的“三书”和附“三书”之后的“从谈”模式^②，均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嘉庆十八年（1813），由常德知府应先烈监修，武陵县举人陈楷礼撰写的《常德府志》48卷出版。据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何孝积先生考证，该志的基础由乾隆五十八年（1793）《常德府志》24卷奠定，而乾隆府志恰好由章学诚本人参与了撰次，并且还有章氏《为毕秋帆（沅）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一文可资佐证^③。

嘉庆《常德府志》在篇目上的特点，是首列“皇朝大政记”，即本朝自顺治起，凡与常德有关或者对常德有影响的大事尽录；然后再列“古大政记”，从古至明末。这两卷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事记”。山川、建置、赋役这些内容都加一个“考”字，以编者的话就是“由目考而非臆测”。如“物产考”中的“谷”，就对境内的生产品种、程序、习俗都记叙得很详细。“艺文”按经、史、子、集和金石文字分类。在对“赋役”的记载上，该志作者批评旧志“只载今制，不及前代”，“不考前代之繁苛，无以知今日之逸乐”^④，虽然有些阿谀当朝，但做法还是值得肯定。该志还将周、秦、汉以来的田赋政策和数额都坐了记载，详今

略古，明、清两代的特别详细。该志在记人物上的做法也有些新意，在下卷的14册列一个“政略”的门类，将历代主要的地方长官结合其政绩都有个交代，武将们还有个“武略”，文治武功都入志书。如岳飞、潘美等。记人物仿《史记》体例，设“列传”分类记。该志的最后两篇为“常德文征”和“常德从谈”。“文征”之首就是历代帝王的“诏谕”和大臣、地方官们的疏、启。“从谈”就是将“从言胜说，无当经论，而有资谈助者”^⑤更为一卷，“皆不入志篇”^⑥。自然还包括了一些怪异和传说。

清同治十三年（1874）问世的《直隶澧州志》却是将“诏谕”放到全志的首要位置，并且收录得多和详细，“诏谕”一般都与本地有极大的关系，如地方行政机构的变动，受灾后田赋的蠲免等。有的“诏谕”就极有存史价值：雍正元年（1723），同意湖南的士子参加乡试可以不必再过洞庭湖，以免“湖水浩瀚无边，波涛不测，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⑦；雍正五年（1727）批准桑植、保靖两地“今俯顺舆情，俱准改土归流，设官绥辑弹压。”^⑧还有对地方官吏的严厉批评，如雍正十年（1732）“即将镇筸新设之四百名，酌量派拨，以资防御，不必固执前见。”这些对湖南地方来说都是大事，再者给人的感觉是雍正皇帝确实管得蛮细。

清末较有名气的志书还有王闿运纂修，同治七年（1867）刻印的《桂阳直隶州志》。该志在篇目上一反旧志以“星野”排头的作法，以“疆域”作为首篇，根据桂阳的特色，为完整记述境内瑶民的历史和现状，设置了《侗瑶志》专篇。为弥补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偏向，专列了第十篇一卷“货殖

卷”，并且以详细的资料专门阐述了州内各种矿产资源的特点以及开采历史和兴衰缘由。

笔者手中还有几部清代的县志除在篇目的类别上大致相同外，还分别有其自身的特色。

清乾隆十二年（1747）编修的《攸县志》在“人物”一类，专设“恶行”一门，记述当地一些品行恶劣，荼毒乡曲之人。清道光四年（1878）成书的《凤凰厅志》，由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该志设“屯防”一目，反映兵民合一、且耕且守的特殊制度——“屯政”。由于朝廷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激起了苗民们的武装反抗，为防止这种反抗，志书在“兵防”之后，设“苗防”一目，专讲对苗民的治理。

清光绪四年（1878）出版的还有《安乡县志》，由于该县地处洞庭湖区，故专设水利、堤垸、塘堰等门。光绪十五年（1889），王闿运主纂、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历史上第十一修的《湘潭县志》，堪称清代湖南县志中的佳构。志书在卷三首设“事纪”，上限起于汉高祖五年，下限止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志书开修之时。“斂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⑧，执公正立场，直书史笔。

三、民国时期志书的篇目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分两个阶段：1912年1月至1927年7月，为史称“北洋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上半年，为南京政府时期。前期可以看作是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的过渡期，后期是近代方志的成型期。

湖南民国前期有民国10年吴恭亨纂修的《慈利县志》，在篇目设计上，体现出“因事命题”的原则，“以实业、财政、教育、议会取代食货、赋役、选举等，反映了

新时代事物的变化。在内容上也体现了弃旧标新，对于旧志之载鬼神，概从删削，对于最新科学文明成果，如邮政电报各类学校等，则记载务详”^⑨。

民国18年（1929）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呈奉行政院转奉国民政府令准，颁行《修志事例概要》，凡22条。第七条规定：志书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科学方法绘制精印。第十三条规定：各省志书“应特列大事记一门”。第十六条规定：对艺文书目应仿《四库全书概要》例编列提要以资参考，不能仅列书名、卷数及作者姓名。第十八条规定：“天时人事，发现异状，却有事实可征者，应调查明确，据实编入，以供科学之研究，但不得稍涉迷信。”^⑩该《概要》的颁布，对于各市县志的编修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全国有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注重研究讨论修志事宜，并且身体力行地直接动手编修志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在省府提议《方志新体例及进行办法》一案中提出了省志宜“解散方志旧体，分编年鉴、专门调查和省史”的“新三书”的论点。

民国27年（1938），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西北联大教授黎锦熙修《城固县志》并作《方志今议》一书，提出了明三术（续、补、创）、立两标（地志历史化，历史地志化）；广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破四障（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等思路^⑪。

民国后阶段所保留的县志有民国19年（1930）修承浩纂修的《沅陵县志》（因经费拮据，当时未出）。该志在篇目上大体还是旧瓶

新酒，但是“各类子目则变前志老例。观于食货篇，可以知社会之经济，与夫人民生活之能力；观于风俗篇可以知近时礼俗及衣、食、住一切之状况，而社会普通心理，与夫平民、文艺、宗教信仰，亦得以知其大凡。”该书记事类，采用分类编年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体裁，如1902年发生在当地的“辰州教案”，就记得较为详尽。

民国30年（1941）由邓典谟（革命烈士邓中夏之父）总纂的《宜章县志》出版，属于民国时期质量较高的志乘。该志篇目中的疆域介绍到乡都、村庄、圩市和田洞。山志和水志单立，事纪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直至民国29年（1940）底落笔，事件的始末特别详细，如共产党领导的湘南暴动都有如实记载。将气候、土宜、农事与风俗合为风土志，这一点不及黎氏科学。专列“社会志”，介绍农会、工会、商会，并且最后一段还对这些组织的活动进行一个评议也颇有意思。专设政党志，主要介绍国民党的几个阶段，但不知为何未列“共产党”一目，似为不全。“秩官”之外列“名宦志”，沿袭了旧志的传统。

由刘谦总纂，与《宜章县志》差不多同时、但一直拖到民国37年（1948）才出书的《醴陵县志》也属于较好的作品。该志设“地理志”，囊括疆域、水道、地质这些内容，设“政治志”将户籍、职官、财政、救济、团防、议会、党务等熔为一炉，也是个创造。设“氏族志”反映境内人数较多的姓氏来源与发展情况，“人物表”列“抗日阵亡将士”名录和附“日寇陷醴殉难人民名册”，“方言志”里除了详细的声韵表外，另作“方言考”，着重探寻常用方言词汇的本文以及与相应书面语言在读音上的区别，如“崽者子也”。

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44年5月颁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省都成立了文献委员会主管修志。湖南的市县志编修都做好了一些计划，由于后来的时局发展，志书大都没有完成，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一些主修人拟定的县志纲目中看到他们的思路。

张平子所作《湘潭县志续纂修计划书》^⑩提出了县志六大部分之说，较为接近我们今天的分类：第一，总纲。含疆域、大事记、建置沿革；第二，自然部分。设地理志，含地形、水文、地质、土壤、气候；第三，经济部分。（作者说明：生计二字，似太抽象；食货二字，似太狭隘。）含农业、工业、商业、矿业、交通、合作、仓储、救济、盐务；第四，政治部分。含政务（作者说明，此非政治全面，乃行政事务也）。下面又分吏治、户籍、选举、自治（乡镇保甲组织）、军警、卫生、交涉、司法，财政（含税务、田赋、财务行政、金融钱币、公产公营）；第五，社会部分。含党会（政党群团和会社组织）；第六，文化部分。含教育、宗教、礼俗、方言、氏族、人物、艺文（提出了按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史地并附文征、丛谈的具体分类）。

康和声在《纂修衡山县志进行总例》^⑪中，还主张设“古籍古物志”和“杂志”。前者好理解；后者，作者这样解释：“凡记录无类可归者谓之‘杂’，可分纪闻、述异、摭谈、辨讹四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志书篇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湖南的地州（市）县两级先后经历了

两轮地方志书的编修。建国后较之民国以前历史上的修志，其中第一个特点就是改文化精英修志为“众手成志”，由政府主办，各行政行业管理部门承修，汇集了社会各方面的专家参与，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人才，这样就志书的资料性和科学性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远胜以往。由于志书最原始的资料都是出自于各个部门，所以在志书总成以后就难免留下明显的部门痕迹，包括篇目的设置。有的篇章设置从科学的归类来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但从部门管理的角度又不能不设，要把这些内容拆开归并到有关类下，又存在一个统计数字不能统一的问题。如工业、农业与乡镇企业，轻工与纺织、烟草、盐业等。第二个特点当属政治性，或者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我国长期实施的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百政千令皆出斯门，所以持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尤显突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具体活动，所以大的政策背景、大的活动主旨，都离不开各级党组织这一中枢指挥系统。志书反映的也正是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客观事实。

上述这两点是我们当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最大特点，前者是修志操作层面上的特点，后者是整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一）首轮志书的篇目结构

1958年6月，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着手《湖南省志》的编修工作，限于当时的条件，对市县两级志书的编修没有作出统一部署，但是也有少数县自觉进行了县志编修，湘乡县就是其中之一。参考《湖南省志》篇目，《湘乡县志》计划分为18篇，分别为地理、近百年大事记、人物、农业、水利、畜牧水产、林

业、工业、交通、贸易、财政、金融、粮食、文化、教育、卫生、宗教、杂记。篇目排除了党务、政务、群团、军事及公安司法诸多政治方面的内容，究其原因，根据当时的亲历者、在第一轮修志中任湘乡县志办主任的毛金玉解释“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敏感，难以把握，将党政军的史实写出来怕有碍核心机密。”^⑫我再一看当时的《湖南省志总目》也是如此，便估计当时这个观点是统一了认识的。毫无疑问，这是个篇目极不完整的设计。该志稿最后写成了76章117万字，用钢板蜡刻油印，一直没有出版。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给地方志工作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勃勃生机。1979年8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恢复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继续进行《湖南省志》的编纂工作。自80年代初开始，地县两级的志书编修也陆续开展起来。

1986年12月，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对于全国的两轮修志实际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胡讲话的要点一是“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二是评价旧志“各个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要求“新的地方志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三是“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政治化’的倾向”，要杜绝“一种宣传色彩”^⑬。从此以后，新编地方志应当是一本“严谨、科学、系统、朴实的资料性著述”的定性得到了方志界的广泛认同。

1985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二章第十条明确“志书篇目的确定和取舍,应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形式,更要有所创新增益。各篇目的内容应适当分工,前后照应,力避重叠,或简繁适当。篇目的排列,应体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层次名称可采用编(篇)章、节、目,也可采用其他形式,不必强求一律。”

对于志书的年代断线,《规定》明确“上限不作硬性的统一规定,下限一般情况可暂定断至1985年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之时,也可以断至该志稿脱稿之日。”《〈湖南省志〉编纂方案》规定上限“不作硬性的统一规定,一般始于1840年,但可因事而异地上溯至建置之始,事物发端。”1986年2月,时任省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的吴若虚在湖南省首届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编纂新方志,不是在旧志基础上的续修。因此,记述时间不能以本地区最后一届旧志下限为上限,原则上要贯通古今”^②。也就是说,这一轮修的是“通志”。

由于上下限的跨度较长,内容容纳较多,分工也较细,首轮县志多采用的是中小篇结构,大致为20—30篇。1995年出版的《湘潭县志》设36卷(篇),分别为概述、大事记、自然环境、人口、政党、代议权力行政政协机关、群团、军事、民政、公安司法、编制人事、城乡建设、经济结构、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水利、乡镇企业、工业建筑业、交通、邮电、商业、粮油、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经济综合管理、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文学艺术、报刊广播电视、文物图书档案、方言风俗宗

教、人物、文献辑存。内容非常全面,就是在“卷”这个层次上分得太细了一点,如“农业”就完全被“解散”了。1992年出的《华容县志》与《湘潭县志》大同小异,共分24编,其与湘潭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大“农业”作为1编,减少了“编”的数额。1995年出的《醴陵县志》将属于“社会”的民俗、方言、宗教都单独成篇,这样总数就达到了39篇(外加附录)。1993年出版的《沅陵县志》共分为22篇,它将一些内容适当合并,如第四篇“党派群团”、第五篇“人大、政府、政协”,控制了“篇”这个层次,志书总字数为92万字,笔者以为这是比较合理和恰当的。

首轮志书,湖南还搞了地区志和地级市志(市管县),多数地区是搞的综合志,也有的是搞的多卷集合(如长沙)。地区综合志的篇目分类同县志差不多,只不过是区域范围广一点而已,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二) 第二轮志书志书的篇目结构

湖南第二轮三级志书的编修始于1999年,由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文启动。第二轮志书的显著特点是“续修”,主要记述改革开放这20多年。湖南省志编委会对于志书记述断限要求很明确“上限为1978年,下限至2000年”。这个规定与中指组2007年11月颁发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大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要求基本一致。在实施过程中,多数市县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也有不少县是按照与首轮志书的下限时间来衔接的。上一轮县志下限,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居多。

本轮志书由于属于断代志,所记述的内容就相对可以详细一些。在篇目上,承袭上轮的构架较多,

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有这样一些地方:

1、加强了综合记述。

在一些主要的经济产业篇下设置“综述”对于加强该行业的宏观记述,使读者获得整个面上的信息,很有必要。如第二轮的《沅江市志》就分别在综合经济管理、农业、工业3篇的下面设置“综述”,《望城县志》则是在更多的篇下设置了“概述”,尽量记述综合的内容。有的虽然不是以“综述”的内容出现,但其内容体现了“综合”,如《华容县志》的农业篇下设置第二章“农业综合开发”就是如此。有的志书虽没有标题目,但以无题概述的形式反映了综合情况,也是可取的。也有一些志书相对“经济综述”篇设置了“政治综述”,笔者以为是个很好的尝试,但还是有些交叉问题不好解决,以不设为好。

2、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内容。

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第二轮志书的记述时间恰好与改革开放同步。在篇目安排上,不少志书都将“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综述”篇下列专章作专门记述。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流通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有的还将对外开放的内容也囊括在“经济综述”的门下,如《桃源县志》里“对外开放”一节中就包括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横向经济联合、招商引资、劳务输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不写‘开放’的改革不是一个完整的改革。也有将这些内容分散到各篇写的,但笔者以为,集中写比分散写效果好些。加强了对异军突起的民营经济记述,也是第二轮市县志的特点。《蓝山县

志》在“经济综述”篇之后，单设“民营经济”篇，设发展环境、个体与联户企业、私营企业、公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管理与经济效益5章；《岳阳市君山区志》则是在“经济综述”篇里专设“个体私营经济”一章，下设发展概况、优惠政策、经营特点3节。从避免内容过多交叉重复的角度考虑，笔者比较赞同君山区的做法。

3、突出记述了党政部门主导作用。

本轮志书由于记述时间短，就给每一个记述事物留下相对较多的空间。对于市县四大家，不少志书都采取了单独成篇的模式。特别是党委和政府，党委加强了“重大决策”的记述，突出党的宏观领导。从理论上讲，党委决策应包括政治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宏观经济举措、重大社会与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但由于志书“横分门类”的性质，有许多方面在其他篇章里还会细说，所以在党委决策这个层面上只能择其主要对一个地方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作提示性的记述，不作大幅度展开。《邵阳县志》将党委决策分作重大政治决策、重大经济决策和其他决策三大部分。政治决策里就包含了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县等内容。经济决策就有家庭联产承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等内容。在政府篇里，还有一个“施政纪要”，主要记述几届政府做的几件大事，这些大事主要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如《新邵县志》在政府篇里专列第三章“施政举要”列举了天荒绿化、资江大桥建设、大坪开发区建设、金三角市场建设、发展小城镇、抗洪救灾、电站建设等十余件带动全县发展的大事。有的修志人员总感觉党委的“决策”与政府的“施政”经常是

搅合在一起的，不好分。其实只要掌握一点，党委写大政方针，发展方向，大事拍板，政府写如何具体组织实施。党委重“面”，政府重“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无论是“面”还是“点”，都不能展开写得太过细，否则就“抢”了有关篇章的内容。人大和政协篇目安排，在事业这一块基本上都是按照其基本职能进行分类的为好。

4、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这一块的记述分量。

自然环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基础设施建设就标志着一个地方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不少志书（特别是城区志）加大了对这个方面记述的力度，并且安排到了显著的位置。《郴州市北湖区志》专设“基础设施”篇，将城区建设与管理、乡镇村建设、交通、电力、邮政通信等内容集中于此篇。该志还将“环境保护”列入第一篇“地理环境”之下，强调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重视。怀化市地方志办公室最新拿出的《怀化市志（1978—2010）篇目》讨论稿就设第三卷“生态环境建设”和第四卷城乡建设，都充分说明了对这两个方面的高度重视。

5、加大了对社会民生问题记述的比重。

传统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人物诗文字数往往超过全志的一半。以民国方志学家瞿宣颖的说法是“俗人不学，相沿以方志为地理之记，甚至以为题名颂德之书，揽胜抒情之册。兔园繆解，场屋劣文，摒勿寓目久矣。”^②评价虽过于辛辣，却也道出了一些实情。

建国后的首轮志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大大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份量，这本来也是一种现实的反映，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大的趋势下却无形中掩

盖了一种轻人文、淡民生、漠视个体的现象，第二轮志书在这个方面有所该进。有不少志书都设立了“社会”（狭义）或者叫“社会生活”“社会事务”专篇，将与民众密切相关的一些内容融为一篇。篇名可以探讨，做法值得肯定。如《宜章县志》设第22篇“社会”，含民族宗教、婚姻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设、人民（应为居民更妥）生活、民情习俗6章；《耒阳市志》在“社会生活”篇里专列“姓氏”一章，考其来源及分布。笔者以为这些编排均较为得体。

我们现在的“居民生活”一般都狭指经济生活，有的志书甚至狭到只有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数字，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居民生活除经济以外，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还有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内容。现在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都是写在“民政”的内容之下，当然这也是可以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有的志书放到了“政治综述”篇下设专章（如望城县志），这样的位置还是可以，但有的志书仅仅将其放到党委篇下的宣传章里作一般工作布置的一节，显然就有些摆“轻”了。

6、加重了对乡村两级现状的记述。

不少志书都将乡镇简列列为最后一篇，详细介绍每一个乡镇的区划历史演变和这20多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状况，较之首轮志书有很大的进步。首轮志书有的只介绍到区，乡（公社）只点了名，具体情况不详。第二轮志书还多在“城乡建设”篇里集中记述了建置镇建设、集镇建设、村庄建设、农房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等内容。

7、加大了对旅游资源、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记述。

湖南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英才辈出的省份，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的舞台上，无论哪个领域，都可以骄傲地说“无湘不成军”这个口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省委省政府打造“文化强省”的宏伟战略，文化市场的繁荣带来了旅游事业的兴旺。自然风光、名人景观、民俗风情、古文化遗址、抗战遗址、红色线路，我们是要有尽有。市县两级志书对这些颇具湖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都作了较大篇幅的记述，不少县志都列出了专门的篇章，已体现地方特色。计有《韶山市志》的“毛泽东纪念地”篇，《龙山县志》的“名镇里耶”篇，《芷江县志》的“和平文化”篇；《道县志》专列“特色文化”篇，下设周敦颐理学文化、何绍基书法艺术、玉蟾岩水稻陶器文化、鬼崽岭祭祀文化、红色文化5章，充分体现了该地的历史文化特色。还有的是设在有关篇的章节里，如《桃源县志》在旅游篇里专设“桃花源景区”一章；《醴陵市志》文化篇里专设“花炮文化”和“陶瓷文化”2节，《龙山县志》专列“民族”一篇，重点介绍土家族、苗族的族源、发展历史和习俗以及传统民间工艺品。还有在诸多志书中的旅游、文物等篇章里都反映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品牌。

五、结论

地方志书这一传承历史文化的传统载体发展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从地方志走向比较成型的民初到现在也是600多年了。建国后，我们先后历经了两轮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修志，我们的方志从体例上来说，应当是比较成熟的了。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新方志编修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佳品名作，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特别是第二轮志书，笔者的感觉最突出的不足是：其一，政治化的色彩愈来愈重，照抄公文的现象越来越多，连篇累牍，堆积成书，总纂舍不得下功夫。其二，社会变化已经日新月异，新产业、新行业、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新的人际关系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志书还是按照老的传统模式——完全依靠政府职能部门提供资料，这就势必有很大的局限性，许多丰富、生动的资料就会遗漏。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有理由要学学前人的治学精神，走出书斋，实地调查，多写出一些“考证”和“调查”出来。

地方志书作为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者，反映的只能是社会的现实。志书的篇目只是志书资料编排的一种形式，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没有一成不变的篇目，将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紧密结合，尽量站到历史发展制高点来俯瞰我们所走过道路，结合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发展尖端成果和方志体例来制定志书的篇目，决定志书的撰写内容，是日益发展的社会新形势对我们方志工作者的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才有出路。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08年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四章“内容”，实际上就将各级志书的主要篇目作了大致的界定。内容都是这些内容，至于如何科学地排列组合，孰先孰后，志书的纂修者都可以自主地发挥，但有两条必须把握：一是要认同多数人的认可模式，至少一个地级市要形成一个比较规范篇目蓝本。二是不能缺“要项”，一个地方不可缺少的事业如果在当地的志书里没有反映，那本志书文字再好也不算得佳品。

如何从方志发展的历史源流中吸取精华，借鉴前人在实践中摸索

出来的成功经验，为我们今天的修志事业服务，使我们的各级志书在质量上能够更上一层楼，这应当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事，也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 ①清程廷祚《修一统志议》节录。
- ②③瞿宣颖《志例丛话·杂例》。
- ④吕志毅《方志学史》第八章第五节。
- ⑤巴兆祥《方志学新论》第三章第二节。
- ⑥《章学诚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
- ⑦何孝积《章学诚参修〈常德府志〉》，载《湖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三期。
- ⑧涂春堂，应国斌主编《清嘉庆常德府志校注·凡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⑨⑩章学诚：《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章学诚遗书》卷十四。
- ⑪⑫陈国华、应国斌主编《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附论三》。
- ⑬李肖明：《湘学略》，民国35年刊。
- ⑭何孝积：《吴恭慎纂〈德化县志〉》，载《湖南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一期。
- ⑮⑯黎锦熙：《方志今议》之附录，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 ⑰⑱载于《湖南文献汇编》第二集，民国38年5月版。
- ⑲毛金玉：《志苑漫笔》，2009年6月版。
- ⑳《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当代中国地方志重要文献汇编》，1990年5月版。
- ㉑吴若虚：《关于编纂新方志的几个问题——在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当代湖南修志文件选编》，1991年版。
- ㉒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方志考稿序》，《民国丛书》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市县志工作指导处原处长）

第二轮志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杨帆

全国第二轮修志已全面展开,总体来看,质量还是较好,但是,也要看到,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志书质量上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离精品佳志有一定距离。为了使各级地方志编纂者了解已出版的二轮志书存在的问题,不重蹈覆辙,现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办法加以剖析,与同仁共同探讨,以利于编纂高质量志书。

一、第二轮志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 宏观布局问题

1. 关于篇目设置问题。篇目是志书的设计蓝图。高质量的地方志书,首先是篇目设置得好,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行业特色。但是,有些志书篇目设置不够好,表现为同类地方志书互相仿效设置篇目的多,因而出现篇目大同小异,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行业特色不够。尤其是改革开放已经30年,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有的地方民营企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但一些地方志书的篇目中却没有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一席之地,没有设置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篇目,更谈不上具体记述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内容。这是一些地方志书没有注意突出改革

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时代特色。具体表现为归属不当,章节之间“父子同名”,“五代同堂”。如某省《烟草志》中第二篇烟草工业第一章又为烟草工业。《社会科学志》第一篇哲学第四章外国哲学研究第一节外国哲学,都是典型的父子不分。有的志稿章下无节,逻辑有些混乱。

2. 关于记述资料上下限不到位问题。第二轮志书大部分是续志,主要是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段。编纂地方志书,要求完整记述断限内各方面的内容,上限时间、下限时间的资料都要到位。但是,有的地方志书没有做到,有的章、节、目的内容缺上限年份的资料,有的缺下限年份的资料。有的志书中的节、目,有资料就多记,资料少就少记;有的较重要的章、节、目,因缺资料只作简单记述,甚至有的节、目的内容只有一个年份的资料;相反,不太重要的章、节、目,却因有资料多作较多记述,占了很大的篇幅。如《湖南省志》二轮断限为1978~2002年,大部分省志都遵循这一年限,但有部分因为机构的变动、工作的特殊性,在职领导的权威等等诸多因素,改变这一时段,尤其是下限,有的到2005、2008、甚至有的延长到2010年,这样破坏了全书体例的统一,像这样的问题,在二轮续志中

普遍存在。

3. 关于地方志书的篇幅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求编纂第二轮地方志书要从严控制篇幅。第一轮地方志书是从历史的发端写起,篇幅长一些是必要的,而第二轮地方志书主要是记20年左右的事情,篇幅就应该从严控制。但有的第二轮地方志书篇幅还是太长,几乎与第一轮志书的篇幅相当。如《科技志》、《教育志》初审稿时均有100多万字,尤其《教育志》篇幅膨胀,部分内容几乎是第一轮复制,而有如普通教育则内容极少,通过审稿,经过补遗删减,最后减到90多万字。第二轮地方志书篇幅过长,主要原因是逐年罗列资料,什么内容都想记,没有认真综合记述,没有在反映变化、反映规律上下功夫。

4. 关于越界记述和通典不录问题。所谓地方志,顾名思义就是记述一定地域内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不属于本地域的内容不述,有的地方志书没有严格这样做,把一些国家领导人、一些全国的名人因到过本地参观而列入人物传记述。地方志书本来应该记本地各行业贯彻上级有关文件和国家的法规精神,主要实施情况而不是仅仅记载全国性的文件方针,这些都是典型的通典不录。

(二) 微观问题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一般课题,编号为:2012SZKT(Y)016。

1. 志稿内容问题。编纂地方志书,很重要一点是要千方百计避免记述内容这样的硬伤。但是,还是有一些志书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有的志书在概述、内容、大事记中,记述同一个数据、同一个事件,却前后不一样,有的数据前后差别很大。有的志书出现一些文表数字不一的问题,即同一个统计数据,在表中是一个数,在文字表述中又变成另一个数。如《民族志》表彰情况统计表先进集体分别为49人、211人、42人、48人、43人、46人、100人合计为636人(应为579),这也是明显的错误,属于硬伤。

(1) 漏记重要内容问题。编纂方志要求重要内容不能遗漏。但有些志书没有做到这一点,漏记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志书应当记述断限内工作概貌,包括情况、成绩、问题得失等等,也就是“怎么干”的问题,不应该重复其工作宗旨、职能、职责。更不能将文件代替内容。如有一部志书将逐年的文件名进行流水排列,空洞无物。

(2) 内容保密和敏感问题。编纂地方志书要求按照国家保密的有关规定,不能在国内外公开的内容不要写到志书中去。但是,有些地方志书在这方面注意不够,记述了一些属于保密的内容。如按有关保密规定,民兵预备役的总人数不能在地方志书中记,计划生育人流、结扎的数字不能在地方志书中记,但有的地方志书还是记了民兵预备役的总人数,记了计划生育人流的数字。又如关于国家对国际关系的一些规定地方志书是不能记

的。这都是因为对国家保密规定执行不严格的具体表现。记述敏感问题。编纂地方志书要把握好记述敏感的角度和记述方法,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违法犯罪问题等等,对涉及敏感问题的人员不要轻易点名。但是,有的志书没有注意这一点。如有的志书在记述有关少数民族风俗的内容时,把两个少数民族风俗作了比较记述,肯定了一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否定了另一个少数民族的习俗,这样使被否定其习俗的少数民族看后难以接受。地方志书在反映敏感问题时一定要严谨。如《宗教志》第三节宗教出版,宗教怎能出版,缺乏科学严谨,改为:第三节宗教出版物。邓小平南巡讲话,“南巡”是封建帝王巡查,不宜适用现在的社会主义,应改为南方讲话。

(3) 关于表格运用问题。地方志书的体例是述、记、志、传、图、表、录。表是其中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体裁。志书通过表格反映有关统计数据。志书使用表格应该是文后附表,即重要的内容先通过文字表述后,再附统计表加以全面反映时限内有关年份的统计数字。但有的志书没有严格按照志书体裁编制。在一些节、目中,往往以表代文,或者在表后无文字分析。有的表格的表题不规范、栏目设计缺乏要素。

(4) 关于时间概念和专有名词缩写问题。关于时间概念问题。编纂方志,对各项内容的记述要使用确定性的时间概念,要写明某年某月某日,或写到某年,或写到年代。但是,有的志书没有严格做到

这一点,其一是记述的一些内容只写事件,没有写明时间;其二是在记述一些内容时,习惯用模糊的概念,如用“最近”、“近几年”、“某某年以来”、“长期以来”“现在”、“目前”、“近来”等都被视为不合格志书体例的时间词汇。志书是真实历史的记载,没有确定性的时间概念,会使后人对一些历史事件难以作准确的判断。志书对一些专有名词的缩写略写要注意规范,但有些志书在这方面注意不够,经常出现专有名词随意缩写略写现象。例:“三化”、“三高”、“三乱”、“121工程”、“四优达标”、“三来一补”、“三自”等等。诸如此类的缩略语包括了特定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难以理解其含意。在行文中,如果非要使用缩略语的且在文中出现两次以上的,可在第一次出现时写明具体内容,后文再使用缩略语。

(5) 关于照片质量问题。编纂地方志书大都选择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入志,以反映地方特色、时代特色、专业特色,反映改革开放的成果。编纂方志要求入志的照片要有规范的文字说明,即文字说明要写时间、地点、事件、重要人物所在位置等。但是,有的志书在选择照片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有一部地方志书选一幅中央主要领导人视察的照片,该照片不够清晰,领导人的面貌难以辨认;有一部志书把中央领导人所在的位置写错了。有的地方志书不少照片文字说明只写事物的名称,没有写时间、地点,缺乏存史价值。

(6) 关于标点符号和数字规范问题。编纂地方志书要求做到语言准确、朴实、精练，句子力求做到“多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句子不宜太长，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但是，有的地方志书在这方面还是欠缺，有的语言不够精练，有的内容表述不够准确，有的句子太长。有的运用标点符号不够严，有的段落是逗号到底，应该断句的地方没有句号断句。

第一，标点符号的错误使用或不规范。①顿号的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序号时，应当用下脚圆点，而不是顿号。如“1.”“2.”，不能写作“1、”“2、”。间隔号的误用。“3.15”应当写作“3·15”。“五·四”中间的间隔号应当去掉。②冒号“：”与比号“：”的混用。1：9，应当写作1：9。③书名号《》的与引号“”的误用。书名号的使用仅限于精神产品，有的政策、通知用引号，其实应该为书引号。④连接号一字线与半字线的混淆。在连接地名或方位名词，表示起止或走向时，使用一字线“—”，而不应当使用破折号“——”或半字线“—”。⑤连接号半字线“-”与浪纹线“~”的混用。常用的连接线有一字线“-”、半字线“-”、浪纹线“~”3种。有些志书在同一部书中，在表示数值范围是有用“-”，有用“~”。在3种连接号中，当用于连接相关阿拉伯数字或代表数量的字母，表示数字范围时只能用“~”，而不能半字线或一字线。⑥引号的漏用。四水（湘、资、沅、澧），应为“四

水”。

第二，数字书写的不规范。值得注意的几种情况：数字不能断行书写，“四五个月”不能写成“四、五个月”；汉字与阿拉伯字混搭，“二十世纪50年代”，改为20世纪50年代。

第三，量值单位使用的不规范。1~9%应当写为1%~9%。涉及农业土地面积单位，按照规范应当使用“公顷”，而有的志书在同一章节中“亩”和“公顷”同时使用没有统一。

(7) 关于文字校对问题。编纂志书，要求三校以上，千方百计减少文字差错。志书的文字校对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校对的疏忽，可能会使前期审查、编辑的成果付诸东流，甚至出现重大差错。主要是校文字、版面、法定计量单位。有一部地方志书，由于校对不严格，出现一些差错。某志书将书楣的标题弄错，此章书楣弄成彼章书楣，闹笑话。又如把“汨罗”误写为“汨罗”，“援建”误写为“援建”“漫延”误写“蔓延”，“撤销”误写“撤消”，“株洲”误写“株州”等等。有一部志书，本来内容编得较好，但就是因为校对不严格，数字差错太多，结果只能在志书发行时附上一个很长的勘误表，读者看了很不满意。

二、第二轮志书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对策

第二轮志书，虽然避免首轮“边学边干”的先天不足，在科学性、严谨性、可操作性等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上述存在的主要问

题，必须刻不容缓解决，否则难以修成精品佳志。在此笔者，从两个方面陈述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一) 必须科学合理布局志书宏观

1. 要注意篇目设置的合理性。篇目设置要科学、系统、合理。要在“横、全、当、准、整”5个字上做文章。“横”即横分门类。看一看谋篇章的标准是否科学，分类是否合理？一部志书是一个有机整体，志书的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分志的篇目结构从局部看是合理了，但从志书的全局看则不一定合理。因此，部分必须服从整体，不能把分志搞成小而全的部门志。同时，还要看各个门类的排列是否坚持了“有序性”、“等级性”的原则。世界上各种现象、事件、过程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志书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它的篇章节目的设置亦应遵守这个原则，做到前后排列，井然有序；上下之间，层层相辖；平行等级，平起平坐；内涵外延，不相互重叠。只是为了突出某一事物时，才能采用“前置法”或提高其等级的做法。

“全”即门类齐全。志书是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纵要看出一地的发展轨迹，横要看出一地各项事业。因此，志书中大的门类不能缺少，即横不缺要项。但我们并不一味求“全”，要求每部志书所记述的内容都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但要求的是“不缺要项”。“当”即归属得当。方志不等于部门志的简单相加，要通过科学分类，兼顾现行的管理体制来统领归属。坚持划分标准统一，

子项之间互不相容，这样才能做到避免交叉和重复。“准”即标题要准，一般为准确、简短、朴实、醒目8个字。“整”即注重于从宏观上解决横分门类所带来的事物分割，缺乏有机联系和整体性的问题。因此，志书除了着力编写好志书的概述和大事记外，还要加强各篇篇首的无题小序，以增强横向沟通和纵向记述。

2. 注意一二轮志书的衔接。第二轮志书上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记述上就会与第一轮修志在时间内容上有些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总的原则是，不能照搬照抄上轮的志书内容，而要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全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立场上，统筹考虑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整个历程，统筹谋划整部书的篇章结构及其章节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于第一轮重复的部分进行筛选和取舍，与第一轮志书下限后的内容形成有机和谐的整体。在二轮志书中，概述可以在其开始部分用精练的文字简述历史，主体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如果需要追溯的内容比较多，可以设历史纪要篇，专门记述。大事记篇，严格限制在上下限时间内，即开端是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如果出版时间拖得较长，下限应当适当延长。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矿产资源、建制沿革、名胜古迹、民俗民风等基本内容长期变化不大的篇目，在进一步加工整理之后继续采用。其他篇目，著述性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追溯历史，而记述性内容则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1月以来的。附录部分和照片部分，也是上下限时间内的内容；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照片尽量不登，必须刊登的要报有关部门审批。具体记述时，应在“增改”上做文章。“增”，即增记前志应记而未记、补前志应详而未详的内容。“改”即改写上轮志书记述不全、不妥的部分。

3. 注意控制篇幅。历史上，志书有详志，也有简志。最简的一部县志只有五六千字。无论简与否，志书中的资料必须是有价值的。二轮志书年限不长，但篇幅在不断增加，所以必须加以控制。一个地方，其它任何书籍都没有志书那样门类齐全。记述完备这就自然碰到一个永远的矛盾：想记得齐备，却有篇幅限制。如果资料不翔实、不齐全，不和志书要求，用处也不大；如果不加限制，志书篇幅就会无限膨胀。因此，志书中的“翔实”、“齐备”只能是相对的，志书的记事注定是有放有收、详略适度的。过简虽不行，过于详细则汗牛充栋，记不胜记。这里重要的是“辨体”，就是各种志书要有各自不同的、明晰的记述对象。本级记述对象的情况基本记清了，它的记述任务就完成了。记述的方法一般是“基本发展脉络+典型、特色实例”。如果不断地“追”上去或“沉”下来，过多地、超额地去记比自己层次高的记述对象，或者比自己层次低的记述对象，其篇幅必然会失控。在二轮志书中，不少志书都设有专记、特记、附记、附录、杂记等。这些记述形式设置的恰当，定能为志书增光添彩，但如果设置过滥，将会大大增加志书的篇幅。所以设置这些门类时，对入志内容还得“抓大放小”、“抓特色弃一般”。现在第二轮志书篇幅过大，与这类资料附录过多不无关联。有些好东西不一定非要入志，

可以编纂其它的资料予以保存。

(二) 必须严格把握志书微观

1. 认真细致地审读志稿。审读志稿的任务简言之，就是审稿者为减少或消灭志稿中的差错，使志稿符合国家出版的要求，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地方志书编纂的常规及志书出版时的凡例说明，对送审的部分或全部志稿进行审查与评议，并作出正确的评价。其主要措施是：

第一，审核史实。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千秋明镜和信史。要让其真正发挥“鉴古知今，信今传古”的作用，就必须确保资料准确无误。特别是最后一稿的修改，要严格过“筛子”，力争把一切疏漏和差错减少到最低程度。具体做法是：“六核查”、“六对照”“八不放过”。“六核查”，即入志的档案、统计、资料、文献、口述、图片都要核查；“六对照”，即志稿与原始资料对照，叙事与背景资料对照，部门与统计资料对照，概述大事记与专记对照，专志与专志之间对照，文字记述与图表对照；“八不放过”，即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数字、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称谓、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放过。多数志稿是匆忙了事赶写出来的，对资料没有来得及核实，到了最后关头，千万大意不得，一定要严肃认真，不厌其烦，不惜人力物力，把资料核实准确。否则，印成文字，影响了志书的科学性、权威性。

第二，审查文风。志书编写特点较多，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秉笔直书，不加修饰，客观准确，言简意赅。不得使用“大约”、“左右”等模棱两可的言词和“辉煌”、“巨大”等形容词，以及

“很”、“扎实”、“切实”、“认真”等副词，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二是就事论事，是什么就记什么，不得加以评论与分析；只记事实本身，不像教科书那样作专业知识介绍，不说与事实有间接作用的全国或全省共有的方针政策性背景资料等。审稿者应详细审查。这是审稿工作量最大的方面。同时，应审查图、表使用与制作是否规范。

2. 审查志书是否符合编纂常规。严格遵守出版和志书质量标准。志书具有与其他著作不同的编纂规则和记述特点，即为记述志书内容服务的各种形式。

严格遵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新志书文体，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应严谨、朴实、简洁。它要求新方志，第一，要使用规范的标准语。这种标准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为此，努力使志书所

用的语言像编写工具书、教科书那样做到完全标准化，以达到全国通用之目的。使用标准语，还要防止语言方言化，文白夹杂，并使语句遵守现代汉语语法规则和逻辑。第二，文风要严谨。这就求我们，对于那些类项相同、内容相近的资料，该合并的合并。该删削的删削；对于那些累赘的叙述、空乏的议论、过分的渲染、代表性、可比性不强的图表，纯属论证性和技术性的定义说明，应该删掉。第三，文字要朴实、简洁。朴实就是朴素、实在，不花俏，也不粗俗。东汉王充说：“文贵约而诣通，言尚省而趋明”。如果约而不通、省而不明，也是志书行文之大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提出修志“四要”：即“言、简、核、雅”。因此，在把好文字关时，一定要做最后的一次咬文嚼字。对那些可有可无的修饰词、形容词、重复的语、句、字、词，甚至标点符号，都要

坚决去掉，一句话，要惜墨如金。必须熟悉与编纂工作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如，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GB/T14706-93《校对符号及其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方法》，而有关编校质量差错认定则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委员会制定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

质量是地方志书的生命。编纂方志一定要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志书承编单位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编纂第二轮志书的进度，决不能为了加快进度而降低编纂质量。各级方志编纂工作者要把编纂地方志书作为一项重要系统工程。严格各个环节的编纂管理，以保证志书的编纂质量。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省志编篡处副处长）

志坛文艺

诗五首

陈英涛

忆65年冬陪周世钊厅长视察湖区教育（五首其二）

寒冬腊月月初晴，双桨轻摇访洞庭。
走到渔村樵户里，王家小学访师生。^①

^①王家河小学，是湘阴县一所民办渔樵子弟小学，设备简陋，是周厅长要看的重点之一，后来还走访了栗塘、荷塘、危家洼、青潭等渔樵子弟学校及白马寺完小等。

癸巳初夏湘阴行（五首其三）

游南泉山

南泉八景誉三湘，湖上霞披潋滟光。
吊古碑前思圣哲，弦歌桥畔舞娇娘。

谒相国祠和左宗棠展览馆

（一）

大义担当亡难时，安帮荡寇率湘师。
挥戈跃马驱俄法，一口漆棺万国殊。

（二）

运筹帷幄卫新疆，武略文韬大帜张。
史册千秋香更著，人人崇拜左宗棠。

观湘江垂钓

江堤漫步看垂纶，绿柳深丛草隐身。
探问游人高举手，恐惊水里小鱼群。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作者系《汨罗市教育志》原主编，通讯：汨罗市教育局 邮编：414400）

光绪《湖南通志·列女传》考论^{*}

●姚兮廷

中国地方志起源很早,至宋代初步定型。保留至今的地方志,主要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尤以清代为多。湖南现存建国前出版的地方志400多种,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清代所修。清初,湖南两次纂修省志,仍仿前朝合湖北、湖南为一志,即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因为书局开于武昌,未免详近而略远。故湖南事迹,未能赅备。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布政使杨廷璋创修《湖南通志》,湖南才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省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二修《湖南通志》(巴哈布、翁元沂等修)。作为湖南省的第三部通志,光绪《湖南通志》,先后由曾国荃、郭嵩焘和李元度担任总纂,从同治七年(1868)开始纂修,至光绪十一年(1885)修成刊刻,前后耗时18年之久。该志体例谨严,资料宏富,上溯自秦汉以前传说,下迄同光史事,凡关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民风、习俗等史事的源流沿革、发生、发展、无不博采文献,考证典籍,拾遗补缺,订正讹讹,堪称湖南的百科全书。梁启超评论说“则可称者略如下……光绪《山西通志》、光绪《湖南通志》……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还赞其“忠实于所事”^①。

地方志长期以来被广泛用以重建和解释社会历史进程。历史地理

学家谭其骧就成功利用湖南诸府、州、县志中的五种,写出了《湖南人由来考》,厘清了出自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②《湖南通志》在《人物志》中设有列女一目,内容从秦汉时期到清朝,涵盖了历朝历代湖南的节烈妇女,然“朝旨旌表,敕建专坊亦不过令其姓名常存不没而已。而能力建坊之家不可多得……贞孝节烈妇女奉旌旨者数万名,哀集不过二十六卷。”^③国家的旌表政策推动了列女风潮在整个社会的蔓延,名垂青史的列女数量上尚有可数,但湮没无闻的更是不计其数。可见,列女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本文试图对列女传中的列女事例进行具体分析,归纳整理出湖南列女种类、明志保节的方式、以及列女现象的主客体因素,并对其进行形象的分析。列女是当时的模范妇女,通过分析论证这些模范妇女可看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定位,从而推断出当时湖南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社会主流意识的认知程度,以及列女节烈行为所产生的效应。

一、编纂目的

《湖南通志·列女传》的编纂目的,“而使通省之毅魄贞魂,编联荟萃,各郡邑之幽光潜德,辗转宣扬,返诸当年饮冰茹蘖之苦心。”^④首篇便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其政治功利取向和现实价值指向,编写《湖南通志·列女传》,在人物

志目下并列《列女》,但其目的不仅仅是使“毅魄贞魂”名垂青史,更多的还是一种宣扬,一种“典范”的榜样效应,给当时的妇女在思想上树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楷模的光辉形象。编写《列女传》被作为一种宣传方式,不断地让理想的典范成为规范。如“李乐培妻彭氏早寡,子道瑜妻萧氏,孙贤浩妻胡氏,皆少寡。一门三节。”^⑤“毅魄贞魂”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楷模效应”,于是更多的女性纷纷投入到这份为国家和社会所赞扬及津津乐道的历史史册之中,青史留名,“是大有功于名教也。”^⑥

“臣之死忠,妇之守节,此宇宙之杀机,而乾坤之秋气也……臣忠妇节,凛然不可犯……然而一阴一阳,循环倚伏……”^⑦《湖南通志·列女传》以阴阳、乾坤、刚柔、内外等一类概念推论于男女、夫妻,其目的是为了证明男子社会地位高于女子是天经地义的,从而为歧视妇女的封建道德制造理论根据。西汉武帝时,经学家董仲舒依阴阳五行之说而区分性别属性,确立“天一阳一男一尊、地一阴一女一卑(夫一阳、妇一阴)”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此为基础,又建构起一套完整的以夫妇、父子、君臣之尊卑关系为网络的国家权力机制。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说:“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调查后,我们发现,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

^{*}本文系湖南省地方志研究与传播中心立项资助一般课题,编号为:2012SZKT(Y)017。

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经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人。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而且它往往比任何的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严酷，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④为了强化内部殖民，《湖南通志·列女传》便应运而生，“以征文献，以章风化”^⑤。

二、编纂类型

根据《湖南通志·列女传》的首章：“探访贞孝节烈妇女，旌表事例开报章程”^⑥，我们已知它是从贞、孝、节、烈等传统儒家思想方面，记载和描写湖南女性人物的。

“贞。女在母家守贞者曰贞女。女已许字未嫁，而夫死，女过夫家守贞者曰贞妇。”^⑦《湖南通志·列女传》将“贞”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许人未嫁人在家守贞的，称为贞女。如“庆阳府推官李志海女成姑，许字某氏子，未嫁，某氏子夭，父亦随卒。女以弱弟文政无倚，守贞，抚之成立。”^⑧“张氏女存英，孝养父母，终身不字。”^⑨一种已许配人家，而未正式嫁人，在夫家守贞的。如“卢氏女，许字谢氏。谢子卒，女随母至谢家恸哭。抚从子以延嗣。守贞数十年，事尊章，无违礼。”^⑩贞女守节现象的出现和增多，是贞节观念泛滥的直接后果，是贞节观念宗教化的必然结局。

“孝。女家无男子，女自誓在家守贞，奉养父母终老者曰孝女。出嫁孝养舅姑，代替危难者，妇代夫危难者均曰孝妇。夫死守节而孝养舅姑抚孤成家者，抑或无子

而守节不改，终养舅姑者，均曰节孝。凡节，未有不孝子者也。”^⑪奉养父母终老的如“甘氏女，年十七，父宗训歿，孝养寡母以贞终。”^⑫妇代夫危难的如“常崇孔妻赵氏……执崇孔欲断其左手，赵请代，遂断手以死。”^⑬由传世《仪礼》“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⑭所界定的“三从”思想是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同时，她们也受制于作为父权延伸物的母权。所以这些列女的“孝”在于至孝至贞，舍性命以守护父母、公婆、夫君。死亡在这些孝女和孝妇身上不仅体现着人格上的至刚至烈和行为上的悲壮之美，更体现着父权制社会中女儿对父亲，妻子对丈夫，女人对整个家族的单向度奉献和无条件牺牲。她们被要求具备绝对的孝行和对家庭的服从。最直接而彻底的表现形式便是死亡。死亡以其崇高性和悲剧性突出了“孝”，实际上是加强了“孝”背后所体现的父权、夫权的绝对合理性和无可动摇性。

“节。不论妻妾，但年在三十以前，夫死而守节至五十岁者，或年未五十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者，均曰节孝。”^⑮节孝，如“胡大华妻李氏早寡，抚二子成立，守节四十七年。”^⑯“廪生陈璞妻洪氏，夫死无子，守贞七十年。”^⑰《湖南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贞孝节烈四种类型的女性。其中节女占了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不难看出，其编者推崇的是带有宗法封建式的伦理道德，地方志中的节妇，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践行着这种封建纲常式腐朽的名教。当然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女性本身所具有的

高尚的道德情操。

“烈。夫死以身殉夫者，曰烈妇。遭盗贼强暴而捐躯殉难者，妇曰烈妇，女曰烈女。力不能拒羞愤即时自尽者亦合。”^⑱烈妇，分为两种：其一，不畏强暴，不屈受辱，为保持节操而甘愿牺牲生命的已婚女子。如“李高器妻胡氏，夫外出，族人挟刃欲污之，不从，被刺死。”^⑲其二，夫死，以身殉夫的女子。如“滕作贤妻杨氏，作贤御苗，被焚死，杨焚香更衣，自经以殉。”^⑳“生员武凤鸣妻刘氏，以夫被执，投岩死。”^㉑烈女在生死关头悲壮地死去，以保持自己的贞节。投水、悬梁、跳崖、自刺、绝食的悲剧在漫长的文明史上不断上演。沉重的文化积淀和千年的贞洁观念是她们慷慨赴死的内因，国破家亡侮辱加身将她们逼到了绝境，于是，以死抗争成为她们最后的选择。侮辱加身，烈妇烈女选择的是以生命捍卫灵魂；悲剧降临，烈妇烈女决定的是以意志铸造精神。当然这些自杀殉夫的人中，也不能排除因生前夫妻感情笃厚、夫死而殉情的情况。

三、历史演变

早在《周易》中就有“妇女贞节，从一而终”的记述，《礼记》也有“一女不更二夫”的贞烈理论。《湖南通志·列女传》中记载最早最有名的烈女是秦朝澧州的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范殖妻孟姜，始皇时殖赴长城役，姜于州之嘉山筑台以望。久不归，往寻之，则殖已死。姜沿城痛哭，城为之崩。”^㉒（据历史学家顾颉刚等学者考证，两千多年来，孟姜女的故事流传于从东北平原的辽宁到西南边陲的云

南等近20个省市。)《湖南通志·列女传》中记载最早的孝烈女是秦朝湘阴县的罗氏女,“求父尸,弗获,赴水死”,她在“宋元丰间,封为孝烈妃。”^⑧

女性既是排除于象征性社会秩序之外的,同时又是内在于象征性社会秩序之中的一种游离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贞孝节烈是湘女入《湖南通志·列女传》的标准,但在早期关于列女的记载中,仍有一些非因贞孝节烈入传的特例。例如一些有政治识见的妇女。“李衡妻习氏。建兴中,衡守丹阳,琅琊王休在镇。衡数以法绳之。习每谏不听。休求徙会稽,避焉。后休立,衡惧,欲奔魏,习曰:‘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自无礼而复逆,自猜嫌逆逃求活。何面见国中人呼?琅琊素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怨仇守法吏,可诣狱,表前失,求罪。’衡从之,诏遣还郡。”^⑨“周行逢妻严氏。行逢,故武陵农家子,性勇果敢于杀戮。严谏曰:‘人情有善恶,安得一概杀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妇人何知!’行逢既为帅,严给曰:‘家田佃户,以公贵,颇不力农,多恃势以侵民。请往视之。’往视之,至则营居以老,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见之,曰:‘吾贵矣。夫人何自苦耶?’严曰:‘公思做户长时乎?民租后时,常苦鞭朴,今贵矣,宜宜先期以率众,安得遂忘陇亩间乎?’行逢强邀之,以群妾拥升舆,卒无留意。因曰:‘公用法太严而失人心。所不欲留者,一旦祸起,田野间易为逃死尔。’行逢为少损。”^⑩以习氏、严氏为代表的湘女,能言善辩、务实开

放、机智多谋,凡此种种,反映出湘女身上普遍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种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使她们的整体形象得到提升,也是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在弱肉强食、斗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湘女智勇双全,辩才无碍,见识作为也远在许多男子之上。古代的妇女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当她们介入政治生活时,却对夫君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仁智和辩通属于才华,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最初得以入志的女性,并不是唯贞孝节烈是论。究其原因,这些湘女与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后代女性比较起来,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这在湖南表现得最为明显。

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妇女贞烈观进一步被强化,程颐(1033—1107)主张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成为规范妇女“人伦之大,风华之美”的最高标准。“列女”慢慢演变成“烈女”。但在述其贞孝节烈事迹时,也述其才华。如南宋末年,“韩氏女,字希孟,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读书。开庆元年,元兵至岳阳,女年有十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练裙带,中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做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⑪无独有偶,与其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还有“许君宝妻,同韩氏女,被执至杭州。主者数欲犯之,辄以计脱主者,疆焉告曰:‘俟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许诺,乃焚香再拜。题词壁

上,投池而死。词曰:‘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余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釜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韩希孟和徐君宝妻,都是被元军掳掠、不屈而死的女子,按这个标准,她们一个是烈女,一个是烈妇。但她们闻名于世不是她们的刚烈,而是因为她们的聪颖和才情,一首裙带诗,一首绝命词,悲婉激切,辞义壮烈,寥寥数语,写尽国仇家恨,每每读之让人难忍泪流。

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元代统治者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书院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但禁锢妇女的理学宣传,并未完全深入人心。元朝直到大德八年才对贞节妇女的旌表程序和条件作了初步的规定:“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著明者……申呈省部,以凭旌表。”^⑫

明朝建立以后,旌表节烈逐渐制度化,并已纳入治国之策。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就下诏:“凡孝子顺妇,义夫节妇,志行卓著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⑬明仁宗的妃子更是以身作则,践行节烈。“谭妃,浙江道御史福女,永乐初选为太子妃,明年太子即位,是为仁宗。其年八月,帝崩,妃自

缙，敕封为昭荣恭禧顺妃。”^①明末，《列女传》上记载了一位贞女兼才女，“侍郎郭都贤女子，字黔国公沐天波之子。明亡，沐子亡命，女誓不字，尝拆‘驛梅驚別意，柳暗傷情’十字作诗。其拆柳字诗云：‘木叶山花向晚幽，夕阳归雁断南楼。耳边不接云南信，柳锁寒烟一树愁。’后为尼，结庵浮邱山下，年八十有。”^②她作诗明志，表明自己的专贞。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女子在文学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与之前姓名亡佚的女子不同，郭氏女有名字，郭纯贞，字梅节，不仅诗文名世，绘画亦是了得，被誉为“秀而雄”，当时在湖南名声很大。据旧《益阳县志》记载：“皮藏之者，珍如拱璧”。她

善画山水人物，曾绘出秋景十幅略题以诗。遗憾的是《湖南通志·列女传》中对此竟只字未提。谭妃、郭氏女，都是从官宦阶层出身的闺秀淑女，尤其是谭妃，贵为皇妃，虽然入传，然而，她们却连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被收录，更遑论僻壤穷乡的村姑农妇，往往一笔带过。女性称谓语醒目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男权背景的宗法制度，以之为线索，我们就不难窥探出称谓语中体现的古代婚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到了清代，统治者则将朱熹奉为“十哲”之一人，大成殿配祀，并下令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明、清两朝，程朱理学被推向极端，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妇女节烈风气。《湖南通

志·列女传》所载湘女，大部分是明、清两朝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湖南通志·列女传》其实就是一部古代湘女的血泪史，可悲可叹，也可歌可泣。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2004.

②陈其泰:《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湖南通志》,卷二百十二,列女,光绪十一年课本.

④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杨天宇,仪礼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⑥元典章[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

⑦《明会典》,卷七九,《族表》.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省志处干部)

志苑视窗

郴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评谈地方志工作

【本刊讯】2013年4月24日上午，郴州市政府召开全市依法行政、民生100工程、地方志编纂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北湖、苏仙两区常务副区长，法制办主任，为民办实事考核办主任，史志办主任，市直和中省驻郴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办公室主任在主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常务副县长、法制办主任、为民办实事考核办主任、史志办主任和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和办公室主任在各县市分会场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评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对于地方志工作，李评强调指出：

近年来，我市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全面启动第二轮志书的编修，加强修志用志工作，服务地方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市志编修方面，128家承编单位完成了送审稿，大多数已进入分纂阶段。县(市、区)第二轮，渗透全面完成，取得优秀成绩。北湖区等5个县(市、区)的志书被评为全省优秀志书，

获奖数量列全省首位。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不断进步，从内容到形式更趋成熟，质量稳步提高，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好评。方志理论研究得到加强，修志工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市志工作为郴州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市委、市政府对修志工作历来是重视的。始终把修志工作作为政府的政治责任、历史使命和重要职责。今年是郴州市志编纂攻坚克难的一年，市志修编和部门修志工作要真抓实干，奋发有为。这里，着重对第二轮修志提几点要求：一是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地方志具有“资治、育人、存史、服务”的功能，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法律法规赋予的重大任务。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落实好“一纳入、五到位”的总要求。当前我市第二轮修志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进度不一。极少数单位历经六年，仍然没有很

好地动起来，影响了全市的进度。因此，抓这项工作，首先要抓领导。这困难那困难，只要领导重视就不难。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很好地研究一次，再动员、再部署，有的放矢解决问题。二是措施要进一步落实。修志是一项大型文化系统工程，既要抓好合唱，又要练好个唱。第二轮市志的内容框架已经确定，任务已经明确，篇、章、节已分解到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要有专门的机构、队伍和经费，实行专人负责、专家修志、专项管理，突击六个月，力争拿出高质量的分纂稿。三是督查要进一步加强。要推进方志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坚持依法修志。从实际出发，建立督查督办通报制，抓重点、破难点，推动全面平衡发展。市地方志办公室要切实担负起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职能，打基础、抓管理、强队伍，修出精品名志，推动事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

(郴县志处)

精心修志 把“乡镇企业”载入史册

● 湖南省乡镇企业局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别是为农村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邓小平同志曾赞扬：“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在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也指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湖南乡镇企业是全国发展较快、质量较高、效益较好的省市之一。我们是第一个成立乡镇企业管理机构的省份，第一个由省委主要领导担任乡镇企业局长的省份，第一个出台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政策的省份。至1997年，在全省国民经济的大布局里，湖南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既以飨读者阅读收藏之心，更是全省志书建设、文化建设的大事。按照省地方志编委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湖南省第二届三级志书编纂工作的意见》精神和第二轮《湖南省志》编纂方案要求，我局于2010年4月启动《湖南省志（1978~2002）·乡镇企业志》的编纂工作，克服了2004年机构改革以后内设机构缩减、人员变动大、史料缺乏等困难，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编修出45万字志稿，并于2013年1月通过专家评审会评审，我们的做法是：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把编志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

2010年，我局肖彬局长提出：

“要把志书编纂工作作为机关文化建设的大事，举全局之力，努力做好。”局党组把志书编纂工作与机关文明创建、日常工作同部署、同开展、同检查，每个季度调度一次进展情况，加强领导和保障，确保了编志工作的顺利进行。启动志书编纂后，我局立即按计划开展工作，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志编纂工作会议，布置任务，广泛发动、征集资料。机关各处室、局属单位，或献言献策，或积极提供服务体系、行业统计报表、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资料，紧密配合编志工作，上上下下真正做到了把志书编纂工作作为机关文化建设的大事来抓，纳入日常工作日程，整体有序推进。为确保搞好编志工作，我局还多次请省地方志编委会多名专家指导工作，特别是省志编纂处的领导和同志们，在乡镇企业志编纂工作启动后，从志书框架制定、征集资料、试写到召开专家评审会等几个关键环节都给予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

二、加强组织领导，为志书编纂做好各种保障

为了抓好志书编纂工作，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主任、分管副局长为常务副主任，各处室、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编委会，统筹协调志书编纂工作的人员、场地、经费等重要问题。成立了编纂办公室，采取专兼结合的办法，抽调了三名在职干部和两名退休干部参与志书编纂。2010年4月，我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省乡镇企业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在全省乡镇企业

系统作了动员部署。局党组从日常工作经费中挤出5万元用于编志前期工作。局里没有多余的办公室，我们便每年拿出3万多元在省政府机关二院租赁了一套房子用于编志办办公，配备了办公设施。参与编志的同志尽职尽责，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特别是编志办具体负责的退休干部宋莹同志，既担负志书的总纂，又负责部分篇章的编写。三年来，她坚持每天步行3公里到局里上班，工作热情始终不减，即使在雪天路滑摔伤头部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带伤工作，以忘我的精神完成了15万多字的编写任务和志书总纂工作。张春常同志，由于电脑基础不好，他硬是一笔一划手写出20多万字的初稿，扎扎实实完成了自己负责的编纂任务。

三、从细节抓起，夯实各项工作基础

编志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我们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准备工作做扎实。一是抓好队伍培训。先后三次请省地方志的领导给局编委会全体成员上课，重点学习《地方志工作条例》、《湖南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暂行）》和《湖南省志质量标准（暂行）》等一系列志书编纂的专业性规范及要求。编印了有关编志的文件资料，编志人员人手一册，经常学习，认真掌握志书体例、行文、质量标准。二是认真收集资料。除了局机关档案资料外，还到省档案馆查阅、复印了大量历史资料。副局长、编委副主任曹剑平亲自带领志

办人员先后走访了省内40多位老领导、乡镇企业家，收集到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材料，进一步充实了志书实例。同时，我们还向浙江、江苏等省乡镇企业局征询编志材料，了解兄弟省市有关乡镇企业发展的情况，寻找有价值的材料，各市州乡镇企业局也为我们提供了典型企业、领导视察等一些珍贵资料 and 照片。三是科学构思篇章。俗话说纲举目张，篇章定得科学才能确保志书有血有肉和编纂质量。为此，我们先后学习了浙江、山东、黑龙江、山西和安徽等省乡镇企业志，以及常德、郴州等地市县乡镇企业志的编写经验，并采访了部分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前后历时8个月才最终确定志书篇章节目框架。

四、群策群力，确保编纂进度和质量

我们把编志工作作为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发挥大家的集体智慧，确保编纂进度和质量。面对编志办老同志比较熟悉历史情况，但写作和电脑熟练程度不高，年轻同志则相反的现状。我们采取一帮一的工作模式，即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帮助指导一名经验欠佳的年轻同志，使其能迅速掌握门径；对有的老同志电脑能力欠佳，撰写只能靠手稿的情况，编志办积极联络固定的打字员为其服务，使其打印成稿和修改完善不成为短板；对资料补充的问题，编志办能发挥个人所长合理分工，有电脑优势的同志上网查找，对单位历史熟悉的同志查找历史文献，这样明显提高了整体工作效率。对有的人员身体不佳以及工作冲突不能完成交付任务的状况，志书编委会和编志办公室及时作出任务调整，兼顾好工作与编志工作。编志办还每周召开一次工作

例会，三年来共召开150多次，每次都大家都畅所欲言，踊跃发表自己观点，在探讨中把问题顺利解决。在总纂修订阶段，我们又充分听取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仔细核对事件前后表述是否一致，对撰写时留下的疑点逐一认真核实，特别是数字严格把关，出处不详或非正式文献的数字概不引用，对错字、漏字认真校对，对称谓提法前后反复比较语境，使用贴切的词句，通过细致耐心的工作，校对、修改、更正了不少有误的地方并形成了评审版。

三年来，正是有了局机关干部和编志人员这种迎难而上、相互帮衬、精雕细琢的精神，确保了乡镇企业志编写的进度和质量。今年上半年将完成了省委、省政府交办的重要任务。借此机会再次感谢省地方志编委的专家以及同志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志坛文艺

诗二首

● 吴运申

保卫钓鱼群岛

钓岛中华古国基，大明筹海有图依。
欲成海战倭奴梦，漠视渔幡汉字旗。
盛会开罗回故主，狼心日本作婴啼。
岂容象入贪蛇口，拍死苍蝇未足奇。

农夫乐

米自田间产，瓜看架上鲜。
满塘鱼与藕，一岭麦和棉。
埭内禽方嫩，栏中肉最甜。
殷勤无税课，举酒笑神仙。

（作者住址：汨罗市城西北路182号
邮编：414400）

端阳令·孝

● 任健鏊

传承孝道，
清淳风俗，
吾侪当作先锋。
苍首途经，
青头呐喊，
九州众志成城。

接力频仍，
束薪燃炬，
方显炎黄大族神。
齐声唤，
孝忠仁义，
做回中国人。

①岁在癸巳初夏，再填国瑞新创词牌《端阳令》，以贺中华孝文化学会2013年年会胜利召开。

（作者系本刊原编辑）

精心编纂 确保质量 全力做好《城乡建设志》修编工作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志办

《湖南省志（1978～2002）·城乡建设志》编修工作自2008年启动以来，在我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厅机关各处室（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按照“编委会定篇目，机关各处室撰稿，编志办编纂，专家审阅，厅领导把关”的程序，历时四年，完成八审，于2012年底定稿。全书共分九篇，64万字。现将有关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周密部署

2008年5月，第二轮《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由相关厅领导以及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和各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领导和指导第二轮《城乡建设志》编纂工作。编委会下设编志办负责具体事务。机构成立后，立即以湘建[2008]194号文件向全省建设系统各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发出通知，自此，建设志编修工作全面启动，提出“五到位”要求，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人员到位、条件到位。明确要求各单位要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广泛搜集、整理好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相关资料，同时要确定一名志书编纂工作专职联络员。

为落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我厅湘建[2008]194号文件精神，帮助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解决修志工作中的有关困难和问题，高质量地完成建设志修编任务，我厅于2008年9月，在长沙举

办了为期三天的《城乡建设志》业务培训班，重点培训学习有关新方志编写原则与学术性要求，为参与修志的同志提供了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参加培训的人员达140余人。

二、广泛收集资料，精心安排撰稿

（一）征求意见，制定篇目

为科学制定《城乡建设志》篇目，在广泛征求各处室意见，并经厅领导审定后，2008年12月，编志办拟出了“《城乡建设志》篇目”。篇目共分为八篇：第一篇城乡规划，分五章；第二篇城市建设，分六章；第三篇村镇建设，分六章；第四篇房地产业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分六章；第五篇建筑业，分五章；第六篇工程勘察设计与工程建设，分六章；第七篇建设科技与教育，分六章；第八篇管理，分六章；附录：建设法规、政策、标准目录索引。后又在处室的要求下，增设了“重点工程建设”篇，分三章列入篇目。

（二）精心安排，撰写初稿

篇目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批后即开始按篇目撰写志稿。撰写安排上采取“包产到户，集体创作”原则，由相应处室安排专人撰写。经过半年多时间，各处室于2010年8月底前，先后完成初稿并报送厅编志办。当时综合已到的稿件总字数约为86.6万字。

2010年8月，厅编志办的编纂

人员对汇总的初稿进行初审，此轮初审除改病句和错别字外，主要统一了各学科计量单位符号与称谓，校正地名，删去涉及国家机密的有关资料，截留2002年以后超时限内容，以及使用的词语是否恰当等等。特别是对24年间湖南建设系统的成就得失是否记全、记准进行了认真修改和完善。

从总体上看，各处室撰稿人写作态度认真，文风朴实、端正，文字简洁、准确。同时，就此轮稿件撰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编志办于2011年1月召开了所有撰稿人参加的《城乡建设志》编写研讨会，进一步明确撰写史志的基本原则，强调文字是留给子孙后代阅读的，务必满足两个要求：一是依实记实，所谓写得华丽不如写得准确；二是只述事写人，不作评论。

（三）精益求精，提高质量

86万字初稿编纂修改工作，主要是对文字进行增减和结构布局调整。2011年2月底，在厅办公室主持下，制定了后三个季度的工作计划。按照工作计划，由编志办增写“序言、概述、后记”和“城建档案案管理”几节文字，此次会议还确定增写前期议而未决的“城市雕塑”一章，删除已经编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处理”一章，约2000多字，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在本轮志书限期内。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度重视本轮建设志编纂工作，卢凯旋处长亲临编志办检查工作，此时志稿已

按照修改计划精炼到约69万字。卢处长听取了志稿修编进展情况汇报后提出，维持原定九篇篇目不变，各篇首加一段简练的篇首语，使各自独立的九篇衔接成为一个整体。“概述”保留，“序言”和“后记”合并为“编辑说明”，再适当增加相应的图片，增加一份“编辑人员名单”。

在志稿由三审后进入“专家把关审查阶段”，这一工作委托湘潭大学史学专业退休教授黄子林先生担任，从2011年7月22日至10月14日，耗时84天，对全书作了“简、并、转”的工作，指出文字上常见的错误，特别是对志书中的简称、缩写、模棱两可、不确切的词做了更正，志稿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011年11月，志稿返回各处室自审。其中，房产处阅后认为，该处承担的“房地产业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篇除住保处拟定的章节外，其余写得粗浅零乱，房地产开发的重点没写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点没突出，决定聘请相关人员重新改写。2012年2月，该处主持召开写作研讨会，邀请了相关人员以及厅编志办编纂人员参加，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实现了写深写透、写出重点、写出亮点的要求。由于领导重视，改写的“房地产业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篇，基本上达到志书编纂规定的要求。

另外第一篇“城乡规划”和第三篇“村镇建设”两篇，由于处室领导重视，在返回各处室自审时，将原稿中出现的缺项全部准确的补齐。

三、遵守审查程序，严格组织

评审

在专家把关审查和返回各处室自审时，《城乡建设志》稿进入厅领导审查程序。按照要求，编志办将四审稿于2011年11月起，分别呈送各位厅领导及部分退休领导和参与上一轮《城乡建设志》编纂的老同志审阅。每本志稿都附有审阅意见表，供审阅者写出修改意见。

(一)在此期间，厅办公室负责人审读了四审稿，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一是坚持朴实的文风，删去不必要的分析与评论；二是各企业的优质工程，以获“金奖”入选，以统一标准并以列表形式附入本篇中，同时尽量收录本省当期系统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三是各企业发展概况的选介、各单位的叙述文字要力求简洁平衡，不论是中央在湘企业，还是省级企业，都以2002年以前资质证件为考量标准。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家史)不收入本志。四是在本轮志书时限内制定颁布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按发布时间先后顺序列表附后。

(二)2012年完成“七审”。进入领导(厅领导和省志编委会领导)审查阶段。2月17日编志办召开工作会议，订出上半年工作计划，拟于4月上旬拿出完整稿件呈送省、厅领导审查。

负责撰写第四篇中“房地产开发与管理”这一部分的房产处，于2月22日召开了写作班的研讨会，当值的处领导全部参加，并邀请了退休的老处长以及参与房屋普查的老同志参加，会上三位现职处长发了言，提出要求和建议，一定要写出本篇重点、亮点和难点，力求全面、准确。会后，写作班子一边修改，一边向各地市房产部门索取资

料，终于在4月中旬完稿。

编志办在9篇文稿(纸质、电子版)全部到齐后，对稿件又作了进一步修改，使文句更趋严密，篇幅更加紧凑。4月底修改编成册再次呈送给部分厅领导和退休的老领导。

(三)2012年9月4日上午编志办在长沙召开了由各处室领导及各篇章撰稿人参加的评审工作会议，主要是听取了省志编委会对《城乡建设志》全稿的审查修改意见。会后，编志办根据省志编委会提出的修改意见，各篇章所缺少的内容用文字具体列出，通知各处室撰稿人抓紧时间收集补充，定期交稿。为了认真做好资料补齐工作，厅办公室于2012年9月11日印发了湘建[2012]20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南省志·城乡建设志(1978~2002年)〉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处室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要求，进一步补充、修改、完善，对各处室(单位)志稿编纂工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并纳入厅机关年度目标考核。厅发的209号文对完善志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经过修改补充完善后稿件(定稿)呈送给省编志办审查。

由于各处室特别是撰稿人的共同努力，第二轮《城乡建设志》已编纂成稿，等待最后审查定稿。借此机会，向省编志办各位领导对我厅编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指导，厅领导对编志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所有撰稿人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加强领导 提高认识 认真编好《教育志》

●湖南省教育厅史志办公室

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湖南省政府于2004年5月18日召开全省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省教育厅按照省政府部署，及时启动了这一工程。自此以后，厅领导一直重视这项工作，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各有关处（室）紧密配合，编纂人员积极努力，历时八年后，一部120万字的《湖南省志·教育志》终于呈现在全省人民面前，向党的“十八”大献上了一份珍贵礼品。

第二轮湖南《教育志》编纂工程早在2003年底前按国家教育部有关通知就开始启动，2004年4月22日，省教育厅及时成立了以厅长张放平为组长，朱俊杰、李丽为副组长，陈元魁、陈最华、申纪云、陈湘生、陈曙光、王键、邹卓鹏、唐展生、杨国旗、汤汉文、符华兴、宋裕国、杨定忠、张学军为成员的《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同时相应地成立了以陈湘生、张大伟、周卫兵、赖阳春、唐亚武、郭荣学、左清、徐伟、舒凡卿、王玉清、廖湘生、贺安溪、蒋先龙、葛建中、蒋明、熊俊钧、刘昌辉、夏智伦、邓江祁、陈飞跃、肖湘愚、李厚德、陈小奇、雷桂平、胡国强等人组成的编委会，陈湘生担任主编，张大伟、胡国强任副主编，具体编纂业务由挂靠在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省教育厅史志办公室承担。

编纂班子组成后，及时召开了

由分管副厅长陈湘生主持的专题会议，提出了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 and 具体要求。此后，认真拟定编纂方案，撰写编纂大纲，选配编纂人员，落实编纂责任。经研究，本志主要承接第一轮《湖南省志·第十七卷·教育志》记述范围而下延。上志记述湖南教育事业自古至1978年止的发展过程；本志主要记述1978~2004年湖南教育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历程，有的内容因特殊需要，在时间上下延至2005年。各篇都配备了人员。

为了使资料数据可靠准确，具有权威性，自2004年6月起，编纂工作人员分成五路，深入各地、各有关单位收集史料：第一路人员深入到14个市（州）及有关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第二路人员深入到有关图书馆；第三路人员深入到有关大中专院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第四路人员深入到省、市（州）及有关县（市、区）地方志办与档案馆；第五路人员深入到省、市（州）有关出版部门与新闻单位。2005年8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五路人员共收集相关资料2000多万字，基本完成史料收集任务。

此后，按照编纂大纲要求，编纂人员认真筛选史料，着手编纂工作，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编纂人员不计寒暑，不辞辛劳，笔耕不辍，思索不断，于2007年6月，完成初稿编纂任务。然后，将初稿打印成50套，分送省

教育厅有关领导、省地方志编委会专家、厅有关处（室）负责人审阅，在此过程中，作为审稿专家的蒋义春、杨国旗、彭酉斌、李锐、戴次一、王展经6位省教育厅老同志参与了审阅，提出了继续修改的意见与建议。

2007年6月后，因教育厅进行机构改革，厅领导班子成员有所调整，编纂人员发生异动，编纂经费比较困难，本志编纂工作一度处于暂时停顿状态。

2008年4月，省教科院设立以胡国强为所长的教育史志研究所，专门负责教育史志研究与编纂任务。此后，在教育史志研究所的积极促进下，处于停顿状态的本志编纂与修改工作开始逐步恢复。

2009年9月，在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的高度重视下，成立了以张放平为组长，汤汉文、陈飞跃为副组长的新一届省教育史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史志办公室；同时，相应地成立了以陈白玉为主任，陈飞跃、胡学军、张作功、张学军为副主任的新一届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新一届编委会成立后，在省教育史志编纂领导小组领导下，在陈白玉主任指导下，组织专家对《教育志》进行了第二次审阅。参加此次审阅的专家有高珊曾、杨国旗、廖湘生、刘先捍、郭荣学、张晓春，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新一届编委会组织了新一轮较大规模的修改。在新一轮修改中，对编纂思

想和框架结构作了适当调整，努力处理好六个关系：一是纵横关系，二是篇、章、节、目、条关系，三是整体与局部关系，四是组织与个人关系，五是详略关系，六是管理工作中的宏观与微观关系；同时，按照新形势要求，将“幼儿教育”篇更名为“学前教育”篇，“师范教育”篇更名为“教师教育”篇，“社会力量办学”篇更名为“民办教育”篇。此后，在陈飞跃主持下，召开了由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议，研究落实新一轮修改工作。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调整后的编纂思路和框架结构，积极支持新一轮修改工作。会后，在有关处（室）负责人的积极推荐下，重新选配新一轮执笔修改人员。2010年8月，新一轮执笔修改人员到位。就这样，历时近一年，在克服各种困难后，终于完成新一轮修改任务。

2011年7月，编委会将本志第二稿清样30套，分送省教育厅、省地方志编委会、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审阅。参加此次审稿的省教育厅领导、省教科院领导有张放平、李红、李丽、申纪云、陈湘生、杨定忠、葛建中、姜正国、汤汉文、陈飞跃、廖湘生、张学军；参加此次审稿的处（室）负责人有石灯明、王玉清、郭荣学、唐利斌、张大伟、熊俊钧、贺安溪、彭四龙、陈小奇、雷桂平、王俊良。2011年11月，参加审稿的所有厅领导及有关处室负责人一致签署了“拟同意出版”的意见。

2012年4月28日，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李跃龙，省地方志编委

会省志处处长卢凯旋、副处长杨帆一行三人，专程到省教育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反馈审稿意见。省地方志办负责人认为，修改后的第二轮《教育志》框架合理，内容完备，资料丰富，观点准确，真实可靠，系统反映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概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同时，他们对本志的概述撰写、史料选用以及书名、标题、版式、表格、标点、序号、署名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宝贵意见。事后，按照省地方志编委会省志处指出的问题，胡国强逐个地进行修改落实，后经胡学军统稿，最后由陈白玉审定。

本志编纂工作渗透着所有参编人员的辛勤汗水。他们忠于职守，安于寂寞，不辞辛劳，一丝不苟。省教科院史志所所长胡国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淡泊名利、不问仕途，多次放弃个人申报国家、省级课题的机会，尤其是办杂志和升职的机会，主动固守别人不愿搞的修志工作，带领修志人员，协助编委会负责人积极组织资料收集，认真编辑校阅文稿，经常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工作，8年来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多个春节都在工作中度过，群众称之为“拼命三郎”、“老黄牛”、“实干家”。

由于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方志先进个人，全省“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记一等功一次。副所长罗慧、办公室主任谭小京、原研究室主任蒋书同等，不顾寒冬暑日，穿梭于全省，不仅搞好上下联络，发通知，打电话，苦口婆心做工作，不厌其

烦跑基层、图书馆、档案馆收集资料，在省城大都挤公交车或步行，即使到市州出差也从未要过补贴。为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他们倾注了心血。

第二轮湖南《教育志》涉及范围广，编纂内容多，收集史料、厘清线索不是一件易事，尽管编纂人员尽了很大努力，但因水平所限，加之有些文献资料不尽完整，故遗珠之憾和不全之嫌仍然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志坛文艺

七十感怀

● 吴贤章

古稀娱晚景，书画乐余年。
夜步滬湖岸，朝登金鸚嶺。
诗朋常雅集，联友每精研。
疾恶如仇敌，怀型仰圣贤。
编书十三载，涉典千百篇。
寒暑勤持笔，春秋不歇肩。
埋头攻险阻，笑我忒疯癫。
才薄难为用，志坚贵有恒。
潜心弘德教，洗耳去虚名。
闹市驱诱惑，修身养性情。
儿孙欣绕膝，英俊展长纓。
老骥蹄犹奋，关山续远征。

注：编书，编写《韵脚辞典》，已历13年，约160余万字，计划今年完稿，明年有望付梓。恳请各位方家斧正，惠赐和作为感！

（作者住址：岳阳市农昌巷22号岳海园公寓 邮编：414000）

发挥“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 高标准完成《计划志》编纂任务

● 省发改委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续修省市（州）县三级志书的指示精神，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布置指导下，由省发改委负责编修的《湖南省志·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志》（简称：《计划志》）于2010年12月圆满完成编纂任务。

新一轮《计划志》是第一轮《计划志》的续修，上限1978年，下迄2005年，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计划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主要成就。《计划志》涉及计划工作30年，时间跨度长、工作任务重、难度系数大，是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历史性工程和基础性工作。《计划志》修编工作在党委组统一领导下，全委各处室、各单位大力协同配合，《计划志》编写组5位退休老同志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湖南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充分发挥“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克服工作中许多困难，历经六个春秋，四易其稿，终于按时高标准完成《计划志》编纂任务。

一、《计划志》编写过程

新一轮《计划志》的续编工作，2004年7月开始准备，2005年一季度正式启动，经过组建领导班子和落实编写人员、拟定《计划志》篇目、查阅历史档案和收集资

料、编写志稿、座谈讨论、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志稿评审和委领导审定等阶段，最终形成84万字的《计划志》。

2004年5月18日，省委、省政府领导主持召开全省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要求没有开展续志工作的单位尽快开展工作。我委通过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修志工作“一纳入、五到位”的要求，经委党组研究将《计划志》续编工作正式纳入省发改委年度工作任务，由委领导一把手亲自挂帅，成立《计划志》领导小组，陈叔红主任任组长，分管副主任欧阳彪任副组长，其他委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成立《计划志》办公室，挂靠委离退休办，明确把修志任务作为离退休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组建精干的《计划志》编写组，从退休老同志中挑选5位同志担任主编和编辑人员；落实办公条件和修志经费，为《计划志》的编写创造有利条件。

2005年一季度，《计划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在收集和掌握部分资料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和起草《计划志》篇目。同年二季度出来草稿后，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征求对《计划志》篇目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修改，五易其稿和委领导审核后，正式上报省地方志编纂委审定。2006年4月，省地方志编纂委召开专门会议审查通过了

《计划志》篇目。

2006年，是《计划志》编写组查阅历史档案和全面收集资料的一年。根据篇目内容重点进行资料搜集工作。由于省发改委（含计委）2000年以前的文书档案全部移交到省档案馆，只有2001年以后的档案仍在委档案室。因此，整个查阅档案资料的工作大体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时间是2006年6~12月，用半年时间集中力量先查阅完省档案馆的文书档案；第二段是2007年一季度，查阅委档案室保存的档案资料。

2007年2季度开始，是编写组正式进入编撰志稿的一年。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编写组成员进行合理分工，把《计划志》概述、6篇、26章的撰写任务和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明确各篇、章、节撰写的具体内容和资料来源，使每一个编写人员心中有数。由于任务和责任到人，充分调动了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编写组成员中有的同志不分工作日和双休日，加班加点赶任务，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精神非常可贵。在编写过程中，还要边写边补充资料，边专题调研和座谈。负责统稿的同志交来一篇或一章就及时修改一篇或一章，任务非常艰巨。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到2008年9月，形成110万字的《计划志》初稿。

《计划志》初稿出来后，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初稿文字太

多，篇幅过长，应大力精减。为了集中大家的意见和智慧，编写组对《计划志》初稿包括概述在内逐篇、逐章、逐节进行评议，提出压缩和修改意见，然后由执笔人进行具体修改和完善。

2009年元月，《计划志》初稿经过修改和集体讨论，最终形成94万字的第二稿——《计划志》讨论稿。同年春节前打印出来，分送委领导、离退休老领导、委属各处室和有关单位，听取和收集他们的意见，并召开一系列综合性、专题性会议征求意见。

同年6月中旬，编写组邀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和专家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讨论稿》的意见。省志办总编室主任卢凯旋、副主任杨帆和杨凯丰同志参加座谈，对志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编写组及时将多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和归纳，逐篇、逐章、逐节列出修订、补充提纲。经过集体讨论研究后，对《计划志》讨论稿统一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93万字的第三稿——《计划志》送审稿，文字比《讨论稿》减少11万字。2009年9月，重新打印出来，继续分送委领导、离退休老领导、委属各处室和各有关单位进一步进行审查修改，再一次广泛征求对送审稿的意见。志稿经过反复修改，各方面意见基本上都吸纳进来，没有采纳的建议都分别作了沟通。编写组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继续再接再厉做好志书征求意见的工作，据此反复进行修订。2010年4月，编写组将《计划志》送审稿征求意见的情况向省地方志编纂委的领导 and 总编室的同志作了汇报，再次听取他们对志稿的

意见。省志编纂委副主任李跃龙、总编室主任卢凯旋、副主任杨帆等除对志稿提出修改意见外，同时认为：《计划志》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四易其稿，可在此基础上形成评审稿，由省发改委主持组织对《计划志》进行评审。

2010年6月，经过反复修改后的志稿第四稿——《计划志》形成评审稿，84万字。并召开有各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评审会，再一次广泛征求意见。

《计划志》编写组根据评审意见认真进行修改，力求志稿观点正确，内容真实，符合志体。于2010年10月形成84万字《计划志》送审稿，上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和统一出版发行。

二、主要做法和体会

(一) 领导重视，是搞好修志工作的关键。从修志工作启动开始，到以后的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志稿、修改补充、志稿评审等阶段，委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都非常关心和支持。可以说，没有一把手的高度重视和一名副职主抓，就没有《计划志》的成功。

(二) 老同志领衔，是解决修志力量不足的宝贵经验。鉴于省发改委各业务处室人员少、任务重，难以抽出专人修志的情况，委领导决定启用退休老干部参加新一轮《计划志》续修工作。经委领导研究，在退休老同志中挑选了5位熟悉情况、懂得业务、并且有一定文字水平的老同志组成《计划志》编写组。这当中有的是退下来的厅级领导，其他都是退下来的处级干部。尽管年龄大了点（平均年龄75岁），但身体状况还可以。我们认为老同志参加修志也有一定优

势，因为他们长期在计划部门工作，情况熟悉，经验丰富，政策理论水平高，综合分析能力强。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现在又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对《计划志》的编写工作最有发言权，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参加修志的5位老同志，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说服家人和亲友，克服年老体弱等困难，勇挑修志重担。孤灯冷凳、潜心修志，通力合作、孜孜不倦，尽职尽责、辛勤耕耘，较好地完成了修志任务，多次受到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和表扬。

(三) 系统收集资料，是搞好修志工作的重要基础。收集资料是编写志稿的一项艰巨而繁重的基础性工作，是事关志书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前提条件。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全面系统地收集资料的重要性，要求把此项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抓好。编写组人员舍得花时间、费力气。他们首先从委内档案室调出档案目录，筛选出需要查阅的档案卷宗，把前后30年、30本、3万多个卷宗目录都过目一遍，从中摘选出与《计划志》内容有关的3000多条目录，登记造册送交省档案馆调阅。从2006年6月开始，编写组就集中力量投入到省档案馆查阅材料，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据初步统计：共查阅的卷宗3000多个，复印和摘抄的档案材料11000多份，付给档案馆的复印费13000多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位老同志在档案馆集中查阅档案时，正值酷热天气，在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情况下，仍然坚持天天按时到档案馆去，有时汗流夹背，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中午就

在附近吃盒饭，每天如此，不怕辛苦。为了全面系统地收集资料，编写组首先对委内各处室、直属单位分别列出提供相关资料的清单；需要各市州发改委提供的资料，也一一列出清单；需要省直有关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编写组分别列出资料目录与内容，一个个单位登门拜访，请求协助支持。通过各种形式、各个方面、多种途径收集的各种资料，粗略估算：各种书籍汇编、统计资料汇编、年鉴、各种志书、规划与计划约200多册（本），调研课题报告，经济形势

分析、总结、专题报告、行业专业和专题材料等各类资料一万多份，各种书籍、资料累计逾三千万字。这些资料虽然不能全部都利用上，但大部分素材为编写《计划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学习外省经验，是搞好修志工作的有益借鉴。《计划志》编写组的5位老同志虽然对计委（发改委）过去的工作情况比较清楚，业务比较熟练，但都是修志新兵，修志要借鉴人家的经验。为了对口学习各兄弟省市发改委的修志经验，2005年10月上旬，我委发函

到各省、市、自治区索取《计划志》方面的篇目、志书出版物及有关修志资料。截至2006年末，全国共有15个省市发改委，有的寄来篇目（如北京、上海），有的寄来志稿（如河南），多数省市寄来志书或相关材料。有的省市和我们通了电话，介绍了他们的修志情况和工作经验。特别是北京、上海市史志办派出赴湘交流学习小组，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修志情况，相互交流了修志经验。各兄弟省市的修志经验材料，对我们很有启发，为我们编写《计划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志苑视窗

《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出版发行

【本刊讯】2013年5月22日，由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芙蓉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长沙市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首发式在芙蓉区政府召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期刊指导处处长、《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晓天，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厅长级纪检员李晓平，长沙市政协顾问、市地方志学会常务副会长周秋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习加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长沙市各县市区史志档案局、芙蓉区各街道办事处及区直有关单位近百人参加了会议。芙蓉区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新凡代表芙蓉区委、区政府向大会致欢迎词，芙蓉区史志档案局、望城区史志档案局、长沙县史志档案局分别作典型发言。首发式还别开生

面地推出了群口快板《读志用志作贡献》等极具方志文化内涵的文艺节目表演。

《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50万字，采用地图17幅、照片347张，收录辖区内街巷名592个，共设条目369则，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装帧精美，设计雅致。该志编修旨在挖掘方志资源，再现古城风貌，丰满芙蓉形象，丰富湖湘文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该志的出版，是芙蓉区继编修出版《长沙市区东地方志》、《长沙市芙蓉区志》后，在地方志工作领域的拓展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为长沙市乃至全省各地街巷志的编修以及地方志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对于《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这部志书，与会领导、专家学者以

及各界人士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王晓天在讲话中说：“这是一本集知识性、资料性、应用性、可读性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好书，给长沙市民和社会各界提供了很好的精神食粮。”于伟平评价说：这是地方志成果中一颗璀璨的珍珠，一个丰硕的成果，既展示了古城风貌，又书写了新城风采，其编纂中的创新之处也值得肯定。王习加的讲话对长沙市下一阶段地方志工作特别是方志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作出了部署，周秋光要求长沙市各县市区要进一步全面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切实保障地方志事业发展。接受赠书的各方面代表对于街巷志的编修和志书赠阅活动纷纷给予赞誉，认为这是一项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好事，希望方志工作者不断开拓，再创佳绩。

（市县志处）

古苍梧郡治之谜

● 谢武经

前不久，刘专可同志给我一个材料。他根据史料及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以及吉林师范大学李强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推断出郴州为古苍梧郡的郡治。本人觉得很有道理，并根据刘专可同志的研究和一些历史资料提出如下理由：

一、苍梧郡与古苍梧郡是两回事，古苍梧郡不在今广西梧州市。

苍梧郡在哪里？《辞海》记载：“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市）。”

然而，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前就有苍梧郡。至少有四条理由可以说明：一、《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中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说明有古苍梧。二、《战国策·楚策》说：“南有洞庭、苍梧。”说明有古苍梧。三、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记有：“初视事，苍梧守灶……。”说明有古苍梧。四、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记“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苍梧郴县”说明有古苍梧，且与郴县（今郴州）有关联。

二、古苍梧郡在什么地方？在郴州。

理由有七：首先，远古的中原部落或春秋、战国的国家，直至秦朝以前，统治范围未达岭南（今广东连州以南），因而古苍梧的治所必定在岭北，且是在与岭南交界处不远。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野”者边界也。第二、古时长沙郡以南的政治中心在郴州。衡州是隋朝开皇中

设置的；零陵郡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桂阳郡（郡治在郴州）设置的。第三、《史记》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辞海》记载，最早的零陵为县，最迟在秦代就有了，治所在今广西全州西南。舜“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中的“零陵”，应该是指零陵县。零陵县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县，大体相当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桂阳郡（郡治在郴州）设置的零陵郡。第四，从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字句看，“九疑”、“零陵”为小地名，“苍梧”为大地名；“零陵”为县，“苍梧”应该是郡；零陵县当属苍梧郡。所以这句话应该这么说：葬于苍梧郡零陵县之野九疑。第五，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实际上在原零陵县的地域设置了零陵郡。《辞海》记载，零陵郡治仍在零陵县治所在的地方，即今广西全州西南。第六，由于零陵县属苍梧郡；又由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零陵县的地域设零陵郡；再由于根据《辞海》记载，零陵郡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桂阳郡（郡治在郴州）设置的；那么，很显然，古苍梧郡治就是桂阳郡治，即今郴州。第七，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记“苍梧郴县”实际上应该说成为“苍梧郡郴县”。

三、《史记》中关于义帝的记载再证古苍梧郡治在郴州。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

这段话有三个含义：第一、郴县（郴州）是古之帝者呆的地方。那

么，三皇五帝，谁在这里呆过呢？显然，由于这里是古苍梧郡治，是指舜帝在这里呆过。第二、《史记》中说郴县这个地方“地方千里”，所以要迁义帝到这里。当然，古郴县所在的地方过去面积很大，郴县的面积超出了现在郴州地区的范围；就像古零陵县的面积超过现在的零陵地区的面积一样；尽管如此，我不认为《史记》所指的是郴县，而是指疆域辽阔的郡址设在郴县的古苍梧郡。古苍梧郡才是真正的“地方千里”。第三、“必居上游”应该这样解释：郡治设在郴县（郴州）的古苍梧郡，正处于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站在中原的位置，特别是中央的统治还没有到达岭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时候，这里确实是上游。

四、为什么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梧州设苍梧郡？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历经五代共九十三年由尉佗开创的南越国被汉朝灭亡。在此之前，在郴州设立的苍梧郡已改为桂阳郡。南越国灭亡以后，南方对汉朝的威胁解除了，西汉王朝把行政区划小，新增了很多郡县，原南越国所在的地方被分为汉朝的九郡，而在今梧州重新设置了苍梧郡。极为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零陵也从桂阳郡分离出去，另设了零陵郡。

吉林师范大学李强先生通过研究后认为：苍梧最早是与传说时期的舜帝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肯定，古苍梧在湖南省境内，且应该在长沙郡南部。而刘专可同志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认为古苍梧的治所不但在长沙郡南部，且就在郴州。

古苍梧郡历来是一个谜，随着不（转下页）

我与纸质期刊

● 欧维之

纸质期刊是有灵魂的。许多人(也包括我)蜗居其中,甚至生发出一种本能的坚守,那是因为爱。对于有质感的阅读和写作的坚持,守旧者依然故我。这种质感一如伙伴,仿佛前行中可以扶持。纸质期刊因此而华盖依旧,翠韵悠然。“华盖”是我的“广厦”,“翠韵”是我的慰藉,与其说我经营着期刊,倒不如说期刊在抚慰着我,在我不能蓬勃茂盛而别人为之惋惜、不平的漫漫羁旅中,尤其是这样。虽然,明知办纸质期刊是夕阳行业,但就像携着糟糠之妻步入晚年般地不忍舍弃。

朝晖夕阴之间,网媒电产之外,我与如我的一群人,仍在文字的垄亩上躬耕,带着希望播种,流着汗水中耕,挑着幸福收获。一篇篇美文是心灵鸡汤,一张张图片是自然笑脸。阅读、推敲、编辑和制作,有如太极的推抱,面壁的沉静,心上的尘土被一颗颗清除,脑中的思想被一缕缕放飞。我编辑着期刊,期刊也编辑着我,渐渐地,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别处只能缄默的时候,在这里我特别多语。

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宗旨,犹如天下万物各有所本。根本不同(哪怕差异甚小),则木相类而高矮丰纤有别;期刊亦然。封面是期刊的脸,它体现审美个性,也反映内蕴气质,应当和它所梦寐缠绵的读者群体的审美情趣相表里。栏目是期刊的骨架与脉络,对宗旨的完

整和与时俱进的支撑,是栏目的使命。文本是期刊的血肉,没有文本,栏目立不住,没有一定数量的常态的优秀文本,栏目便不会闪光。标题是作品的眼睛,作品的神采和美丽,首先是通过标题发散出来的。体裁与效果的选择,各刊未可一律;流泉般的叙述,决战般的论辩,荡气回肠般的歌吟,我所欲也。

为人作嫁人以为苦,而我不然。成就一个个作者与报刊的良缘,心中便生出许多喜悦。我不以编辑为鄙,他是作者与报刊之间的一截路、一条船,或一位红娘。他的存在与努力终归有益社会和他人,因此,他短暂的人生便终归是有价值的人生,尽管这价值是多么的微小。我自上初中即办黑板报,稍长则办刊也办报,以至如今,看来此生将与编辑一词终老。在中国语言文字面前,我常常冒充军团长,不自量力地去调遣它们。在字词与标点符号们面前,我又常常以教官的面目出现,不许它们迟到、早退、缺席,或站错位置。它们懂规矩守纪律,不像我偶尔会顶撞上司,甚至有私心杂念。在我自省的时候,会常常暗暗地向它们看齐。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编辑,我以不敢间断的学习、思考、总结和实践,来完善我平凡的工作。

2013年8月14日

(作者单位:省地方志编委会)

(接上页)断的考古新发现及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谜底应该可以揭开了。

(作者系《湖南省志·文物志》主编)

【任国瑞编后记】古苍梧的研究一直是个冷门,而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的意义在于:小而言之,可以还原或部分还原郴州、永州和衡阳的历史。中而言之,可以大致

廓清清代以前湖南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大而言之,因其牵涉到炎黄尧舜禹等众多古帝的行状,它将使传说时代的历史轮廓变得清晰,并将在许多方面改写和补写中国历史。

虽然寻找资料极为艰难,虽然出土实物极为有限,但只要我们专心致志,充分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跬步千里的坚忍精神坚持下去,这一研究还是可以出现跨越式发展的。

谢武经先生这篇短文原本是提供给我的,想我执笔写一篇较完整文章,我因过去有一点积累故已欣然同意。可当我在挖掘资料和综合分析时却发现这一工程太大了,非数万之言不能尽其意,非数月之力不能竟其功。欲作一篇快餐式短论,又恐功夫不到而立论错误。因此,遂将此文先予发表,以引起有志者的注意,让这个冷课题尽快热起来。

《湖南彭氏》序^①

史可以知兴替，志可以明得失，谱可以淳风俗。在党和国家大力推动文化建设的今天，姓氏文化的建设和抢救显得尤为重要。殷商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就记载了几氏家族的11代人的名字。战国时代的《世本》，是我国最早的族谱。魏晋南北朝将族谱作为出仕、选官和联姻的必要依据。唐代设有谱局、谱史，族谱由官府编修和保存。尔后千余年虽废止了官修，但仍然鼓励家族自修，它就像我国前些年风行的国有企业改制一样，国家不包揽了，但仍然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生产。明代要求族谱要发挥教化功能，清代则既鼓励修谱，又重视宗祠的修建。中国历代王朝重视姓氏文化建设，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的祥和稳定，是以家族家庭的秩序化为前提的。如果说国家是生命的躯体，那么家族家庭就是细胞，细胞癌变了，身体还会好吗？在我国，姓氏文化是国家细胞的清道夫，它以尊祖为核心，以爱为归宿，以修身和文明礼貌为途径，以建功立业为目标，只要给予它繁荣发展的空间，其作用远胜于国内的维稳支出。

姓氏文化中的族谱，作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国粹，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炎黄子孙遍布宇内，其卓尔不群者比比皆是。华裔大都尊祖重根，我们积极开展全球的寻根认祖活动，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二，一部族谱便是一部氏族的百科全书，详史志之略，通古今之变，它承载着各学科各门类所需的珍贵资料，其本身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虽然可能在人物

及世系上溯间会存在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但从总体上它具有其它典籍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它以其丰富的范式人物和典型个案，以其在家族中的亲切感，为国民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教材，其传诵与渗透的作用无可替代。其四，它凝聚人心，强化了氏族及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进取心，是建设家园的动力，抵御外辱的长城，是以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泽沛和统一世界的基础。因此，可以预见，族谱终将以其历久不衰的文化魅力而雄居世界文化记忆遗产的宝座。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彭祖文化编修委员会自2010年成立以来，努力工作，广泛动员，艰苦搜集，积极研究。从典籍与文物中梳理了自少典至唐玄宗一段的源流，基本上廓清了自迁湘始祖构云公以下的历代世系。以走访、搜集谱牒、遍览姓史和发放氏族调查表等多种形式，在湖南境内收集了大量资料，艰苦编纂了一部具有《湖南彭氏通谱》为形的《湖南彭氏》一书。本书洋洋60万言，共计9章80余节近300目，由美国名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具有7个特点：一是资料宏富。本书除了大量的问卷调查表外，征引的主要参考文献达500余种，采撮的谱牒近100种，书中古今彭氏人物不可胜计，具有极好的存史价值。二是构云公以下世系纵不断线。人物记述虽有详略，但千余年流变却一目了然。三是客观真实，多说并存。姓氏书编修的最大流弊在于溢美和妄拟，而本书不然。全书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用资料说话，让读者对比思考，如彭祖的生平事迹，源头的世代衔接，郡望的

地点确定等，皆众说纷纭，纂者一律多说并存。还有人物的界定，凡有圣旨及当时权威悼词者，都以原文呈现。又旧谱序溯源有抵牾者，亦同时收录。四是省内市州横不缺项。湖南彭氏人口150万，居全省第12位，分布于14个市州，两年时间居然能在书中以市州设节分述，其艰苦卓绝令人敬佩。五是结构平稳，要素齐全。上下三千年人物事迹各有依傍，于古今之间，详今略古；于湘省内外，详内略外；于人物之间，详要略辅。六是体例完备，记、传、录、图、表俱全。本书以记为主，彩照前置，正文中有谱牒图片，有世系表与垂丝图，有人物传，有重要文献附录。披览之间，轻松悦目。七是语言洗炼，不枝不蔓。全书没有空话、套话、大话、假话，也不妄自议论或强说观点，充分考虑了节约读者的时间。

当然，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给我先睹为快之余，也留有让我揭短的出处。诸如行文、标题和编排之不尽规范，校对之不尽完善等，过目如读盗版书。我想在本书定稿之后，这些问题是不会存在的。

对于彭祖和彭氏文化的研究，我自不如作者，反而在阅读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相信，关注姓氏文化的读者，也不会有宝山空回之憾。

2012年9月16日于长沙恕德斋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湖南地方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湖南地方志》执行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①本序已载入美国名家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由湖南彭祖文化编修委员会编著的《湖南彭氏》（60万字）一书，为第一篇序。

方志篇目的制订

● 李晓平

方志的篇目，也叫纲目、类目、门目，是方志的编写提纲。它高度概括了志书的内容，又是志书的编纂宗旨、指导思想、内容范围和体例的具体表现，也是一部志书的备料清单，收集资料的向导。方志的篇目，就象建筑工程的“设计蓝图”，没有纲目便无法备料和施工。因此，制订篇目，是修志工作的第一步。周应合在其主纂的宋《建康志》的《修志本末》中讲到，修志必须“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译参订”。四事之首，就是“定凡例”。事实上，历代修志总是首先拟定凡例篇目的。方志学家李泰棻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黎锦熙1938年受聘为陕西城固县志总纂时，著有名篇《方志今议》，其主要篇幅即为城固县志拟定了纲目。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第二轮的修志工作。把浩繁、杂乱的资料编纂成一部完备的志书，如何避免编纂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最重要的是要拟定一部志书的较为科学、合理的篇目。

一、制定篇目的作用

1、决定一部志书的质量的高低。修志只有先拟定好篇目，做到主线明确、门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排列合理、统属得当，符合志体，才能够全面、系统地记述全区域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篇目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切实可行，直接影响到志书的质量好坏。

2、明确志书的编写范围。在编写志书前，制定一个较为全面的篇目，就可明确哪些是编写范围、记述的重点，而哪些是附属、略写的部分。

3、便于收集资料。篇目是资料收集的提纲和向导，编修前先制定好篇目，按其篇目，有目的、有成效地收集资料，详略得当，能够避免盲目性和走弯路。

4、明确志书内容的排列组合。制定好篇目，可以避免统属不当，排列不科学，顾此失彼，甚至首尾不能兼顾的现象，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排列有序、组合得当。

5、便于修志的分工。篇目是编修志书组织、计划和人员分工的依据。制定好篇目，能够保证志书的编纂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要求地开展。

二、制定篇目的原则

1、坚持横排纵叙的原则。方志的基本编纂形式是横排纵叙，以类系事。所以，制定篇目必须坚持科学地横排门类。所谓横排，就是分门别类，把要写的内容进行科学分类，先分大类，大类下分小类，小类下分条目。反映到志书上，即篇、章、节、目几个层次，层层相辖。旧志是非常注重横排的。新志较之旧志虽然强调在体例上要有创新，但是，志体横排这一特点是不能轻易抛开的。如果抛开这个原则，就会把地方志写成地方史，各类专业志也就变成了各项专业史。

2、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原则。按照方志固有的资政、教化、存史功能，在新方志篇目设计时，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3、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要树立质量第一和经世致用

的观念，充分吸收旧志和前志的优点，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创新内容和形式，着力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全面真实地反映区域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四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制定篇目的要求

拟定省、市、县志篇目的基本要求是：

1、类目齐全。类目要全，尽其所有，横陈百科，纵写历史，记一地的全貌，是一方的全书。

2、统属得当。篇与篇、章与章、节与节之间是平列关系，而章节目之间一般为纵向关系，章辖节、节辖目，层层相因，层层统帅，上下得体。

3、层次分明。要处理好篇章节目之间的层次序列关系，做到科学分类，层次清晰，主次分明，条理清楚，避免重复和遗漏。

4、突出特点。包括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这是拟定好篇目的重点。没有特点，也就没有重点，就会一般化。

5、简洁实用。篇目要言简意明，采用语体文。

6、观点正确。拟定篇目不仅要符合志体，同时要注意篇目的思想性，保证志书的政治质量。

四、制定篇目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横与纵的关系。从文体特点看，史体纵看，史论结合，在于探求历史规律。志体横看，述而不论，排比资料，在于反映客观规律。因此，“横”与“纵”的关系处理不好，就容易把地方志写成地方史。方志立目方面，历代大致有3种情况：一是按

体(载)分门,即按记、图、表、考、政略、列传等体裁来分。二是先纵后横,即按历史时期拦腰截成两段或三段,或分“解放前”、“解放后”,或分“古代”、“民国时期”、“建国之后”。有的甚至分成四五段、六七段,各段之中再按大致相同的章节横分若干门类。三是分门别类,即按事物的性质,横向分成若干门类。上述3种篇目的结构方法,第一种从形式上区分门类,显然不太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第二种是写地方史的方法,不宜于写志,虽然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之间的区别明显了,但同一事物之间的前后联系割断了,结构上也显得叠床架屋,相同的事物在各篇之中反复多次地出现,阅读和检查多有不便。第三种方法是方志横排纵述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偏于横割”的缺点,但具有面目清秀、容量大等优点,不宜轻易抛弃。当然,为了实际的需要和弥补横排的某些不足,在部分章节也可以纵断时期,使志体有所创新的突破。

二是要处理好门类与部门的关系。方志是要记述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但地方志篇目是按门类立目而不是以条线的工作部门设立分志的。因此,省志、市志、区志、县志中的分志,都应该是包括一个门类全部情况的专志,而不是某个主管部门的部门志,或者是不完整的专志。部门和条线虽是拟订篇目和提供资料的基础,但在篇目中,相近的部门和条线已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进行了同类项合并。如《湖南省志》设的专志较多,估计有80多部,但也无法完全按部门设志。向总志提供的必须是专志,而不能仅是部门志。

三是要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首先是断限问题。曾经有过把新方志上限断在1840年或1911年的主张。但方志界同仁多数没有赞同。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上限不限下限断”,即上限从一个专业(或一项事物)开始之时写起,下限则“一刀切”,如第一轮《湖南省志》下限断至1990年,则1991年以后的情况一概不写。

四是要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旧方志当然也记“面”,也记“点”,但比较来看,更注重于记“点”。新方志要想发挥其功能就须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旧志通病,既要记“点”,同时要记“面”,记全局情况。表现于篇目,就有总志、总述、概述和无题小序的出现,专记一章、一篇、一志的全局情况。有些则干脆以系统论、城市学为指导,打破现行的行政分工界限,设计出与旧志完全不同的篇目。

五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方志是从旧方志发展过来的,编修新志就要继承旧志好的传统,比如旧志横排竖写的基本体例等。但新方志不是旧方志的简单续修,因此不能因循守旧。清代洪亮吉提出方志“贵因不贵创”,章学诚就极力反对。邵力子在《黄陵县志》序中说方志要“应时创格”,甚有见地。可以这样说,志贵在于创新。平时,有些同志爱用“名志”一词。何为名志?名志大都是公认的有所创新的志。修编新方志,更要刻意创新。修编大城市的市志、区志和专志,可供借鉴的经验比县志少得多,就更要强调“闯”与“创”。

五、制定篇目要体现几个特点

一是要体现志书特点。就是要使方志篇目符合志体。比如结构方面的“横排门类,纵横结合”。体裁方面的名体(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等)并用,有机结合。书写方面的执简驭繁,

精拟标题等。

二是要体现时代特点。新方志内容和形式要与时俱进,必须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来编纂。新方志中,要体现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体现科学发展观,体现坚持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

三是要体现地方特点。地方志是地方之书,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设立类目。努力体现各自的地方特点。湖南的地方志,就一定要体现湖南的山川地理、政治经济、风物特产、人文景观、社会发展等,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湖南的志书。

四是要体现专业特点。如《湖南省志》,整部志书都要有湖南的特点。但湖南的部门与部门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都有不同特点。制定篇目要充分体现各部门、各专业的特点。

志书篇目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制定篇目前,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弄清全局,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组成有领导、专家、群众和专职编志人员参加的修志队伍,要集思广益,反复研讨,确定篇目。再次,要勤于学习,博采众长。包括向专家学者请教,向先行单位取经,向外地借鉴取经,避免走弯路。最后,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篇目设计不可能一下子就考虑周全。因此,篇目必然要在编志过程中反复的推敲和修改。可以这样说,志书出版之前,篇目是难以完全定稿的,志书定稿之日,才是篇目完善之时。编志人员所要努力做到的是,方志篇目从拟订到完善,避免有大的反复、走大的弯路,那就是成功。

(作者系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厅级纪检员)

日本收藏的湖南罕见方志

● 李龙如

中国地方志，据有关资料记载：“近年统计，现仍传世的约有八千余种，但还有较多复本的，不过十之三四，孤本或近乎孤本的，几乎占十分之一，其中又有相当数量流散在国外，以日本为最多。”

流散在日本的罕见中国方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现藏有其中140种缩微胶卷。1986年9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崔建英根据140种缩微胶卷而编写的《日本见藏罕见中国地方书录》（以下简称《书录》）。《书录》“按版式及特征、主要序跋识记、序跋识记或凡例中有关前志源流及本志纂修始末、纂修人名氏、刊刻及增续年代、目录、增续或后印识别等，依次据原书引录。”为我们研究这些方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湖南有民国（含民国）以前方志408种。而据《书录》记载，日本收藏的湖南罕见方志为11种，主要又是明代和清初刻本，其中明嘉靖刻本1种，明隆庆刻本1种，清康熙刻本9种，分别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且多国内缺藏，或只存少数残卷，弥足珍贵。为便于对这些方志的考证、研究，兹略述如下。

（嘉靖）长沙府志六卷

（明）孙存 潘镒修 杨林 张治纂

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藏日本国会图书馆 国内仅国家图书馆（存卷5）

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双线鱼尾，版心书名同大题。

（康熙）长沙府志二十卷

（清）苏佳嗣修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国家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有收藏

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书名同大题。大题下不标卷次，题后三行饃：“长沙府知府

襄平苏佳嗣纂辑 同知于越赵宁通判萧山王骏参订。”

（康熙）岳州府志二十八卷

清李遇时修 杨柱朝纂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国家图书馆（存卷15-27）宁波（存卷5-14，23-28）湖南图书馆（2-27）

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书名同大题。大题后二行：“岳州府知府李遇时鉴定 郡人杨柱朝纂修。”

（康熙）临湘县志八卷

（清）杨敬儒修 杨柱朝纂 清康熙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仅国家图书馆有收藏

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书名同大题。大题后二行：“临湘县知县杨敬儒纂修，邑进士杨柱朝校辑。”

（嘉靖）湘阴县志二卷

（明）张灯纂修 李廷龙补纂 明嘉靖三十三年刻 四十四年增修后印本 藏日本国会图书馆 国内缺藏

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书名同大题。卷次为上、下。卷端题“张灯修”。补版版框较原版约一公分，页码多加“又”字。

（康熙）永州府志二十四卷首

末各一卷 （清）刘道著修 钱邦芑纂清康熙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缺藏

八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书名同大题。大题后一行：“湖广永州府知府刘道著修。”

（隆庆）宝庆府志五卷

（明）陆柬纂修 明隆庆元年刻本 藏日本国会图书馆 国内仅天一阁（存卷4-5）

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书名同大题。

（康熙）邵阳县志十六卷卷首

一卷 （清）张起鹏修 刘应祁纂 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国家图书馆（存卷2-11，13下-16）湖南图书馆（存卷4，5）

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版心书名同大题。大题后一行：“邵阳县知县张起鹏主修”。

（康熙）麻阳县志十卷

（清）黄志璋纂修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缺藏 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无直格，版心书名同大题。

（康熙）永定卫志四卷

（清）潘义修 杨显德纂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存三卷，卷一至卷三，卷四原缺）国内仅湖南图书馆有收藏（三卷本）

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书名同大题。

（康熙）安乡县志十二卷

（清）王基巩纂修 清康熙刻本 藏日本内阁文库 国内缺藏

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书名同大题。卷一、五、九、二十大题后一行饃：“知县事三韩王基巩重修”，卷三、四、六、七、八、十、十一饃“知县事三韩王基巩乔庵重修。”

日本学者利用这些湖南方志探索湖南特别是湖南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法律、军事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重田得写的《考察清初的湖南米市》，论述了湖南米市产生的时间及原因等。另外他还发表了《清末湖南茶的生产结构》等论文。

（作者通讯：长沙市韶山北路湖南图书馆 邮编：410011）

恕德斋诗联近作选

●任国瑞

咏松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朱有志仁兄

吐纳苍穹气，龙盘天地间。
豪情千万丈，大志济元元。

2012年11月

贺长沙市诗协常务副会长 黄政海先生八十寿联

好园丁，三千桃李春常在；
真墨客，六一诗文古不多。

2013年4月20日

敬挽著名书法家邓先成先生联

范式岿然，形神好证欧阳帖；
慈容渺已，德艺堪传司马书。

2013年4月11日

痛挽著名诗人符乃若先生联

居仁九十年，公驾仙槎巡玉宇；
发聩三千首，我含悲泪校遗篇。

2013年4月18日

赠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赵德之先生联

忠于国，孝于父，悌于长；
廉生威，公生明，贤生才。

癸巳四月任国瑞撰莫祝安书
2013年5月21日

书赠书协主席杨俊武兄

浮生如梦不须愁，有梦方能苦作舟。
书海好弹钟俞曲，知心一位足千秋。

2013年5月18日

忆王孙·书赠书协主席杨俊武兄

以书强国惜民生，
满眼阴霾蔽大仁。
幸遇杨兄义且诚，
结同心，
共输肝胆两昆仑。

2013年5月19日

南乡子·赠原省劳教局局长 莫祝安先生

报国有筹谋，
宦道兢兢德自修。
宽猛相生施雨露，
悠悠，
一片公心服众囚。

华发寄潭州，
无限风光作壮游。
宣纸铺张天地阔，
周流，
姹紫嫣红春意稠。

2013年5月21日

赠《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联

才惊誌界；貌驾杨妃。

癸巳四月国瑞奉
并携于印石边款

虞美人·戏赠八零后

春花秋月中年老，
薪水何其少。
市场廉价已无踪，
百姓哪堪瞻望未来风。

堂前父母人犹在，
只是朱颜改。
八零后有几多愁？
恰似一腔豪气对江流。

2013年5月30日

[湖湘古谣谚]

技艺特产 (2)

● 仙玉 喻长华

长沙好米，其香五里

吃了乌山米，七十不稀奇

“长沙好米，其香五里”，关于这好米，有两说。

《永明县志》记载：“府境有香米，不多得，其米玉色，不甚白，细粒，入饭少许即香。所谓‘长沙好米，其香五里’即此种。”永明即今日江永县，旧时江永香米是贡米，产量很少。现在的江永香米仍是江永有名的“四香”（香菇、香柚、香芋、香米）之一。

另一说“长沙香米”指的是长沙东乡产的“乌山贡米”。

乌山挺拔秀丽，是长沙东部群峰中的“老大”。乌山北麓有一股清甜的山泉。相传山上有个仙洞，仙洞里住着一位仙人。仙人看到这里山陡田少，整个斗笠十八丘才3亩米田，百姓辛苦终年不得一饱，便把仙菊甘露洒在山泉中，浇灌这些小块田地。从此斗笠十八丘连年丰收，米质异常。

明朝末代皇帝毅宗朱由检知道后，令其进作贡米。可惜毅宗福短，米尚未解到京城，便自缢身亡了。到清代，顺治皇帝对乌山香米更是喜爱，甚至不惜万乘之尊，下御厨观看作饭。由于此米很少，就是皇宫里的人想吃一餐都不容易。

为什么乌山贡米如此吃香呢？

一是少，物以稀为贵。二是奇，此米比一般米长得多，米心如菊花，故又有“菊花米”的雅称。三是特别发饭，据传“粒米寸饭”。民谣说它：“乌山米，世少有，一粒能发九分九，外出无

须多带粮，升米吃得十黔首。”四是香，人们赞它“乌山香米有油，一捏一个球。”五是营养价值高，吃了长寿，谣曰“吃了乌山米，七十不稀奇。”

解放前，只要乌山贡米一到长沙，市民无不争相购买。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乌山米质远不如传说的好了，但乌山米在长沙仍是受欢迎的。

木洞杨梅甲天下

木洞杨梅，产于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坳上乡木洞，以果大、味美、汁多而闻名。

“木洞杨梅尤擅名，申园梨栗亦争鸣，百钱且得随摊买，恨不移根植上京。”500多年前，就有无名氏诗人这样赞扬木洞杨梅。据了解，木洞杨梅栽培已有千年。它适应性强、耐寒、耐瘠薄，三年即结实。它有四个变种：乌梅、红梅、粉红梅、白梅。这四种虽色气不一，然都味美汁多，果大爱人。

木洞杨梅含糖分、果酸、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生吃可生津止渴，消食止吐，润肺止咳。还具别的水果难以具备的功能，如可以止泻解酒。现在，木洞杨梅已被制成果脯、罐头、果干、果酱等畅销海内外。

龙牌酱油味无穷

龙牌酱油是湖南省湘潭市名产，已有300年历史。据《湘潭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初年即有制作。当时龚庆祥斋酒酱作坊生产的酱油，以汁浓郁、色乌红、

香温馨而称“三绝”。清末，浙江丝绸商吴子芝见湘潭酱油味鲜，获利颇丰，便创办“吴元泰酱园”，取名“龙牌”。后吴凤来创办“吴恒泰酱园”，取名“凤牌”。从此龙争凤斗，使湘潭酱油名闻海内外。

龙牌酱油是原汁酱油，咸度适中，略带甜味，久贮不混浊，不沉淀，不起霉花。清代著名书法家、诗人何绍基曾写诗赞它：“一滴味无穷，三餐人永寿。”

龙牌酱油的过硬品质，使它除在国内畅销外，还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1965年被评为中南五省优质出口酱油；1978年6月在全国出口酱油评议会上获第一名；1981年、1985年两次获国家银质奖。一般在炒菜、汤菜中只要着几滴，便可使菜肴具有酱色，添味增鲜，故有“龙牌酱油味无穷”之美誉。

龙牌酱油的这种颜色鲜亮、香气浓郁、味道鲜美，久贮不坏的特点与它独特的制作工艺是分不开的。龙牌酱油的原料，采用的均是上等黄豆和标准面粉，配比严格。从原料开始到酱成熟，工艺期要一年以上。生油抽出后，还要经过30多道工序精制，以确保色、香、味的质量。制酱油用水也很严格，取自湘江与涟水交汇处下游石嘴脑深潭中。此处水流湍急，水质纯净，是制酱的优质水。

（作者单位：仙玉，省地方志编委会；喻长华，原省交通志办主笔之一）

4 ~ 5月湖南大事纪述

● 李章进

2013年4月

1日

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来湘调研。期间，他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为统一战线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学员们作了一场主题为“参政议政与合作共事”的讲座。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主持讲座。

2日

《湖南日报》报道：近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到丹口镇羊石村调研文史工作时，发现该村保存有60余栋明清古建筑，其中一座完整的“进士第”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进士第”的主人是陈公谟，据《陈氏族谱》记载，陈公谟生于道光二十三年，只是其官至几品族谱中未详细记载。

4日

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获悉，株洲市城镇化质量跻身“全国百强”，位列第94位。目前，株洲市城镇化率达到59.1%，高出我省平均水平10余个百分点。

6日

6~7日，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杜家毫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他强调，要抢抓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试点的重大历史机遇，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与全省一道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以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8日

省卫生厅举行纪念活动，纪念援外医疗队成立40周年，并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中南大学、南华大学等8个单位获“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蒋松泉、李爱林等15名同志获“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10日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杜家毫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1日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次会议决定杜家毫副省长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12日

◇12时左右，京广高铁长沙南至汨罗段一隧道出现漏水，造成20多趟列车出现10至60分钟不同程度晚点。漏水现象发生后，铁路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到现场，对滴水处进行排查处置。在确保安全后，列车逐步开行，14时30分运行秩序逐渐恢复。

◇《湖南日报》报道：国务

院正式批复《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衡阳作为老工业基地被列入规划中，将享受国家在投资、财政、融资、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13日

◇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的广州军区某特战旅连长刘珪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国防科大举行。国防科大政委王建伟出席报告会，并在报告会前会见了报告团成员。国防科大1600余名官兵现场聆听报告，1万余名官兵同步收看报告会直播现场。刘珪是湖南益阳人，2000年12月从湖南大学参军入伍。入伍后，他熟练掌握20多项特战技能，在全军首创4项新训法，被誉为“三栖精兵”、“全能连长”，先后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广州军区表彰为“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军事训练尖子”、“基层干部标兵”等，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3次。

◇衡东县霞流镇燕子冲村发生一起枪杀案，一男子持鸟铳将该村村民一家3人枪击后逃离。截至14日下午16时，枪杀案已造成2人死亡，一名幼儿重伤。

15日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荷兰壳牌公司中国

集团主席海博一行。会见后，华菱集团与壳牌中国签署了《非常规气勘探开发及天然气中下游市场开发利用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就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液化天然气及城市燃气应用等相关业务，探讨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副省长黄兰香、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会见或出席签约仪式。

◇15~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来湘考察。在湘期间，他出席了岳麓书院讲坛首场会讲活动。他以《经济——文化——富强》为题发表演讲。许嘉璐指出，仓廩实而知礼仪。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之力，体现在习惯、认同和信仰中。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就没有凝聚力。当前，中国的文化面临危机，具体体现为三个断裂：文化传统和当今时代的断裂、研究与现实的断裂、宣传与心灵的断裂。断裂导致的后果是“主流”、“非主流”倒置，大众缺乏精神缺乏信仰。因此必须续接文化与信仰，只有文化复兴才是经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16日

◇省委书记徐守盛在长沙会见美国凯悦酒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赫澜一行。下午，会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一行。

◇长沙市召开领导干部会

议，通报中央和省委决定：陈润儿同志任黑龙江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不再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根据工作需要，陈润儿近期将赴黑龙江工作，下一步将不再兼任长沙市委书记职务。

18日

◇徐守盛在长沙上午，会见中船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鸣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易炼红，中船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孙伟参加会见；下午，会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国华一行。易炼红，副省长韩永文参加会见。

19日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长沙召开。徐守盛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杜家毫讲话，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省领导及老同志熊清泉、郭开朗、刘莲玉、戴焕，中国科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黄伯云出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主持会议。副省长李友志宣读表彰决定。会上，王利兵等5人荣获第八届湖南光召科技奖；“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多解及奇异问题高效计算方法研究”等230个项目分获2012年度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和省科技进步奖。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研究总院院长程永亮代表获奖者在大会上发言。据了解，去年我省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跻身全国十强，创新绩效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8位。

◇陈明仁将军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醴陵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微微，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刘晓等出席。

◇全国首家民间金融商会——长沙民间金融商会在长沙成立。长沙民间金融商会是经长沙市民政局依法核准登记，由长沙市工商联、长沙市金融办主管的社团法人。

21日

“守护天使 守护生命”第八届湖湘抗癌公益大行动在长沙启动，率先开启“先看病、后付费”新型诊疗模式，为更多的贫困肿瘤病人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即日起，省内持有国家民政部门颁发的特困证、低保证、五保证及家庭特别困难需要住院的贫困参保肿瘤患者，均可参加该公益行动。贫困患者可与医院签订《住院治疗费用延期分期还款协议书》，家境特别贫困的肿瘤患者凭有关贫困证明，经活动组委会审批通过，可享受全免或减免救助。

22日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在长沙会见由台湾“三品会”副会长魏启林率领的考察团一行。“三品会”是由台湾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非政治性社团，致力于搭建两岸交流合作平台，此行组团来湘考察洽谈文化创意产业对接合

作等事宜。

23日

从湖南图书馆获悉,我省有45部古籍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此,全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达282部。

26日

26~27日,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地方志编委会副处级以上干部,各市州地方志(史志)办公室主任、分管方志工作的副主任、方志科长以及省地方志编委会市县志工作指导处全体人员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晓天作工作报告,巡视员袁勇前主持会议。会上还表彰了全省市州方志系统2012年度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优秀单位、先进个人以及荣获“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奖”奖项的获奖志书及单位。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围绕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与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探讨。

28日

◇我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聚力小康、建功三湘”劳动竞赛推进大会在长沙举行。徐守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杜家毫会见受表彰代表,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表彰了我省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及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岳阳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3位

代表在会上发言;省劳动模范、江麓集团高级技师罗军代表全体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向全省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发出倡议。

◇湘乡市育塅乡大桥学校3名五年级女生和1名四年级女生参加完期中考试放学回家后,一起外出游玩。下午3时30分左右,4名女生私自到湘乡市石狮江流域育塅乡松岳村地段下河游泳,不幸意外溺水身亡。

29日

◇中午,台湾旅行团队在我省长常高速公路汉寿县境内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11人受伤。

2013年5月

2日

《湖南日报》报道:郴州市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池福民收藏到一枚唐代开元通宝小平背“桂”字铜钱。这枚铜钱完整无缺,外表红斑绿锈,正面有“开元通宝”4字,背面穿孔右侧有一个醒目的“桂”字,字迹清晰,铜锈自然,经专家鉴定为唐代会昌开元桂阳产铜钱。该铜钱的出现,填补了郴州空白,也为桂阳钱币铸造史找到了新的实物依据。

6日

当日晚,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赵家塘村因降雨诱发山体滑坡,导致4名村民被埋。7日凌晨4名被埋人员被搜救出来送医院救治。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2人中1人脱离生命危险,1人仍在全力救治。

7日

徐守盛就进一步做好湖南的新闻宣传工作分别与部分中央驻湘新闻单位、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他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发展为重,以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更加主动地把镜头、版面和话筒对准经济建设主战场,广泛凝聚科学发展的正能量。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易炼红参加座谈。

8日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来湘调研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易炼红参加会见。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美国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天明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易炼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会见时在座。

◇湘籍画家李自健将其代表作《南京大屠杀》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幅规格为245×336CM的大型油画由李自健创作于2003年,耗时百余日,表现了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李自健,195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982年毕业于广州美院油画系,1988年旅居美国洛杉矶,职业画家,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海外特聘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国油画家协会会员。

9日

易炼红同志任长沙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11日

◇《湖南日报》报道：近日，茶陵县文物局在严塘镇湾里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原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旧址墙上，发现两幅红军早期军事地形图、作战图。地图中的标尺、标注清晰可见。县文物局局长侯联平说，保存得这么完好的红军早期作战图，全国罕见。

◇11~1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在湘考察时强调，要抢抓机遇，推动武陵山片区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省领导徐守盛、陈求发、孙金龙看望了王正伟一行。省领导张硕辅、武吉海陪同考察。

12日

全省民兵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守盛强调，要在新的起点上加强民兵建设，推进民兵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双赢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团结带领全省民兵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王治民中将出席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分别就推进全省民兵建设转型作了讲话。省领导李有新、戴焕、陈长寿、姜英宇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广州军区民兵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民兵建设任务，并对全

省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13日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长沙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听取我省城镇化建设情况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丁继业、于革胜、朱发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作斌出席。近年来，我省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0.45%提高到2012年的46.65%。座谈会上，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省城镇化建设成绩，对下一步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先锋村的一家鞭炮厂突然爆炸，造成附近相连的3间工房瞬间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人受伤。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长沙麓山寺住持圣辉法师在日前举办的湖南省佛教协会第6次代表会上，率湖南29所寺院住持共同发愿，主动取消寺院门票，以免费开放抵制商业化。

15日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俄罗斯总统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巴比奇一行。巴比奇此行访华，主要是与中方商谈并启动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事宜。省领导陈肇雄、易炼红会见时在座。

◇毛腾飞当选株洲市人民政府市长。

16日

◇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长沙开幕。徐守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杜

家毫，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国土资源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徐德明，国际有色宝石协会候任主席本杰明·海克曼等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菲利普·桑卡·马尔莫，湖南省委原书记王茂林，国土资源部原部长孙文盛，国家地震局原局长宋瑞祥，中国贸促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徐沪滨，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徐善衍，省领导陈肇雄、易炼红、陈君文、许云昭、万建华等出席。开幕式由副省长李友志主持。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在长沙会见以科里·莫克为团长的美国青年领导人代表团。代表团由9名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成员组成，此次应全国青联邀请，于5月11日至24日来华访问。

17日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来湘培训的“发展中国家智力引进与社会发展官员研修班”学员。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这次活动，旨在加深发展中国家官员对湖南的了解，促进湖南与各国的交流合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会见时在座。

◇周德睿当选常德市人民政府市长。

◇岳阳县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同车的相思乡干部2死2伤。

18日

◇第八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开幕式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在高峰论坛上与中部其他5省省长共话

“中部崛起”。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开幕式和高峰论坛。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中博会相关活动。

◇湖南省第二十三届人大好新闻奖评选昨天揭晓,《湖南日报》选送的《民生七问会客厅》获一等奖。

19日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湖南广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两家“湘字号”文化品牌成功入选第五届“中国文化企业30强”。

20日

◇从国防科大获悉,该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近日成功研制了一款新型高性能卫星导航接收机,可同时接收我国的北斗、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GLONASS三种信号体制,定位精度达到10米以内,可广泛应用于飞机、船舶、汽车等平台。

◇经省政府批准,省水利厅、省统计局向社会发布《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在长沙会见由埃塞俄比亚内阁部长艾舒图·德西·郝尔杜法率领的考察团一行。考察团成员来自非洲的8个国家,在结束由商务部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京举办的“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总统顾问研讨班”后,专程来湘学习考察。

22日

◇2013年全国友协系统会长年在长沙召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冯佐库、李建平出席会议。会上,金一南作了关于东海安全形势的报告,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下民间外交工作的特点和趋势。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以及部分地级城市友协代表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长沙市芙蓉区街巷志》首发。该志共50余万字,采用地图17幅、照片347张。书中收录芙蓉区街巷名592个,撰写街巷条目369则。长沙建城2000多年来,城市中心一直未变,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芙蓉区所辖地域。该书翔实记录了古城到新城几千年的街巷演变,系统再现古城风貌、旧城风采、今日繁华。

23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常德市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出席开幕式,省委书记徐守盛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微微,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刘凡、程崇庆、傅惠民、何丕洁、田惠光、刘家强和民革中央常委出席。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刘晓致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强民革基层组织建设和促进参政议政工作。

◇周海兵当选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严志辉当选为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24日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中国铁

道建筑总公司董事长孟凤朝一行。中铁建执行董事、总裁张宗言,省领导陈肇雄、易炼红、韩永文参加会见。

◇许显辉当选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市长。

25日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由饶颖奇率领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一行。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杨崇汇,省领导陈求发、孙金龙、黄兰香、王晓琴参加会见。

◇郭建群当选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26日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朱玉辰一行。副省长韩永文、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会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异乡·故乡——长沙知青在江永》首发式在长沙举行。该书收录了百余名知青、家长、干部、群众的回忆文章和近百幅老照片,并收集到长沙下放江永的5123名知青的姓名。省人大党组成员、省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肖雅瑜及相关人士出席首发式。

◇从省文物局获悉,岳阳博物馆获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30日

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在湖南省人民会堂开幕,31日闭幕。经过大会选举,徐守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

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



2013年4月27日在长沙召开全省市州志办主任会议，图为主席台



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晓天在会上讲话



大会会场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跃龙出席会议



委党组成员、副厅级纪检员
李晓平出席会议



本委巡视员袁勇前主持会议



先进集体



优秀单位



先进个人

